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11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一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一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163000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05,000册

书号 11310·11 定价 1.30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文 献

- 彭德怀同志对美军视察组的谈话……………(1)
——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结论部分

传 记

- 吴玉章略传……………吴玉章(10)

回 忆 录

- 皖南惨变记(节录)……………钱俊瑞(74)
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三)……………李志民(195)

宁都暴动档案资料

- 刘伯坚致季振同、赵博生、山宇、董振堂信
……………(255)
刘伯坚致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信……………(258)
红十二师陈光、赐凡的一封信……………(261)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263)

- 二十六路军革命士兵委员会敬告全国士兵
兄弟书.....(268)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为孙连仲部二十六
路军兵士投入红军告全国兵士书.....(276)
- 中央苏区红五军团全体战士答复反革命军
阀孙连仲、高树勋并告全国工农兵.....(279)
- 中革军委关于调送一批本地战士给五军团
的命令.....(284)
- 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一、三、五军团分编问
题给各级政治委员的指示信.....(285)
- 中革军委关于重编一、三、五军团问题的
训令.....(288)
- 宁暴经过.....董振堂(290)
- 二十六路军举行暴动的计划.....(294)
- 李青云给刘伯坚的信和宁暴经过的报告.....(296)
- 中革军委关于嘉奖宁都暴动干部战士的通
令.....(306)

专题资料

- 内蒙古蒙旗独立旅的创建前后.....乌嫩齐(308)
-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沿革概况
.....袁伟(327)

彭德怀同志对美军 视察组的谈话

——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
抗战的概况结论部分

(一九四四年八月)

目前，我八路军共有兵力三十二万人，经常抗击着敌人侵华兵力的五分之二至五分之三（伪军三十余万还不在于内）。最多时，曾箝制敌人二十二个师团。

七年中，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七万四千零六十次，平均每天与敌人作战二十九次；共毙伤日军三十五万一千一百一十三人，伪军二十三万九千九百五十二人；俘日军二千四百零七人，伪军十四万八千七百二十六人；争取日军投诚者一百一十五人，伪军反正者四万九千四百六十一人，这里人数，约等于已消灭侵华日军之半数和全国伪军之半数。缴获长短枪十八万九千零二十八支，轻重机枪三千一百二十挺，各种口径炮四百八十九门。我们主要就依靠这些战利

品来武装和补充自己。七年的艰苦战斗，我们也支付了巨大的代价。我负伤指战员十八万六千五百九十三人，阵亡十万零三千一百八十六人，日伪与我伤亡的比例总平均为二与一。

经过七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在华北敌后，巩固地建立了五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军事上划分为五个大的军区，即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晋冀豫军区、冀鲁豫军区与山东军区。东自锦州、山海关、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西至黄河，宽二千二百华里，北自热河之宁城、察哈尔之多伦、商都、绥远之百灵庙，南至陇海线，长一千八百华里，包括华北之晋、冀、察、鲁、绥、热、辽七省。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人民达五千多万，占全华北人口百分之六十左右；有组织的群众为一千六百多万，占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一百五十八万，占根据地人口百分之三强。民兵的前途尚可大量发展，可能发展为根据地人口的百分之七，它是今天八路军在敌后作战的助手，也是我们将来进行反攻的强大后备力量。经验证明，农业社会动员兵力可以达全国人口百分之三，将来反攻时，我们可以动员一百五十万兵力。人力方面在我们是不困难的，食粮也可自给，再配合以强大的民兵作后备，我们自信有力量担任华北战场上的反攻。

在这些抗日根据地里，我们真正实现了民主政治，人民有充分的言论、集会、出版、结社、居住的自由。法律上一律平等。各级政府和官员，均由人民选举而产生。参议会和政府中，有各党各派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共产党在政府中只占三分之一，被选得多了就自动退出。在经济上，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老百姓的生活也有了改善，而且较战前还好。比如根据晋察冀北岳区的三十五个村庄的调查，由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雇农上升为贫农的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三七，上升为中农的占百分之十点二八；由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占百分之十八点五七，中农经济的比重，急剧增加。文化教育事业也在突飞猛进之中。虽然七年来受到敌人许多严重的摧残，但因我们在战争中始终注意建设，积蓄民力，培养民力，而且采取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环境中，依靠着丰富的地下蕴藏和资源，一定可以建设起一个自由繁荣的华北，成为民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年来，敌人对我华北八路军的作战，曾用尽许多阴谋与残酷的办法，五易其统帅，由香月清司而寺内寿一，而杉山元，而多田骏，而冈村宁次，手段一个比一个狠毒。在作战指导上，亦曾变换多次，由“突贯攻击”，“分进合击”，转变到“治安肃正”的“总力战”，“囚笼政策”，“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

战术”；又转变到“治安强化”与“铁壁合围”。但所有这些，都为我八路军所击破，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我们并不否认，日寇辛苦经营华北七年，是有其某些收获的，主要是交通线与据点的扩张与繁殖。但总计起来，毕竟是得不偿失，且其战果极不巩固，一有变动，敌人就无法控制。日寇也很知道自己是站在一座火山上，认识到“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且一再地哀号：“华北有八路军存在，便无法安枕”。

华北抗战是在与后方完全断绝、毫无接济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什么国民党军队（他们有飞机运送，还多少有些后方的接济）不能在华北存在，而我八路军犹能屹然独存呢？为什么强大而野蛮的敌人不但不能消灭我们，相反，我们胜利地坚持到了今天，而且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最后胜利呢？其中道理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首先看看敌人。日寇是一个强大而又野蛮的法西斯帝国，在军事上是占优势的。比如技术比较发达，装备精良，而常备役的军队，久经锻炼，黠武主义的“武士道”的毒中得很深，并且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它就占领了华北所有的铁路沿线和重要城市，无论在作战和统治上，增加许多便利，因而它在七年的作战中有了某些微弱的收获。但它有一个根本弱点，就是

在对付我们的群众游击战争中，深感兵力不足，以致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常常顾了前方，则后方空虚，集中兵力对某一个区域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则其对另一个区域的控制就会削弱。敌人曾以各种办法消灭这个弱点。如繁殖伪军，培养爪牙，作战指导上的“分散配置，联合扫荡”；但伪军不可靠，易为我军争取与瓦解，反而常常要用日本兵加以监视，“分散配置”的结果，使敌守备更为薄弱，处处露出破绽。而且由于战争的持久，敌军本身的政治素质也日见降低，士气消沉，军纪败坏，战斗力亦不如前。在政治上，日寇所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它不仅和我整个中国人民站在对立地位，而且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维持正义的各民族相对立，对于日本国内劳动人民说，这个战争也是有害无益的。敌寇在华北的疯狂屠杀和残酷掠夺，激起我全民的义愤和反抗，这种反抗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之下，就特别有力。敌人的一行一动，都遭到我人民明的、暗的反抗和破坏，真正是防不胜防。敌人收买和利用汉奸，并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恩威兼施”的办法。但汉奸究竟只有极少数民族败类去充当，小恩小惠的欺骗拢络，终掩盖不住其残暴掠夺的本质，至于强力压迫的结果，则是压迫愈烈，反抗愈大。日本法西斯是无法弥补这个政治上的基本弱点的。

我们的友军呢？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是处于劣势，但装备弹药比起八路军来，条件要好得多。有一个时期，友军在华北的数量要比敌人多，装备也差不得很远，而且有后方的接济。在政治上，按道理说来，应该是属于优势的。但是，可惜这些有利条件，他们都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相反地，他们执行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错误政策，假抗战之名，行一党专政之实，心猿意马，动摇不定，时时求与敌人“和平共居”。驻防前线，不但不知体恤民困，发动民众，取得人民帮助；反而勒索无限，发国难财，随便吊打、杀害人民，有些地方老百姓称他们为“小日本”，“二鬼子”。兵员的补充，不用政治动员，反用抓丁捆绑的办法。部队内部进行的是反共、反民主的法西斯教育。讳言抗战，长官们与敌人信使往返，也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因而士气消沉，兵无斗志。部队与部队间待遇不平等，相互不团结，嫡系歧视非嫡系。步骤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作战时互相推诿，互不救援。当局甚至故意采取离间政策，扬甲抑乙，或抑甲扬乙，唆使互相磨擦，以便驾驭。战略战术公式呆板，缺乏主动性和机动性，平素又毫无准备，敌来只有挨打，又熬不住敌后的艰苦。更加上当局对抗日有功者，不独无赏，反而加之以罪，对通敌叛国者，不惟无罚，反而互通声气，保持联络。致使友军一遇敌人，上有

叛心，下无斗志，只有溃散或投降两条道路。这就是友军不能在华北敌后存在的基本原因。

我八路军与敌人比较起来，在军事上也处于劣势，技术和装备远不如敌人，也不及友军，且无后方接济，武器弹药都要靠从敌人手中去夺取。但是，我们部队的政治素质较好，官兵上下一致，具有高度的抗日积极性，组织严密，意志坚强，士气旺盛，每个连、排、班，甚至每个士兵都可单独作战。作战上高度主动和机动，善于研究敌人，发现和利用敌人的弱点；指挥统一，行动一致，部队虽然分散在如此宽阔的战线上，却可以组织统一的战役，敌人扫荡某一区域，邻近区域的部队就会自动起来配合，从外线反包围敌人，击敌侧背，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更主要的，我们实行民主，坚决依靠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发动与武装人民参战，使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战争，这使我们的抗日力量增强到千百倍。这就是八路军所以独能巍然屹立于敌后，制胜敌人的秘诀。

最近，我们获得敌上海《朝日新闻》之友半月刊，于去年八月一日所刊载的《中共军内幕分析》一文，称我军“有超乎常有以外的坚强意志和严密组织，……战斗技术的两项特长，即精确的射击和敏捷的行动。”又有伪《中国青年》杂志上刊载有《八路军怪魔的游击战争》一文，其中对我军有如下的描述：

“不用枪，只肉搏，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干起来，向敌人冲去，即所谓“光荣”的躯干倒在地下，也不要紧。后面的马上实行“同志爱”为保护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遗体，也要保护这枪，使用绳子把它拉下火线，先是你拿枪，我解子弹，然后再把尸首背回去。……在攻碉堡的时候，是使用肉弹。在攻城夺寨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就率性搬出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办法来，几个木梯暂接到一起，多少个勇士扛着一个梯子，拥到碉堡根底，很快竖立起来。他们穿枪林、冒弹雨的跑上去，死的伤的掉下来，后面的又接着爬上去，这办法虽然愚笨，有的时候血多肉多，也会得到胜利的。”

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拚死。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对于我八路军战士的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是十分恐怖的。我们相信，如果在我军这样英勇作战的士气上，再加以适当装备，则我们的战斗力必增强百倍。如果我们获得一定数量的轻炮、弹药和其它轻武器的装备，则我们即可扫除深入我根据地的敌据点和交通线，把根据地融成更大块的。如果我们获得重炮、反坦克炮等装备，则华北

即会有更多的类似“百团大战”的战役进攻，敌人的任何交通线将无法控制，敌人将会更多地被我们箝制在华北战场上，以至将敌人赶出去。我们有充足的人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勇敢善战的指挥员、战斗员，极愿对祖国抗战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更多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当局缺乏此远大眼光，不仅无任何帮助，反而多方限制与打击我们抗战力量的增强，这对于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是十分有害的。

吴玉章略传

吴玉章

编者按：这是吴玉章同志一九四三年在延安自己写的一份略传初稿。此稿由《吴玉章传》编写组提供。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该组成员、原吴玉章同志秘书程文同志的帮助。这次发表，只对个别文字作了必要的修改，对个别史实作了订正，并划分了段落，余均保持原貌。

我的真姓名是吴永珊，号玉章，字树人。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在法国时用岳平洋、平洋、岳镇东、镇东、震东、Joseph(约瑟夫)等假姓名。在苏联用 **Буренин** (布列宁) 等名字。在中国入党时用的姓名是吴玉章。在苏联入党时用的姓名是Н·(尼可拉)、И·(伊里奇)、**Буренин** (布列宁)。现在用的姓名是吴玉章。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用的名字是王荣。

我在一八七八年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桥蔡家堰。

我的父亲务农而兼读书，分得祖业约五十亩地。母亲是农村妇女，没念过书，因为当时乡间的女子读书是少见的。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和父亲一样，读书兼管家务。二哥和我则专门念书，没有作过农民。父亲很爱书，希望他的儿子读书，有成就。二哥很聪明，十九岁就考得了秀才，父亲很喜欢他。我七岁时不幸父亲去世了，十一岁又丧失了我八十六岁高龄的祖母，十三岁又失去我的慈母。从此，我就依靠兄嫂长成。我的两个哥哥是很有志气的，后来他们都成了革命同盟会的革命党员。二哥是在民国二年闻到二次革命失败，愤恨地自缢而死。大哥在“八一”南昌暴动我军到汕头时，也到了汕头，因我军失败，他又回到上海，一九三七年死了。现在，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已死亡了。我分得祖业约十余亩地，还有一部分住宅，没有其他的产业。我有一女儿已出嫁多年，有四个外孙女儿，两个外孙儿。我第二个外孙女已来延安入女大，名叫蜀平。第一个外孙女也已来延安，名叫霞飞。现都在三局学习。最近，我又有两个外孙女儿来到延安。现在我家只有妻子和一儿、一媳妇、一孙女共五口人，实际上只有我妻子一人在老家。她现在已经六十六岁了，身体还健康，家中那点土地，仅够她生活用，因此我也安心作革命工作。三四十年来我都在外，彼此独立生活，毫无室家之累。我一开

始作革命事业，就把家庭安置好了，这也是几十年来我能始终不倦从事革命的一个原因。我的儿子名叫震寰，在他十七岁的时候，我就用勤工俭学的方法，送他到法国去读书。他在法国恩鲁布尔电科专门学校毕业，学得很好，在法国大水电工厂作了五、六年工程师。一九三三年他到了苏联，在苏联国家计划局作了约四年的水电工程师。一九三七年同我到法国作国际宣传工作，一九三八年同我回到武汉，现在他是四川省长寿县水电工程处的工程师。他在一九三〇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到苏联因为交通不便，转党关系很久没有弄好，因此没有党的正式关系。他回国后，曾经要求过党的组织生活，但王明同志等以为他是一个专门技术人员不正式加入组织比较好活动些，所以他现在还没有党的组织关系。至于他的生活和我和家里都是独立的，不相依靠的。他现在四十二岁了，一九四〇年才结婚。我的家庭状况就是如此。

中日战争^①失败时，我同二哥到成都尊经书院念书半年。那时母亲去世不久，家中既哀愁困苦，国事又危急万分。我们这种乡下土包子一到了大城市，眼界就开了许多。二哥是一个忠实诚笃的人，常常以忠孝节义来相劝勉，他很讲究宋元时代的理学。母亲死后，

^① 即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编者

他在墓前独处了三年，墓就在我们住宅不远。每天晚上他同我对坐看历史，弟兄两人常谈论文天祥、岳飞、史可法等忠义英雄，莫不眉飞色舞，谈到他们慷慨捐躯，从容就义时，必都痛哭流涕。至夜深，送他到母墓，我再回来，因他不许我同他一样守墓，但我因此感触更深，常常要学古人作一番非常的事业。所以，我们听到甲午战败非常痛心，以后变法维新的呼声传到我们乡下来，我们就成了这一运动的宣传者。戊戌政变时，我二哥在成都尊经书院和一些进步分子狂热地欢迎这一运动。我因家中困苦，就在一富绅家中教育儿童。二哥常寄许多新书报回来，我就疯狂地宣传新政。不久戊戌政变失败，六君子被杀，冷笑家从旁非笑，我常常愤恨地同他们奋斗，虽然未遭什么危险，但是许多人为我取了一个名字，叫“时务专家”。随后，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京，清廷又有变法维新的倾向，特别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新小说报》鼓吹得很厉害。

一九〇二年冬，我同二哥冒险外出，初拟止到上海，一九〇三年正月到了日本。到日本不久，就有拒俄学生会的组织，我和二哥都加入了。不久，这一团体改名军国民教育会，带有革命性质。于是，家乡就造了许多谣言，说我们加入了革命党，不能回家了。我这时也就有决心与家庭脱离关系，以便革命一旦失

败不累及家庭。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到东京，我们组织了革命同盟会。这时我真是高兴极了，因为我从前念书时，对于“忠君爱国”虽是想作，但没有合乎自己理想的革命理论，因为我常常感觉为一人一家去效死如家奴一样，是卑鄙的。现在有中山的三民主义，我觉得这是革命的正确道路。我从这时起，对于革命的信心是坚强了，对于革命事业是非常积极了。同盟会分评议、执行两部。我在同盟会中担任评议员。一九〇八年，因为国内各处起义都失败，革命形势低落。这时因为党内^①有孙、黄、章等派别之争，我以极大的努力团结党员，并发行一四川杂志来补助党机关的《民报》，因为民报完全被禁止不能输入内地，我还和几个同志印一些小刊物，如革命丛报等。这时暗杀的组织随革命的低落而发展起来，我和女同志方君瑛、曾醒与现在做了卖国贼的陈璧君、汪精卫等组织了炸李準、端方、满清摄政王载灃的工作。我是这些工作的组织者，喻云纪、黄复生是有力的工程师。汪贼和黄复生因炸载灃被捕。我在一九一〇年夏到北京秘密组织劫狱工作，未成。于是同熊克武、但懋辛、井勿幕四人到香港与黄兴、喻云纪、胡汉民等商讨广州起义事。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我那时正在日本担负

^① 即中国同盟会。——编者

购军火事，我把最后一批军火运到广州时，已经起事了，我未能参加战斗即失败。随后我又返日本到岗山第六高等学校，不久毕业，得一文凭我就可以回国了。这时四川铁路风潮越闹越厉害，党就要我回四川作革命运动。

我到四川后、在七、八月之交（旧历六月），就和内地的同志在荣县宣布独立（这段史实可参见邹容编《国民党党史稿》九二八页及我作的《辛亥革命二十五周年回忆》）。攻下邻县威远，进攻自流井二次都失败了，因为当地住有巡防军，火器比我们强。随后，满清政府调端方带新军到四川来屠杀四川人民，武昌乘机起义。这时四川和外边消息隔绝，很久才把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川中，又闻端方已到川。我于旧历十月初到内江，正逢端方队伍经过，部队中有孙武组织的共进会人，孙命他们来找我，于是就决定在资州杀端方，我在内江同时起义。在这数日内，成都、重庆也同时起义，川省革命就完成了。

一九一一年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我被重庆军政府派为四川代表赴南京。一九一二年正月我到了南京，孙中山要我在总统府任秘书。当时南北和议已经快要成功了，秘书处的人有许多到北京去谋新职，也有许多不满意和议的在另找出路。但我也同作革命工作一样，不随潮流

的高低而定作事的冷热，始终忠于职务，收拾残局，讲求善后。当时，总统府秘书多人要求到欧美留学，教育总长蔡元培允许了。第二年（一九一三年）因袁世凯毁法并暗杀宋教仁，南京、上海、江西、安徽、广东、重庆、湖南宣布独立，起兵讨袁，这就是所谓二次革命。对于这次革命，我也是极热心奔走的，不久失败了，我被通缉。

一九一三年冬，我逃往法国，幸而有蔡元培等教育部里多人的关系，常给我寄留学经费来。我初到法国时，还常幻想革命高潮不久又要到来，时时准备回国；到了半年以后，只见反动势力日增，不久帝国主义第一次大战爆发，于是我才开始想进学校。我本来在日本是学的工科，因为中国科学太不发达，当时的口号是“科学第一”，但是，我在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后，入东京帝国大学电气工科，因回国起义就没有去上过课。我自来所热心的事业是革命工作，这是一个矛盾。所以我在法国就改学政治经济，入巴黎法科大学。一九一五年考过了一年级升入二年级。在法国，李石曾、蔡元培等约我一同组织华法教育会，扩大我们以前的留法勤工俭学会，并开办华工教育，改良法国招华工条约等等，蔡任会长，李任书记，我任会计。一九一五年冬袁氏称帝，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起义，我们在外听了非常高兴。一九一六年春，我由法国社

会党议员穆德介绍，到伦敦会见英国社会党议员，请他在议会提议不借款与袁世凯，此后果然袁氏因借不到外债，兵事又失败，六月六日就暴病气死了。

一九一六年十月，蔡元培要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约我一同回国。我到了安南^①、云南为华法教育会募集了数千基金。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北京，开办留法预备学校。七月张勋复辟，国会南迁，孙中山在广州被举为大元帅，发动护法之役，南边各省都响应。熊克武驱逐了刘存厚，统一了四川，派我作四川代表，出席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一九一八年五月军政府改组为七总裁制。政学会杨永泰等推岑春暄为领袖，排斥孙中山的革命派。当时我极力维护革命势力，与政学会杨永泰、章士钊等作了无情的斗争。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日本留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有救国运动的组织，并在上海出《救国报》，我为他们捐了不少的款。当时上海有《劳动音》种种社会主义的刊物，我也常常赞助。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极热心的，曾号召在法国的留学同志反对签字于凡尔赛和约。这时又有南北和议之举，在上海这些代表花天酒地，闹得一塌糊涂，全国人民知道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要自救只有靠自己。因此，各省有自治运

① 即越南。——编者

动的高潮，这自然是一种地方军阀、政客投机的办法，但也可见这时全国都觉得没有出路，必须有一个新的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使中国资本主义有点发展，一部分资产阶级想用美国的实验主义来改造中国，但这时十月革命成功，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传播到中国来了，进步的青年热狂地接受了这一思想，而马列主义的萌芽，就从此发生。起初是有些投机的、好奇的要到苏联去观察。当时我知道和我商量过要去苏联的人如姚作宾、廖划平等，后来或为政客或为叛徒，很少有真正的革命者。但是从这些潮流当中终究产生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一九一九年冬我回到四川。这时四川也同全国一样，酝酿着内部斗争，就是四川同盟会中的熊克武（黄兴领导的所谓南洋派）和杨庶堪、谢持（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派）的斗争，我是不偏袒那派的。一时舆论上认为我出来可以挽救这个危机，社会上有我将作省长的谣言。实际上我自己也无这样的才能，而两面有权势的人谁又会从大局着想，轻轻把重要位置给你呢？我回四川后是尽量调停了一番，但一九二〇年二月终于打起仗来。谢、杨利用了滇黔军的力量，一时把熊克武赶到保守去了，但不久熊克武利用刘湘、杨森旧军阀的势力，打出“川人治川”的口号，把谢、杨和滇黔军逐出川境。这时川省真正成了孤立的省份，不

属于南北两政府，而且为四面敌人所包围。同时，正是湖南赵恒惕制定省宪，选举省长实行联省自治的时候。四川张澜在川北也倡自治。我当时正看了日文的一本《过激派》，就是《布尔塞维克》，上面讲到列宁党的组织和十月革命后提出的“不作工不得食”的口号，我非常欢喜。一九二〇年年底重庆自治运动筹备会，请我出来办理自治会，我就草拟了一篇全川自治联合会宣言，把这许多新的东西写进去，写得非常动人。现在看来虽然有些不正确的空想，但确实是传播新思想的一种媒介。这篇宣言登在我们刚组织的《新蜀报》上，受到了全川人民的欢迎。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开了盛大的成立大会，熊克武、刘湘及湖南代表欧阳振声都到会讲演。这一轰轰烈烈的全川自治联合会，比省议会还更有力量，因为每个县都有三、四个代表，是各县选派来的。但是马上困难就发生了，刘湘、杨森等想利用这团体选举他们作省长，我不答应。他们就用收买代表的办法来达他们的目的，而代表中果然有些不良分子被他们收买了。我很机警地在制定省宪的问题决定后，马上就把这个团体解散了。刘湘刺骨地恨我，要通缉我。从这里我得了两个教训：一个是不彻底推翻封建军阀，绝不能讲求改革，这就是说不革命不能建设新的社会；一个是没有革命的党，只是乌合之众绝不能成事。这就使我坚决地相信列宁

的革命理论和组织列宁的、斗争的、革命的党是必要。当时，四川和外面的交通完全隔绝，不能知道外边已经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四川只有恽代英同志等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我因年龄不合，不能加入。一九二二年成都高师有逐校长贺伯忠的风潮，学生要求我出来做校长。我于是在校中秘密组织了一个《中国青年共产党》，有二十余人参加，杨尚昆同志的哥哥杨阔公同志是最积极最好的一个。此外，有童庸生、廖划平、傅双无、郭祖佶等，都不好。一九二四年正月刘湘、杨森等攻下成都，熊克武出走遵义、铜仁，杨森就派人来接收高师，学生反对，我制止他们，把事交了。本来杨森想逮捕我，因黎纯一、叶丕承的劝阻，没有来捕我。“五一”节前，成都工农决定作一热闹的纪念，有人和杨森讲，杨最喜沽新派的名，慨然答允了。到“五一”前一天，有人警告杨说这一运动是我组织起来想夺政权的，杨大怒又要捕我。同志们苦苦劝我出走，我于是同刘伯承、熊晓岩等潜行到贵州、湖南。

一九二五年正月我到了北京。此时孙中山病得很厉害，我没有见到他。这时已经是国共合作的时代。我在北大见到赵世炎同志，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情形，马上我就由世炎同志和李国暄、童庸生等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并且把我们四川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的组织完全解散，函告他们个别地加入共产党。傅双

无等以为我处置不当，主张团体加入以取得党的重要位置。我坚决反对他们这种在党内保存小团体和争取位置的主张。果然这些人有许多是不了解列宁党的组织而有社会民主党的倾向。至于我们的好分子则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杨闇公等。这个组织的情况，我曾经对党说过，党认为我的处置很好。党以为我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很深，虽然我没有加入中山中华革命党的组织，但因我是老同盟会忠实党员，总是认我是同志，因此党就派我作国民党中的工作。

“五卅”上海大罢工时我正在上海，作了一些宣传运动工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提议要我回四川去组织国民党，因为四川国民党为西山会议派石青阳、谢持等所包办。我答应了这一工作，又到广东去同廖仲凯、胡汉民、汪精卫等商量好了。八月中我回到四川重庆，得杨闇公等同志的帮助，很快就把国民党改组了，选出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在二十天内就把重庆中法大学附属中学办起来，使国共合作在四川活跃起来。十一月底我领导四川代表到了广州。但这时只到有海外华侨代表彭泽民等三十多人，湖北代表董必武、向忠发、钱介盘等六人，其余各地甚至广东本地的代表都还没有选出。二次大会由十月延期到十一月，又由十一月延期到一九二六年正月一日。但是看情形恐怕一月一日又不能开会，因为这时西山会

议派开了会，极力破坏，企图使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不成，他们就可以胜利。我到广州问汪精卫筹备大会的情形，他很颓丧地说，自从廖仲凯被刺，胡汉民出走，西山会议派又捣乱，恐怕大会是开不成了。我说，大会如果不按期开，则前途非常危险，国民党有解体之虞。我路过上海时向我党中央报告了四川工作情形，党认为满意，并写信通知广东党组织可给我以重要工作。国民党开会时，谭平山提出要我担任大会秘书长，汪精卫大惊说：你怎么认得他？谭说：我本来不认识他，不过我看了他这次在四川作党的工作很有成绩，所以我提议第二次大会要他来组织。这个狡猾的汪精卫马上说：我同他是多年革命同志，他很好，就决定他作大会的秘书长罢。这时候大家都以为明年一月一日只不过有二十多天，无论如何准备不及，非改期不可。我坚决反对改期。他们问我有把握开会吗？我说：只要你们尽量帮助我，是有把握的。于是登时各方活跃起来，在报上鼓吹，出大会专刊，打电到各地催选派代表。果然，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大会胜利的开幕了。大会轰轰烈烈开了二十天，作出了最进步的宣言决议，开除了西山会议派的反动分子，执行了党的严厉纪律。这才把孙中山死后动摇了的国民党基础稳定了。这当然是我党的力量在支持国民党。当时陈璧君说：“我看了二十天的会场，凡是说话漂亮的，你

下来一问都是共产党。”这话虽然是在恭维我党，但她忌恨共产党的心也昭然若揭了。大会开过后我要回四川整理党务。大会选举我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广州报上时时有我的名字，一般人对于我是很好的，尤其是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看我把国民党挽救了，是非常感激的。这时广东有鲍罗庭领导，还能执行国际的路线，与上海陈独秀路线不同，我在这一大会中是受鲍罗庭及我党广东省委领导。我二月初离广州，不久就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变，汪精卫出走，蒋介石专横。五月初国民党开二中全会，把蒋作为党的领袖，改为独裁制。七月出师北伐时，蒋又任总司令，于是党政军的大权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八月我回到广州时，何香凝一见我就大哭说：你看，你一走后就闹出了这样多乱子来，这怎么好！我说：我们再来想办法。她说：我已托顾孟馀作请汪回国复职的运动，你可以同他商量一切。于是我同顾商定发起开国民党执监委员联席会议，来解决时局的严重问题。十月初，武汉为第四军张发奎部攻下。广州正开执监委联席会议，议决了请汪回国及许多重要问题，提出党权高于一切及党内民主的口号。提了一个统一党的领导案，因张静江反对未能提，但邓演达，张发奎，李济琛等都拥护这一主张。蒋自己的军队腐化不能打仗，攻江西南昌久不下，他的威风减低了，

党的权威扩大了。

十二月，政府、党部一部分人员迁到了武汉，在武汉组织了临时政府。我和孙夫人、孙科、宋子文、徐谦、顾孟馀、恽代英、陈友仁等都到了武汉。但是蒋介石把一部分政府人员扣留在南昌，主张政府应设在南昌，使政府处在他肘腋之下，以便操纵。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群众与英国水兵冲突，武汉政府以强硬手段，收回了武汉英国租界，九江英租界也同时收回，使英国近百年在远东和世界的威风受了一打击。全世界都把武汉政府看成了革命的中心，全国人民都拥护武汉政府，就连北京的张作霖也说收回租界他是赞成的。蒋介石为了观察人民对他的印象如何，于正月九日到了武汉。他在欢迎大会上受了大众“何时把政府全体迁来武汉？”的质问和鲍罗庭的批评，回南昌后就打电到武汉，要向第三国际要求撤换鲍罗庭。武昌同人坚决反对，于是武汉与南昌的斗争就激烈了。二月初，我们在武汉发出提高党权，实行民主，打倒昏庸老朽，反对个人专政等宣言，号召开国民党三中全会来解决时局问题。这个宣言得到了各处的响应。三月初七国民党三中全会在武汉开幕，把一切问题顺利的解决了；取消蒋介石所创立的国民党的主席职，以九个常务委员合议制来代替；取消了总司令制，以军事委员会来代替；组织了新的政府，请汪回任国

民政府主席。正当会议成功之日，上海三次暴动成功了，上海市政府成立了，南京也同时攻下了。革命的势力贯通了扬子江流域，武汉政府的威风震动了全中国，全世界。但是，一方面是我党有机会主义陈独秀的领导，四月五日陈与汪贼发表了“汪陈宣言”；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知道旧式军阀是不能镇压革命了，只有在革命营垒中来找反动势力。最初还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被广州、武汉的工人威力吓怕了。广州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是实际的政府，武汉的总工会也是武汉的实际政府，他们常常开群众大会游行示威，每次总是数十万人。蒋介石同武汉的斗争正是代表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现在蒋受了武汉的处罚，自然要另找出路，很快地就投在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了。帝国主义于革命军占领南京时就炮击南京，正是一号召。三月十五日蒋就到九江，把九江的国民党党部用流氓手段捣毁了。到安庆、上海一路都用杨虎这些流氓来捣乱党部。四月九日何应钦这个贼头到了南京。四月十二日蒋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进攻，赵世炎同志等牺牲。十八日蒋到南京，成立了反革命的政府。从此，革命分成了两个营垒，武汉的革命反对南京的反革命。

武汉政府时代，当时我很有信仰。徐谦、孙科、顾孟馀、宋子文、陈友仁、孙夫人等都同我很好。三

中全会选我为国民党常务委员兼秘书。当时，中央秘书三人，除我而外有谭平山、陈公博二人。谭兼任农民部长，不管中央的事；陈是在冷眼看我们，不作工作。所以这时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实际上只有我一人作工作。但是因为各方面有我们同志帮助，这时鲍罗庭是实际上我党的领导者，我常同他谈一切问题，决定办法，诸事都很顺利地进行。陈独秀四月五日在上海和汪精卫发一共同宣言后即来武汉，从此情形就变了，鲍罗庭也受他的影响。自从四月十日汪精卫这个不祥之物回到武汉，于是重心就移到他身上。他同谭延闿这个官僚常在一起，汪住谭家中。谭收容了许多从湖南被农民赶出来的土豪劣绅，朝夕说农民的横暴，说农民运动怎样坏，造了许多谣言，汪渐渐反对农民运动。五月，正当我们二次北伐军事紧急时，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即所谓“马日事变”，杀了我们许多共产党员。夏斗寅、杨森联合从宜昌来进攻武汉，夏斗寅叛兵攻到武昌城外三十里的地方纸坊，可是被我们的同志叶挺率武汉军校的子弟兵把他打得个落花流水。但是汪与唐生智、谭延闿等都不许把他消灭，不准进兵长沙，要用和平方法解决。而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也大叫农民运动过火，不许进攻长沙。于是，武汉的反革命抬头了。在四月以前，国民党都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所以对于我很信任。自从陈独秀在党的机关报《响

导》上登了高一涵的一篇文章说我是共产党员，于是国民党的要人就把我恨极了，事事同我为难。

反共高潮一天比一天高涨。五月底我军攻下郑州，军事是胜利了，冯玉祥从陕西出来，马上于六月初一、二就在郑州约汪、谭、唐、孙、顾等要人开会，商议反共。何键在汉阳兵工厂发出反共传单，压迫工人。冯玉祥到徐州与蒋介石会面。于是武汉政府又投入南京怀抱，而汪精卫与唐生智等还用反共反蒋来迷惑人。七月十五日国民党开分共会议。我直到十五日早晨，把国民党内自己经手的一切事情和秘书长于若愚交待清楚，并写信与汪精卫，说昨晚有一军官带了四个武装士兵来寓中把电话抢去，还留信威胁我，我不能再留，从此去矣等语。我即日就到武昌，后又到九江、南昌，组织“八一”南昌暴动。随叶、贺军南进，我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十月到汕头，后因汤头坑一战失败，到流沙开会，决议把非军事工作人员分配到各方面。我由香港回到上海。我党中央以我认识的人太多，不能在国内活动，遂于十一月派我到莫斯科。

我到了莫斯科，马上就看了许多列宁的著作和国际的、联共的决议与文件。这就使我在思想上、在革命理论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也可以说得到了改造我自己的一个好机会。因为我以前从事革命大半都是因

为不满意现状，想要改造现在的环境，也就是说出于“爱国爱民”，不甘受人压迫的英雄思想。对于革命的出路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是没有什么认识的，只是凭热心毅力去干，有没有错误，自己也看不出来。当本年五月我出席党的五次代表大会时，虽看了瞿秋白同志反对彭述之的机会主义小册子，自己也莫明其妙，听了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言论也未能深刻了解。只有看了“八七”告同志书以后，才明白陈独秀的罪恶。固然是由于我未预闻党中央的工作，不知实情，而自己理论差则是重要的。自从读了马列主义的书籍以后，好像得了一把镜子，把世间一切事情都明白地照出来，我真是高兴极了。自己很庆幸从此可以改造我自己，对于革命更有信心，更有把握。

我到莫斯科即入医院割痔疮，以后又休养了差不多半年，因此，我党六次代表大会我未能参加。一九二八年夏天，林伯渠同志到了莫斯科。因为米夫一九二七年来过武汉，对于我感情很好，就约我和林伯渠同志到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室去工作。我们就在图书馆看了许多书，有许多中国古书是在中国得不到看的，我们抄了许多下来。特别搜集古书中关于中国土地、田赋的片段，得到了一些材料。我们两人曾写了一个小册子，发表我们对于土地问题的意见。自然，不久我们也感到自己的理论还很浅薄，必须到学校去

学习。因此我和伯渠同志就进了由中山大学所改名的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我们是进的特别班，有何叔衡、徐特立、叶剑英、夏曦等同志与我们同班，大半都是在国内作过工作而年岁较大的人。在学习过程中，我对于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特别有兴趣，也学得很好，都得教员特别优等的评语。

在这个时期，校内有托洛茨基派的秘密组织。因为大革命国共合作时代，派了一些非党员来，还有些党员理论、经验都很幼稚，就被托派拉去或迷惑了。还有布哈林右派反党分子也和他们结合起来，企图作反党的阴谋。一九二九年三月，校内讨论党支部工作，各班小组会大半都批评支部工作有许多缺点，特别反对支部书记别尔曼同志。其实他很有能力，立场很正确，反党分子想去掉他，借些日常生活的不满及某些小缺点来攻击支部。当时我们特别班里有夏曦、江元青两人作支部委员，方维夏作候补委员。夏曦勤于支部工作，功课不很好，大家对于他不大满意。而江、方二人则受了反党分子影响，攻击支部。他们的方法是专门攻击小的错误和缺点，目的在于推翻党的领导人而换成他们的人。各班小组的趋势大都如此，我们班上讨论了几天，大概也是如此。大家推我和夏曦、江元青三人起草决议。因为他们都忙，没有会同商量，也没有推定谁来执笔。当要讨论决议的头天晚上，我急

急忙忙地起了一个草稿，到十二点钟后，夏曦才到我处来，他看了我起草的决议后说：这样不好，这会中了他们推翻支部的阴谋诡计。我说：大家讨论的结果是认为支部工作有许多缺点，我是照大家的意思起草的。他说：并不是不要说支部的缺点，而是有人想利用这些缺点来反党。他就详细说了支部委员中有多数人是想反党，特别是反对别尔曼，因为他站在党的立场，很坚定强硬，他们想要去掉他。我说：有这样一回事吗？要反党我就不能赞成。夏说：的确他们有这样的阴谋，你看近来风潮一天一天扩大，不是没有原因的。我说：那我就要反对这些反党分子，我们应该怎样办呢？夏曦同志说：我们的决议首先要说支部的路线是正确的，然后批评工作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没有根据来推翻支部了。于是我们就共同起草了一个决议，并决定由我提出。第二天一早，我就把决议的内容告诉我同房的林伯渠、江浩二同志，并说有人企图打倒支部，我们要反对他们，不要中他们的奸计。林老非常赞成我的意见。江则不同意，我苦口同他说了许久，但他总是认为路线是党的，当然正确，支部不能有路线，所以不要说支部路线正确不正确。到中午我们班讨论决议时，果然争得很厉害。三人起草，我提出的是我和夏二人的意见，江提出的只是他一人的意见，当然先讨论我的。我很诚恳地说明讨论党的

工作必先讨论它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是否违背了党的总路线，至于工作的好坏也要批评，但那是次要的。我起草的决议上都把同志们批评的意见具体地写上了。因为我平时对同志们的关系都很好，大多数同志都还没有被反党分子拉去，所以虽然有方、江等拚命反对，但表决结果还是被大多数通过了我起草的决议。这个决议后来也作为十天大会决议的一个张本。这是我们与反党分子斗争的开始。

过了三个月，支部开总结大会。这时从中国来了一批新学生，且有一些坏人，如河南的钟某等，于是反党分子更得势了。联共“左”右派反党分子的联合也影响到校内来，校内的“左”右派也暗中联合起来反党。右派借反托派的幌子来拉拢人，当时李剑如最积极，是他们利用的工具。这个大会开了十天，闹得最厉害。区委书记来讲讲话，他们几乎要把他拉下来。当时博古、杨尚昆等同志都当翻译，他们硬不要他们翻译。沈泽民同志、洛甫同志都遭到他们反对，他们几乎要把沈泽民同志赶出会场。在大会前不久，我同何叔衡、徐特立、林伯渠等四人到列宁学校彭泽湘处去玩。彭同我们谈了四个钟头，说到农民如何不满，各处地方都有农民暴动，秘密的消息是前途非常危险。何老非常诚恳地向彭说：泽湘，你是党员，既然知道这些危险，你就应该向党说，不能袖手旁观。彭说：

党的政策如此，说了也不听，也无地方可说。我们回校，第二天很早何老即对我说：昨晚一夜没睡，想到泽湘所说危险，我们何能坐视，我想应如何挽救。我说：我们是相信斯大林的，他的政策一定不会错，彭的说法是布哈林的意见，反对发展重工业，反对压迫富农的意见，事实未必如他所说的严重，我们相信联共党，相信斯大林同志，不必信他的话。这时联共党已经开始同布哈林斗争了。在大会上，我们看见会场的空气很严重，特别是彭连清姊妹常到彭泽湘处去，她们活动的很厉害，我们料到一定是右派在作怪。因此，我同何叔衡两人都在大会上把彭对我们所说反党反领导的话详细地报告了。这虽然起了一点作用，但反党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他们在墙报上骂这些站在党的正确立场的人，讽刺为布尔什维克，并说布尔什维克只有二十八人了。虽然他们闹得这么凶，但有联共党正确的领导，大会的决议仍然如我们特别班的一样，得出正确的结论。反党分子推翻支部的目的没有达到。大会后即放暑假，学生都到南俄克里米亚海边去休养，在休养中托派更有组织了，“左”、右派联合也更密切了。

九月返校后，反党分子更厉害了。我在体操中把右脚跌伤，在医院中住了一个多月。我们特别班在这一时期中，居然把前次的决议推翻了。何老到医院来

痛哭流涕地对我说：你不在家，我们只有林老、徐老、夏曦等几个人占了少数，他们把你和我们大骂了一顿，说以前的决议都是错的。我听了很气，但亦无可如何，只有再接再厉地再斗。当时，联共正开始清党运动。我们学校也开始清党了，在头三个月清党过程中还没有发现什么。到第二年（一九三〇年）三月，有赵某自首后自杀，他们的组织部长也自首了，把他们的组织结构公布了。逮捕了三十多个重要分子。于是，清党顺利进行。我们特别班大家起来纠正错误，推翻了他们的反党决议，并把小组解散了。清党十一个月到七月才完。清党委员会认为何叔衡同志党性很强，立场坚定，特别许其即转为联共正式党员。我同林老、徐老等都认为清过党了，以后要到群众中多作群众工作。七月我们毕业了，这时候我同何老、林老、徐老告发了彭泽湘的反党行动。联共监察委员会召集了一个会来讨论。当时我们要求开除彭的党籍，因为雅诺斯诺夫斯基的老婆作列宁学校的校长，袒护彭，所以没有开除党籍、学籍，仅予严重警告，派到工厂去工作。彭回国后终于叛变，现在第三党。

一九三〇年九月我同林老、江浩等共十二人由联共党派到远东工作。我到伯力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作主任，林老等到海参崴党校作教员。我在伯力工作一学期后，一九三一年一月调到海参崴党校同林老一起工

作。这一年六月，刘斌同志到海参崴和我谈拉丁化新文字问题，因为苏联正在进行扫除文盲工作，想用新文字来扫除中国工人的文盲。海参崴党部要我作一次新文字报告。报告后引起了许多人的兴奋和注意。十月由中央派了肖三同志、列宁格勒科学院龙同志和石萍青、刘斌等同志到海参崴来，会同我们发起召开远东中国工人第一次拉丁化中国字代表大会。大会在新的中国戏园子举行，到会工人一千多，热烈地欢迎新文字。大会制定了新文字字母及原则和写法规则等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推行的新文字的创始工作。我曾写了一本《新文字的新文法》，和一本《中国旧文字的起源和新文字的创造》。当时海参崴新成立一个苏联科学院分院，推举我为该分院中国部的主任。我曾在该院作了一次中国新旧文字的报告。一九三三年又在列宁格勒科学院作了一次报告，大家都认为满意。我因为要说明中国旧文字的起源，不得不拿古书来研究。古书上说：伏羲画八卦，造书契。而且《说文》第一个“一”字的解说：“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好像八卦是文字的起源，因此我就细细研究一番周子的太极图说及朱子注解的《周易折中》等书。用新的辩证法的眼光来看，觉得太极阴阳之说有一些是合乎辩证法的，《说文》所说的太始就是太极。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又说：“易

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朱子注解：“然太极之所以为太极，却不离乎两仪、四象、八卦，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指一阴一阳为道则不可，然道不离乎阴阳也。”（《周易折中》卷第十四、第二十六页）朱子解释两仪说：“仪匹也，如俗所谓一双一对。”（同上卷第十九、第十五页）由此看来，中国之所谓道，就是包含一阴一阳的一个整体东西，而一阴一阳就是在一个所谓太极的一个整体东西之中，两个相反相成，对立而统一的东西，和辩证法的一个原则对立的统一（矛盾的统一）相同。从此我觉得中国的易经等书还值得我们去深刻地研究，这是古人朴素的、原始的一种对于辩证理论的初步认识。西方希腊时代“赫拉克里特”等的学说也同样有许多辩证法的成份。这是人类在实践中得出的一些真理，但只有到了马克思才能得出辩证唯物论。

在莫斯科清党期间，托派分子及有问题的人，大概不拘押的大多数被派往远东和西伯利亚一带作一些工人工作。联共中央派我们十多个人到远东，也是为了把远东工作搞好，不要被托派所搞坏。因此，我们这批人到了远东就帮助较好的干部，如张锡畴、陈道南等和托派作激烈的斗争，收到了一些效果。同时，托派攻击我们也厉害，稍有不慎即被他们打击。一九三一年秋，莫斯科列宁学校的托派周大名、董亦湘等

又被派到远东边疆党部内来工作。当时远东出版部要我编一本中文教本，我因事忙，自己无暇作文章，而且也写不好，就只摘录了斯大林同志及一些名人讲演，选录了沈泽民同志在莫斯科编的一本中文教本上几篇文章，编成一本中文选集。实际上是潦草塞责。此书刚出版，就被周、董等抓住了，在党部告我，说我犯了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我听到这消息为之一惊，急把他们所指的错误细细检查，果然在我自己作的文章里发现一个错误。就是简单地说苏联消灭富农，而没有说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来消灭富农，这是很大的错误。而且在沈泽民编的书里所选的那几篇文章中，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国家问题、道德问题等等都有许多错误。因为我认为沈泽民同志深于理论，立场正确，他所作所选文章没有问题，故并未考究他的内容，用剪刀一剪，就编入书中。这自然是我的大错。于是，我花了半月时间，把马、恩、列、斯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夜以继日地加紧研究，使我深刻地了解了这些问题。托派所指责的不必说，就是他们没有看出来都把它排列出来，作为我的死敌，用马列主义的理论作武器，向他们进攻，比托派肤浅的指责要深刻得多。因为我认为党员个人的错误就是党的一部分缺点，每个党员无论错误是自己的或他人的，都应该当作党的污点一样深恶痛绝，万不能因自己之故加以隐蔽辩护。

因此，我把我的错误来源，极坦白地、极忠实地说出来，把错误之点极明确的指出，引证了马列等许多文章来证明这些错误，并愿和这些错误观点作斗争等等意见，写成一篇很长的声明书，向党的支部提出。并声明无论我自己的文章或选别人的文章上的错误，我都愿完全负责，且誓必和这些错误做斗争，以保持布尔什维克党理论的纯洁。并请党给我以严重处罚，以作为党员不加强学习理论和作事轻率、疏忽的教训。随着，党就开了支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会上，我诚恳说明我的错误，并不仅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重要的还要同它斗争，请党给我以处罚。许多同志都说我对党忠实，承认错误坦白诚恳，了解错误深刻，改正错误勇敢坚决，是布尔什维克党员的真实态度，处罚应从轻。有的说应予以轻微的警告，有的说予以劝告就够了。最后，林伯渠同志说：“我认为不必予以处罚。因为党之处罚党员，是以其犯了错误以后，或辩护，或掩饰，或不坦白承认自己错误，或勉强承认而不了解他的错误，种种都是对党不够忠实。玉章同志素来都是对党忠诚的党员，此次所犯理论上的错误，或为他自己写的文章，或为他选录别人写的文章，他都坦白诚恳地承认错误，并且加深理论来了解错误。并把错误不仅当作自己个人的污点，而且当作党的污点要无情地和它斗争，以后还要和这些不正确的理论

作斗争。这是我布尔什维克党员光明磊落的态度。党之所以给党员一种处罚，正是望他成为一个好党员。今玉章同志自动地做到了这点，我以为不必给予处罚，只须作一决议，指出他的错误，嘉许他诚恳地承认错误，加深研究理论来了解错误，并愿和错误作斗争，是合乎党员应有的态度。最后还希望他加深理论研究以完成他愿与不正确理论作斗争的任务就够了。”大家一致赞成这个提议，照林老的意见作成一个决议，以作党员的教训。从此党员群众以及负责同志不仅不以我犯错误而轻视我，反而更加信任我，信仰我，尊敬我，以为我对党忠诚，可以为模范。我觉得托派对我这一打击，使我知道了必须加深研究理论及作事不可马虎，这是我要感谢他们的。

一九三二年秋，教育部派人来考察远东教育情形。我在大会上引了列宁致加普利岛学校学生的信中说：“一切学校里边，最重要的是教课的思想政治方向。什么东西决定这种方向呢？完全和绝对由教员成份决定。”我强调教员一定要有纯洁高尚的品质。当时，在海参崴除党校外还有一个学校，其中教职员多为托派，他们以为我骂他们。第二天他们全体动员出席大会，说我的话有意诬害他们，并且说学校的方向，并不是决定于教员的成份。一场大辩论争得几乎要用武，结果特派员批评了他们的不对，说我的话是正确的，

才算了事。

四中全会“反立三路线”斗争，也由杨松同志在莫斯科列宁学校和周大文等斗争后带到海参崴来，并带来了李立三所写的报告。报告说：“集体农庄如果出于农民自愿的要求组织，我们不能去阻止。”我觉得立三的说法完全不对，他不但把中国革命和苏联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混为一谈，而且也把党的领导、党的政策跟着农民的尾巴走。我写了一个论中国土地农民问题的小册子来驳斥他。杨松同志到远东来工作，我们常常接近他，不但对于我们反对托派有帮助，就是对于我的理论学习也有帮助。我同林老和他都是很好的、很亲切的同志，但并不因为亲密而就忽略了批评。当“一二八”上海十九路军与日寇抗战十多天时，杨松同志在海参崴党校作报告，他以为十九路军的抗战有美国的背景，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十九路军是军阀的军队，不及满洲东北一带的农民游击队，所以我们不必帮助十九路军。当时我听了觉得大大违反了我的意思，也违反了一般群众的意思。因为凡是中国人人都深恨日寇自“九一八”以来的横暴，只要有人起来抗战，大家都欢迎的。如果以为十九路军不是革命的军队，中国抗战得到外国的同情就是为帝国主义作战，这是不对的。他报告完后，我立刻提出反对的意见，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因为他受了卢森堡以为帝国主义时

代不能有民族革命战争的影响，忘记了列宁所说：“民族革命战争可以转为帝国主义战争，但帝国主义战争也可转为民族革命战争”的真理。他随即接受我的批评。他从善如流的态度，是值得赞扬的。

一九三二年我和林老等已由联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这年夏，我和林老接到王明同志从莫斯科的来信，要我们到莫斯科去。当时我们很想回国参加革命实际工作。六月林老到莫斯科去了，我因《中国新文字的新文法》还没有完成，并且要开拉丁化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以迟了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六月我才到莫斯科。到莫斯科后，我本想同林老一样马上动身回国，可是我党驻国际的代表团要我担任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工作，因此九月我又到东方大学工作。自从一九三一年冬，王明同志到了莫斯科，在国际作了“反立三路线”及中国红军苏维埃发展的报告以后，中国代表极为国际所重视，改变了从前在国际被人轻视的局面。一九三三年六月康生又到了莫斯科。这时，中国英勇红军已打破了蒋介石四次围剿，所以每次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的报告发言，都极为一般人所欢迎，中国在国际的地位增高了。当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未上台以前，德国共产党是除联共外，世界上最大最有力量 的党，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国会选举时，共产党人获得六百万票。而在东方，则有拥有红军数十万，有几

个大的苏维埃区域的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们认为德国和中国的共产党是共产主义发展在苏联外的东、西两个铁锤。一个是代表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一个是代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可是革命也教会了反革命。反革命知道旧的方法不能统治下去了，于是就拼命向法西斯蒂的道路前进，改变了斗争的方法。这时各国反革命的法西斯抬头，而革命的统一战线也就出现。当德国共产党壮大的时期，法国基本上与德国是世仇，所以反对共产党，也反对苏联。到了德国法西斯这个反共急先锋上台后，法国着急了，不能不联合苏联来制压德国，因此也不能不改变反共的态度。一九三四年二月法国共产党联合社会党、激进党反对法西斯暴动的胜利，就开辟了统一战线的先声。五月激进党素主亲苏的领袖赫里欧来苏联参观，法苏协约成立了，法国共产党也壮大了。

中国自日寇“九一八”进攻到华北事变以来，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与服从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党把“九一八”后提出的，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中央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提高到建立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一九三五年六月初，我们在莫斯科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封闭国民党、屠杀爱国人民等等使人难忍的消息，便

急电在南俄休养的王明同志回来，共同商量对策。在党中央和国际指导下，由王明同志起草了一个《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经过大家热烈讨论，作为党中央及中国苏维埃政府宣言，这就是“八一宣言”。当时，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开会，会中，这宣言在国际、国内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当时是非常兴奋的，觉得中国革命又开了一个新局面。其时，方振武秘密到了莫斯科，要见我们同志。代表团以正在国际大会期间，不便见客，派我去同他一谈，并把“八一宣言”给他看，他很高兴地到美国去宣传了。在国际七大会上，王明、康生、周和森（高自主）、李光（滕代远）和我都发了言。说到党的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红军英勇斗争和长征伟绩及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等等时，常常引起欢呼，各国代表团高呼口号，国际间友爱团结，使人无限感动，无限兴奋。大会结束后，代表团要扩大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并且要在巴黎办一个印刷厂，以加紧宣传统一战线政策，就派我秘密到巴黎去作这工作。

十月我从列宁格勒秘密动身，经过许多曲折，十一月初到了巴黎。同巴黎同志接上头后，正拟开展工作，忽然法政府命令停止此报，我就和法国同志商量如何起诉复刊。法国同志说：这不是法律问题，是政治问题，我们法国虽然言论自由，但遇外国政府抗议也往

往无理地封禁外国报馆，这次是由阁议停刊，显然是为应付外交关系，起诉是无办法的，但有一办法，改一个名字继续再出，政府是不会干涉的。我们正是为了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利用这报纸，而且纸版是由莫斯科打好航空寄来。这时统一战线正在开展，各地要求这个报纸心急，特别是世界各地的华侨纷纷来函订报，无暇起诉，也不能停止一期以引起各地疑惧。因此我就电商代表团，得到同意，改为《救国时报》。在中文只添一“时”字，而在法文则同样的意思另用几个字，急急把苏京寄来的纸版改一个报头，居然按期于“一二九”纪念日出版了。此报出版后，大受欢迎。我们用了许多方法寄回中国。由于党的新的统一战线政策，适合时势的要求，因而这报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在莫斯科时，陈云同志为我写信介绍我向上海商务书馆买汉字铜模。我去信后，到一九三六年三月铜模才运到巴黎，于是巴黎的印刷所也成立了。

同年一月，我在巴黎召开了一个中国旅欧共产党员代表会。到会的有英、德、比、荷及法国各重要地方的代表共十余人。我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新政策的报告；会议讨论了组织各国华侨抗日救国会和筹备抗联等计划，大家非常高兴，生气勃勃。多年散漫沉闷的在各国的同志，有了党的新政策，有了

联合，并有了代表团的领导，气象为之一新。大家觉得从前与国际中国代表团来往通信不易，难于得到代表团的指示，以致工作不能开展，因而向代表团提议成立一个“中国代表团驻欧办事处”以领导各国中国党员的工作。因为各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情形不熟悉，对于华侨不能了解，而且有些还轻视，因此各国的中国党员，可以说毫无指示可遵循，因此也就毫无工作成绩，所以很希望有一个统一领导机关。但因这样会违反国际的组织原则，代表团未许可。当时闻胡汉民来法，住尼斯海边休养，特派儿子震寰持函往见，约其见面一谈统一战线政策。渠见信后不敢作答，知其已无朝气，行将就木矣。

三月间，世界学生联合会特为援助我国学生救国运动在伦敦开大会。我因不久前在比京开国际青年代表大会时，我们的代表数人因为要扩大统一战线，把国民党比较左倾和我们接近的王海镜推为主席团成员之一，但他反而不要我们的同志在大会上讲话，我们同志也忍受了。这次在伦敦的大会，再不能蹈此覆辙。所以，我就写信与德国支书，力说我们一方面要顾到统一战线，一方面要保持党的独立性、斗争性，断不可因为统一战线而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并要他们到伦敦后找侯雨民好好筹商办法等等。这时因为时间已迫，稍慢即无济于事，我们又没有约秘密通信方

法，前此好多次信都没有失误过，以为不要紧，便粗心大胆地用钢笔写了一个指示信，急急挂号寄去。谁知，旧的负责同志王炳南刚交代工作与刘光德同志，他搬了家，我信到后两天，他才到旧房东处去取，见信已拆开。在我们的代表正出席大会时，国民党特务由德国用“民族先锋社”名义把影印的我这封信分散会场，说这个大会是共产党所召集、所操纵的，并由德国用留德中国学生会名义致电大会，反对我代表出席。幸而柯乐满驳斥了他们，大会没有被他们破坏，并由大会筹备会回一封信反驳他们。大会代表返巴黎，说到大会情形，并把影印的信给我看，果然是我用平洋假名所写的，使我嚇然一惊。大约是中国大使馆秘密偷去了这信，影印后又交还房东。以后各处都发现我这封信，且有印得很大的，张学良在西安也接到。可见，驻德大使程天放专门作侦探我党工作。随着德国□□□就捕了刘光德同志及许德瑗等反帝同情分子五人。这是程天放串通法西斯干的。我们发动了各团体向德国抗议，并要求使馆向德国抗议、保人。自然，程是不会做的。不久，许等释出，而刘则被驱出境。代表团得此消息后，急电我返莫斯科，恐我也会受危险。因我到法国是非法居住，没有居留证，是经不得检查的。当初到巴黎时，报馆被封，同志们都不要我到报馆去，但每天我总要设法去一次，我常于咖啡馆

中约同志谈话或开会，有些时候风声很紧，使同志们异常耽心。我一到巴黎即由法国同志送到一同情分子的旅馆中，约住有十个月之久，毫无一点破绽，固然是由于主人的掩护（他儿子是党员），但主要的还是我小心谨慎，举动大方，能保持秘密（店主人很喜欢我，一九三七年我再到巴黎去看他时，告以中国统一战线完成，抗战胜利有望，他一家都异常欢喜）。一九三六年三月陈铭枢、胡愈之等到巴黎，我与畅谈统一战线，并办理到莫斯科手续。当时代表团已派吴克坚同志来代替我的工作，要我马上动身返苏，因我要成立印刷所和牙齿补好后才起程。

七月，回到莫斯科，到赵毅敏同志主持的东方大学乡下分校任教员。当时需要一本用马克思观点和斯大林的新方法来写的历史，于是我就着手编中国历史，并在校中教授，印成了自史前时期到明朝一部讲义。写得不十分完全，自己也感觉不满意，还须修改。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一段，曾登于《解放》五十二期。国际教育处又要我写一简短的中国历史大纲，也写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学生的情绪很好。每期墙报，我为他们用简短的警句配着动人的报头图画，常常使人异常感动。

双十二事变的消息传来，蒋与许多要人被捕，尤使全体兴奋。遂闻恩来同志到西安和平解决，将蒋释

放，感到我党中央政策的正确，气度的伟大。使全球震惊，使国民党顽固分子哭笑不得，使同情我党的人眉飞色舞，全国舆论与人心莫不为之折服。以此知我们的统一战线将要达到成功的时期。尽管国民党对我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书犹装腔作势地作出可笑的决议，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李石曾等恢复总理三大政策的提议，已表现国民党内大多数人是赞成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随后，我党代表到庐山参加会议与蒋磋商条件。七七事变发生，全国抗战开始，红军改为八路军，开赴前线。在全国各战线溃败中，八路军首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大胜仗，稳定了全国人心，提高了全国抗战的勇气，打破了日寇不可抵抗的谎言。当时全国振奋，国际同情，中国的国际地位骤然提高。苏联自不必说，在精神上、物质上都给中国以很大的帮助，就是欧美各国也一致欢迎、赞助中国抗战，比诸同情亚比西尼亚和西班牙的抗战，有过之无不及。尤其各国反战反法西斯的团体及爱好和平的人民，莫不拥护中国的抗战。而中国人民也深知要抵抗日寇法西斯军阀强盗，非有国际上大大的帮助不可。许多人希望苏联出兵帮助中国抗日。当时，我代表团深知苏联政策，要有英、法、美各大国多多帮助中国，苏联才好更多的帮助，不然反会引起误会。因此，国际和中国代表团想派一些人到欧美各国去作

宣传工作。最初拟派王稼祥同志去领导，后因王同志别有任务，就决定派我到西欧去作国际宣传工作。国际又派法国同志京尼维帮助我，并号召各国支部及各国劳动人民帮助中国抗战。当时蒋介石的代表张冲到了莫斯科，与我代表团有所接洽。王明同志介绍我与张秘密相见，并要他打电与蒋：是否同意派我到西欧去作宣传工作。蒋回电赞同。张就在使馆为我办护照。当然并有蒋要派孙夫人宋庆龄等赴欧美作国际宣传的消息。

我于一九三七年十月革命节前一日同震寰从莫斯科起程，十一月十二日到了巴黎。到后即会同饶漱石、陆瑾、吴克坚、卢竞如，共六人分任工作。我听说李石曾在巴黎，马上打电话给他，他高兴极了，说明天就要去比京，约我立刻去谈话。他说，他已经决定几天内就要赴莫斯科，要我同他去，一面作翻译，一面为介绍去见苏联要人。并说，现在国内和平妥协空气很高，望苏联马上出兵帮助才能稳定抗战的局势。还说，华盛顿九国公约会正在比京召开很重要，他就要去，约我同去。我说：我刚到，不便回去，且回去也须得到代表团的许可，恐难办到。他一定要我去电询问代表团，我答应了，并约同赴比京。当时南京危急，陶德曼代表希特勒出面劝我屈服，亲日分子正在策动和议。比京会议中国代表有顾维钧、钱泰、胡世泽等。

顾是反对妥协的，钱、胡都是我在巴黎时的同学。我同李到北京，力说抗战必得胜利，万不可中途妥协，请他们联合各驻外使节电南京蒋反对和议。胡世泽秘密对我说，孔祥熙初本主战，现亦主和，恐难挽救。我说：决定政策在蒋，你们可助他一臂之力。我虽不知他们曾否电蒋，但李告诉我，他得蒋电不愿妥协。果然，国民政府迁渝，蒋有十七日的强硬宣言，局势为之稳定。我得代表团电，嘱婉谢李的盛意，但不能同他赴莫。李随即到苏京，据说见了伏罗希洛夫。他对李说，苏联帮助中国不成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推动英美更多地帮助中国，只要英美帮助一分，苏联就可以帮助十分。李回来对我谈很满意，并说我们应加紧作英美的宣传工作。后来孙科到莫斯科之后到巴黎，同我也是如此说。陈公博到意大利暗谋和议，到巴黎时我去见他，力言不可言和。我在巴黎作许多公开讲演。在国际援助西班牙的大会上，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法国“中国人民之友社”所召集的援助中国抗战大会上，特别是在十二月十一日，由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特为我招待法国新闻记者席上，我作了较详细的报告。后来把这个演稿加以相当补充和修改，印成英、法文的小册子，题为《中国能战胜日本》，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伦敦世界反侵略大会上散发。我是由世界反侵略中国分会电派为代表出席这个大会的。我同饶漱

石、震寰到伦敦，会同陶行知，李石曾，王礼锡等出席大会。我当时作了一篇《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阶段》，饶用赵建生名义出了《为自由和平而战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小册子。当时我们屡次向顾维钧及南京当局建议要扩大国际宣传工作，并拟具一些计划书，他们总是推托，不和我们合作。使馆有一专门作国际宣传的杨光望，他花了十万法郎要巴黎最老、最反动的《巴黎时报》为他出一小册子，上面印些北京天坛、前门等照片，和蒋介石、林森等相片，使人看了不但无兴趣，而且要作呕。因为这些官僚，只知宫殿及政界人物，根本不懂得现在世界是怎样一回事，所说的话无不外行。我们所言所行都是与时代潮流适合，很受人欢迎。只可惜我们得不到一个钱的帮助，只是在工人、商人、学生中募集一点钱来出报纸刊物。幸而有《救国时报》作我们的喉舌，还有巴黎《人道报》和同情我们的报纸及《中国人民之友》等等为我们鼓吹，也收到不小的效果。但和西班牙抗战的国际宣传相比，则相差太远了。我二月到伦敦时，曾同陶行知、饶漱石、震寰到马克思墓前去致敬，并将其碑文抄下来，这使我非常庆幸。我的国际宣传工作已告一段落，即将回国共赴国难。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我同震寰从法国起程回国。路经新加坡、西贡，在华侨中作了一些宣传工作，

特别在西贡停船数日，华侨救国团体代表及国民党党部都来谈话，并请去讲演，颇有不小的影响。四月二十一日到香港，二十四日乘飞机到了汉口。十一年前活动的地方又重新到来，使我有无限的感想。我到武汉后，同志间不用说，就是新知旧友、青年老头，莫不欲探知世界大势及国际间对我抗战的态度，特别是苏联是否出兵援助中国，大家一定要问，国民党的旧友尤其注重这个问题。《大公报》的张季鸾和张群都是同盟会时代的同志，季鸾约我到他家谈了一次，张群又约我和季鸾更深谈一次。季鸾说：我们预计中国抗战不久，国际一定要起大变化，苏联可在远东出兵，所以我们各种准备至多不过能支持一年，现快到一年了，如果苏联不出兵就无办法支持。张岳军（群）说：日军要占领一个地方，虽然不能如预定的期日占领，但终究必占领，占我一据点后，始终我就无力收回，如果没有外援帮助，胜利是不可能的。我把苏联之处境及其援助民族革命战争的国策详细说明：苏联能否出兵我们无从知道，但它始终是要帮助中国的，主要的还要看英美的行动；国际反法西斯是一致的，法西斯必败是一定的；中国抗战固然要国际援助，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以中国的人力物力，只要能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发扬民主，顾及民生，一德一心，不屈不挠，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我很恳切地和

他们讲，并说明我党的政策，他们都认为是对的。我们旧交很深，他们也相信我是一诚实无欺的人，而我也把我相信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和他们讲，而且说明中山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是合乎中国现阶段的，我们要共同奋斗。谈得还很融洽。他们两人都是蒋最信任的，也最有手腕，所以我以诚恳的态度，深刻的理想说之。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但是坚持抗战中国必得最后胜利，这一点从国际国内形势看来是可信的，我只要他们了解这一点，不中途妥协就够了。

六月四日我由汉口飞重庆。头晚恩来、王明同志等开会一夜，我因要早起，早睡了，不知商议何事。动身时，恩来要一同志交一纸与我说，中央社有一电，说国民党监委会恢复了我们的党籍，我们已经交涉好了，各报不许登出，你到重庆如果该地报已登出，则把这紧急声明也要报馆登出。我匆匆即乘机去，到渝时有许多人来欢迎。《新蜀报》主笔周钦岳，大革命时代是我们的同志，主持该报多年，现在还是同情我们。与我素来交厚。他见面后即说：国民党恢复了你们的党籍，这于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前途很好。我说：这还要好好考虑一下，缓下再谈。许多人就约我到青年会作一长谈。这时第一重要的就是今晨各报登出恢复我们的国民党党籍问题，因为几个报馆的负责人都在座，我就说明有三点我们不能接受：第一，两党

合作关系是否恢复民国十三^①年之办法并未商定；第二，事前未通知与征求我党中央及我们的意见；第三，这恢复党籍名单中，有张国焘、陈独秀等为我党开除了的人，和我们同类相待，未免滑稽，更不能忍受。大家听我说后，都认为有理，我就把下面的声明书给他们看，请他们登。

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人紧急声明：

顷闻中央社重庆电，中国国民党监察委员会三日上午八时开十四次常会，通过恢复陈其瑗等二十六人党籍一案，内列有周恩来、林祖涵、吴玉章、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叶剑英等七人姓名。按鄙人等系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共两党虽在政治上已告合作，但组织上两党合作关系是否恢复民十三年之办法并未商定，而对恢复鄙人等国民党党籍事前更未通知与征求本党中央及鄙人等意见。因特郑重声明，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委会此项决议关系鄙人等七人部份，鄙人等实不能承认。

周恩来、林祖涵、吴玉章、毛泽东、
董用威、邓颖超、叶剑英等七人同启

六月三日

① 即一九二四年。——编者

此声明当晚即由重庆办事处周怡同志分送各报馆作为广告发出，但当时张继在重庆，一闻此信即请各报缓登。第二天一早即来找我，苦苦说这声明万不可登出，否则影响合作甚大。我说明各种理由，他说是他们的错误，好在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决议还要经过中央委员会批准才能成立，还可以想法补救。我说报上已公布，我们不能不表示态度。他说暂缓，我们双方打电到武汉去商量。于是，我打电与恩来同志，他打电与蒋。随即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间接声明取消此案了事。这也是两党合作中一段史实。

在重庆住了一星期，每天都是忙于会客及各处欢迎会讲演或赴宴会。我都利用了这些公共场所、会议讲台，广泛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及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抗战必得胜利；同时也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及其帮助中国的真诚；并时时论到社会发展的前途及中国革命由三民主义可进到共产主义，中山三大政策是合乎中国现阶段的政策等等。我本着国际及我党的新政策讲话，并带有一些书籍及我的新印的《抗战言论选集》送人。这时我们能公开宣传，且四川旧军阀统治多年受蒋反动宣传尚不深，正值抗战热潮高涨，所以我的言论颇能动人。加以我们在辛亥革命时代的旧同事很多，现在有些人还有高位，即在野也算名流，如同盟会二十余人在“留春幄”欢迎我，

谢持、黄复生二人都风瘫不能行动，也乘舆莅会。谢且不能言语，使我不觉涕零，特别同他周旋，用好言安慰。临行，特到他寓所去看他，谈到深处，他只惊呼，不能用言语表达意见，深以为苦，然察其表现仍甚亲切。因为他是辛亥革命我初回到重庆时，我们秘密商量起事的第一人，以后我们也很亲密。只是他反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与邹鲁成为反共先锋，西山会议派的要人。现在，他同邹鲁一样赞成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我感觉这些旧同盟会人对于我的言论，认为是正确的，而且他们对蒋是不满的。有些人以为我在广大群众中所说的都是表面的官话，还想以旧交探问一些秘密。如在重庆时有董鸿诗、朱叔痴、李伯玉等，在成都时有李伯申、吴永权、李炳英、李培甫、邓子纯、向先乔等特别约几个最知心的人和我细谈。我也很坦白地告诉他们，我们共产党看清了世界发展的前途，作事是光明磊落的，并无奸滑阴险的诡计（他们许多人是知蒋无诚意的、不可靠的，我因不便明说而只说我们以诚待人），只有以马列主义正确的理论与政策才能救中国。他们知道我是忠实诚笃的人，言必可信。而我也以真诚劝他们和我们共产党精诚团结以救危亡。

十一日乘飞机到成都，同样是忙得不得了。早晨未起即宾客满座，夜深还有人来会谈，每日三餐均有宴

会欢迎，各种同学会、学生会、救国会、妇女慰劳会、青年会等等，真有日不暇给之势。当局邓锡候、潘文华、刘文辉、王缙绪等也都特别招待。以我在川曾作高师校长，对于学界多有熟人，学生不用说，就是一九〇三年在日本最老的同学如周道刚、徐申甫、毛沛霖、张师孔等几十年未见的老友，都特设宴欢迎，愿听我一谈国内外的形势，这真是我一个好的宣传机会。报馆、电台的人也要我谈话、广播，足足忙了八、九天，于二十日返荣县家乡。

二十一日到家，在乡场双石桥群众欢迎会上作了一个讲演。二十二日在家招待四邻农民、故旧亲朋到我家来会餐，藉以作一场讲演。有些农民请求我为他们要回募去当兵的子弟，我力劝他们要为国出力，就是牺牲也是光荣。我不但不能为你们要回子弟，我还要劝你们未去当兵而有力可出的，多多去当志愿兵。并说西班牙抗战的英勇，国际志愿兵的高贵，极力鼓吹青年去当志愿兵。因此我们县里以后志愿兵最多，因此还引起了国民党的疑惧，县长受了批评，几乎受处罚，以为另有用意！真是“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曾县长及城内许多人联名要求到城内去讲演。二十三日一早急行四十里到城时，县长率许多人在南郊欢迎，全城挂旗志庆。我到一公园欢迎宴会上作了很长讲演，同时有一妇女短期训练班刚毕业，请我讲演，午后二

时又到中学校去讲演，直到晚始赶回家。次晨即应乘车赴重庆，因得周怡同志电，参政会于“七七”开会，已为我买二十五日飞机票，二十四日无论如何要到重庆。因王明同志约我必须于参政会前十日到武汉以便联络各方面。

二十四日晨动身，因汽车屡坏到二十五日晨始到渝，即赴飞机场乘飞机赴汉。到汉口后，我们与救国会、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及黄炎培、胡景伊、张表方等等每天轮流请客，讨论对于参政会的提案等问题，收效颇大。因此我们在参政会的提案常常得到四五十人甚至七八十人的连署。国民党以为我党只有参政员七人，提案要二十人连署，大概不易提案。而事实我们有三四十人的坚固堡垒，同情者有八九十人，占了出席人员半数以上。我党在参政会的信仰很高，所提案件俱能为国家民族前途奠定基础，而且也适合于现时团结抗战的需要。这时正是自双十二以来国共合作发展到最高点时期，国势有蒸蒸日上之势。我因参政会一连开了十天无休息，大会外有分组会，有机关欢迎宴会，还有我们各党派的预备会等等，每天不停地在活动。这时汉口异乎寻常之热，夜间不能安眠，七月底我的痔疮大发了。以前痔疮发时只觉便血，而这次异常之痛。八月初我入武汉疗养院，医生要割痔疮，我因为已割过两次，而且这时武汉战事危急，恐割后不

便行动，故未开刀。

在参政会要开会的前几天，有一事值得注意，就是傅斯年、梁实秋等想在参政会提弹劾孔祥熙案，其用意在于去孔拥汪精卫上台。七月一日傅约我们到梁实秋家谈话，王明同志要我一人去看一看，我到时有许德珩、李璜等数人。傅说：参政会是代表民意的机关，要为人民作事，孔昏庸无能，且多劣绩，我们应该提出弹劾案。当时他是想利用我党参政员出面，同他们一起提出弹劾案才有力量，因为我党在政治上的信用地位驾乎各党之上。傅说后大家都不发言。傅问我的意见，我说：今天我本来不知讨论什么问题，我不能代表我党发表任何意见。只以我个人的意见来说，约有三点应该考虑：第一，参政会虽然是团结各党各派讨论政治的机关，为统一战线具体的形式，将来可发展为代表民意的机关。但现在还不是民选的民意机关，政府所给与的权力也是很有限的，是否许可像各国议会一样，不信任政府案一经多数通过就能生效，尚属问题。其次，我们苦心孤诣，用了无限力量，好不容易才弄到全国各党各派一致团结、全国统一。一致对外才能统一，精诚团结才能抗战。因此，今天参政会的任务在加强团结、巩固团结以求得抗战胜利，绝不能和政府处于对立的态度，以动摇团结抗战。第二，现在我們也不满意孔的行事，但他还能奉行蒋的命令，

跟随坚决抗战。倒孔后以何人代替？如果换一人更不如孔，甚至有违反蒋坚持抗战的意见者则更坏。第三，现在国事大家都信任蒋、委托蒋，蒋实在是政府的主持者。孔不过是蒋的代理人，本人并无什么能力，也无独立主张，一切都取决于蒋，这是事实。弹劾孔就无异弹劾蒋。参政会本是团结的初步成果，如果和蒋闹翻了脸，这是莫大的损失，何必在困难紧急关头，来这一不必要之行动呢？傅大发脾气说：我们应代表人民的利益，发表人民的意见，这种腐朽官僚还不弹劾，还配说代表人民吗？我说：请细细考虑一下吧！许赞成我的意见。他人未发言，他们主要是看我党的意见，于是相约四日再开一会，并要我询问我党持何意见。我回来报告王明、博古、林老、董老、恩来、颖超等同志，开了党团会议。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并知道傅曾写过长信攻击孔，并主以汪精卫代孔。傅等暗中运动想作部长，甚至有汪出便于与日妥协的阴谋等等。四日我把我党不赞成此举的意见提出，把这一风波打消了。不然首次参政会就要闹一乱子。我在参政会外交审查委员小组会上，极力反对汪精卫走狗李圣五所提的对德意外交采取分化方略案，借诸与国之名，行投降反共之实，我坚决主张打消这提案，争论许久。因周□作主席，和他是差不多的，主张修改词句，题目改为《对德意外交应积极注意》，小组会竟通

过了。在大会讨论该案时，王明、董老、博古等同志极力反对该案。汪让李再三起来坚持，闹到我们共产党参政员要退席。这时，已可见汪等有利用德意与日妥协的阴谋。我在此也有错误，未能在审委会后详细和王明等同志讨论对策，致未能预备多数在大会上打消此案，我们倒成了孤军奋斗了。

我于八月八日飞西安，在办事处又病了几天。朱德司令于八月二十二日到西安。相别十年，在南昌起义失败时分别，在抗战高潮时相见，真说不出如何的欢欣鼓舞。九月初到延安，见了许多辛苦斗争而重得见面的同志，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恳谈，使人悲喜交集。林彪、肖克等有名的青年将领同我长谈，尤令人欣喜莫名。大家都以我病后宜休养，许多地方约去讲演，都未让去，心里觉得十分抱歉。

十月一日我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开幕，我出席参加。听了毛主席《论新阶段》的报告，使我感觉这是我们抗战的总方略，它是我党第一个最大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毛主席把抗战的前途及全民族的任务和我党的策略很清楚地说出来，坚强了我们全党以至全国团结抗战的信念。在全会上我作了一个国际对我抗战的同情和国际宣传的发言。全会推举我和林老、董老为中央委员。因为重庆要开第二次参政会，全会未开完我同王明、博古、林老等于二十日就赴西安乘飞机赴渝。

这时武汉失守，蒋已到渝。参政会后，我同董老、王明、博古同志等六人应蒋之约，恳谈了五、六点钟。蒋很客气，力劝我们到国民党去作强有力的骨干，为国家民族共同努力，不必要共产党。大家辩论了很久。我说：现在世界上固然有只要一个党的强国，如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的纳粹，但也有各党并存的强国，如英美法等国。蒋急说：“他党可以并存，共产党不能并存。”他又说：“如不取消共产党，死也不瞑目。”他不能溶共就要消灭我们的肺肝如见。他并且特别向我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我说：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他这一说服手段，丝毫不能有效，反而使我们知道，他不但没有放弃一个党的主张，今后必然要着手反共的行动。果然，这时就有防止异党活动的密令。

这次参政会又有值得注意的二事：一是讨论陈嘉庚来电“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概以汉奸国贼论”的提案时，汪精卫说，总理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就骂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我们群起反对。但余家菊、梁实秋等却为汪辩护，在会上大闹一场。这时，汪投降之机已

见。所以汪以后说重庆连和平二字都不能讲了，因此非出走不可。可见我们也打中了卖国贼的心窝。二是邹韬奋所提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案”，联署者竟有七十四人，占了出席人员半数以上，大会竟通过了。潘公展气得发抖，国民党中央大发雷霆，特作一决议：“以后不得党的许可，党员不得联署”。从前我们以私人关系、朋友交情，常常能得到许多人为我们联署，国民党受此打击，有此决议后，我们找人联署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从一九三六年双十二起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高涨时期，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已经算达到了顶点。此后，又开始了反共时期，参政会也仅仅成了合作的一标帜，毫无实际作用了。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四日，重庆被日机大轰炸时，我在重庆仁爱堂休养，五日到北碚又休养了约半年，十一月回到延安。十二月二十二日党中央开盛大的会，庆祝斯大林同志六十大寿。在会上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延安分会，我被推为会长。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党中央为我六十生辰开一盛大宴会，使我感到无上的光荣。党和各方祝辞及毛主席的讲话，尤使我兴奋感激。我在答谢辞中，说到我参加革命的经过及庆幸地能走到信仰共产主义，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之一员，是人生最快乐幸福事。我之所以能如此：一方面是受了中国旧文化的熏陶；一方面是受了新文化的

改造。因为我勤求真理，不愿随俗浮沉，以个人利益幸福为满足，而常抱有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愿望，终于能得到马列主义以作终身奋斗的目标，这是自己感觉可以骄傲的。我是一个老实人，对人对事都必忠实，受旧道德的教育很深，我愿以共产主义的道德来发扬光大中国的旧道德。当时吴亮平同志及各报社同志要我把讲话作一自述，登于《解放》等报。我随后写了一半，觉得太长，也还没有写完，所以未能给报馆去登。

这时正是边区文协开代表大会，毛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我认为这是我党第二个有历史意义，最伟大的文献。《论新阶段》是抗战的方略，新民主主义是建国的方略。从此才使人明了中国真正的出路在那里。我在文协大会作了一个新文字的报告，大家赞成在边区推行新文字，大会举我为文协会长。党中央要我作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院长，我其实无此才学与能力，不过负一名义罢了。我非常热心推行新文字，认为要普及大众教育，提高大众文化，非新文字不能成功。现在虽不能马上废除汉字，但要预备以新文字代替汉字的工作。将来世界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民族和国家的界限都会消灭，也会有世界统一的语言文字出现。只有拼音文字才有趋于共同的前途，汉字是一定要消灭的。我和边区政府教育厅商定，今年冬学在延安县完全用新文字扫除文盲，试办一年看如何。

十月开办一个新文字教员训练班，我亲身去教，朝夕讲解。不但使这班人学会了新文字，而且团结和组织了他们，人人都愿为推行新文字，实行中国文字革命而奋斗。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那天，我们开了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及举行训练班毕业典礼，大众热烈参加。全班六十余人分在延安县、市去工作，成绩都非常之好。我觉得凡事只要努力定有成就，我愿以改革中国文字为我终身事业。因为我过于兴奋和疲劳，十一月底病了，几乎不起，幸同志输血得救。到次年一月底，冬学教员回延安作总结时，病才稍愈。一面因我努力新文字而致病，教者、学者都异常努力，并常写信慰问我；一面各方同志看我苦心推行新文字，不辞劳瘁，因而注重新文字，这又使我为之快慰，而病也日有起色。这时，要推动新文字运动发展，必须培养干部，设立一新文字干部学校是必要的。但这时边府经费十分困难，我同干部及学生商量，用我们七八十人的力量，自己动手打窑洞，建立一个学校。以同志们的热情，经过三个月工夫新干校居然成立了。夏季派了几十个干部到各县训练冬学教员，本年冬学各县都用新文字扫除文盲。由于教员质量较差，成绩没有前一年好。但经三个月的新文字学习，能读、能看、能写，证明了新文字一定会成功的。边府施政纲领着重要以新文字扫除文盲，政府明令规定新文字与

汉字在公文上有同等效力。自然，在最初试办中还有很多困难，但这些困难一定要克服来实行。我们出了《新文字报》及许多论文读物。一九四一年夏，党中央要开办延安大学，以我为校长，赵毅敏同志为副校长，实际上是赵同志个人及各同志的努力。

这几年，抗战在相持阶段中，我党虽竭力维持国内团结，而蒋介石总是以反共为第一。在汪精卫未降日设伪政府以前，时时有投降妥协的危险。自从一九三九年一月汪逆出走，一九四〇年汪逆为日本傀儡政府以后，投降的先着已被汪逆占去，同时蒋为英美的工具，英美与日有矛盾，所以蒋与日也有矛盾。更加以蒋要步武法西斯以实行专政，法西斯的主要法宝是民族侵略主义，把自己的民族抬得很高，以便欺骗民众为之尽力，蒋利用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以“复兴”民族为口实，所以也阻碍了他投降之路。更重要的是，我党时时强调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全国人心都团结在这个口号周围，谁要投降，谁就会变成孤家寡人。汪逆出走并没有带去多少人，就是明证。这一民众的威力也使蒋不敢投降，而苏联、英美帮助中国抗战也是使他不投降的一大因素。随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寇背信弃义攻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进攻英美，苏英美同盟国家都望中国牵制日本，而且中国抗战已支持了四、五年，国际地位突然提高，

几和苏英美成了四强之一。蒋也自夸其功绩，而反共阴谋也日愈增强，手段极其凶狠，明枪暗箭，特务内奸，古今中外最卑鄙龌龊的手段都用尽了。一九三九年夏，我在北碚时，沈老钧儒来告我说，陈诚等如何开会讨论反共。不久，梁漱溟自山东失败逃到重庆，虽然表面十分感谢八路军各处救了他，但危言耸听地说，华北无处没有八路军，半个中国已经是八路军的了。他且暗中说蒋要严防。蒋从此更有根据来反共了。陈诚等公开说，八路军游而不击，只图扩充实力。各处武装反共的事实也发生了，继平江惨案后，一九三九年冬，阎锡山顺承蒋意有进攻新军之变，有朱怀冰之进攻，有逼迫新四军之北移，一九四一年正月有皖南事变，公然明令解散新四军，停止发八路军、新四军饷弹。我党中央为了打击破坏团结的行动，给予严重的抗议，正当的打击，我党军委任命新四军军长及其所属七个师师长。这是反共第一、二个高潮。后因我党政策的正确，舆论的反对，日寇进攻，蒋军事危殆，形势暂为缓和。但不久，反共第三个高潮又来了。一九四二年四、五月时，边区周围四十余万大兵准备进攻。蒋以为日寇必北进攻苏，日北进，蒋也北进，迫我们北进，否则以武力攻陕甘宁边区，名为收复失地。我在四月二十九日讨论日寇是否攻苏时，认为：日寇富于调查研究，惯会取巧，必不于德寇未完全战

胜苏联形势时，舍其南进已得的利益而冒险攻苏，以自陷于四面受敌的危险。日寇乘南进的胜利，要从南进攻我国倒是一定的。我们如果眼睛只向外看，忘了自己处境的危险，是会失败的。果然，日并未攻苏，反而从云南进攻，使蒋手足无措，可算我不幸而言中。因日寇进攻，反共又暂缓和一下。我党中央毛主席又斗争又团结的政策是很对的。在一九三九年第四次参政会上，通过请政府定期实行宪政案，国民党也决定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开国民大会，因此我们在延安开宪政促进会，以期促成宪政，我被推为会长。其实我们很明白，国民党是骗人的，不过缓和人心的激昂而已。果然，它这次又食言。我八路军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华北战局正在垂危之际，即在平型关为中国军队第一次打了一个胜仗。当敌突破娘子关大军纷纷溃退时，我军又在正太路袭敌侧背，断其联络，收效甚大。为配合全国抗战，八路军在华北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敌人有后顾之忧，牵制了敌人几乎一半以上的兵力。但是反共分子、投降派，还要说八路军“毫无功绩”、“游而不击”、“中国军队不能抵御日寇”等等，企图投降反共。为了打破这些谰言，八路军于一九四〇年八月发动了“百团大战”，举行了空前的全线战役进攻，获得了辉煌战绩，使敌人也吓慌了，不敢向西北进攻，以更多兵力来扫

荡华北。蒋也更怕我党了，加紧反共阴谋。因国内国际的形势变化，我党的政策正确，终于使团结抗战的局面还能维持，持久战还能继续。虽然自一九四一年来国民政府不发一饷一弹，而我边区、我抗日军队以自力更生，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有许多进步的建设，“艰难玉汝于成”，这是反共顽固分子初料所不及的。

我们党已经有了五六十万军队，党员发展到八十万以上，但以中国经济落后，真正的无产阶级很少，党员大多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十分之九是抗战热潮中发展的，因此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认识是很薄弱的。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有鉴于此，以为以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和革命理论来改造训练全体党员，有了坚强真实的马列主义的干部，才能实行抗战建国的正确方略。因此，他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发表了整顿三风的讲演，这是我党第三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整风开始以来，由中央宣传部选择了二十多个文件，要全党研究讨论，从党员和非党人士从思想上来一个革命，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从一九四二年十月起，由党西北局召集高级干部数百人开了三个月的高干会议，把过去党的特别是西北党的工作，作一番深刻的检讨，把过去所犯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及“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彻底清算一下。我在这会上也得到了不少的教训，因为过去在

国内的时间很少，没有参加实际工作，由这次的检讨中、争论中，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真是胜过研究十年马列主义。在高干会中，毛主席又写成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伟大著作，清楚地具体地指出建设、改造边区的财政经济的路线，发展生产，以新的合作社方法教育群众。我认为这是中国的新经济政策，也是毛主席第四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我党得此领袖也同联共党有斯大林同志一样，有了高明的舵师，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在整风中人人写思想自传，并且号召坦白运动。这里就发现了国民党派了不少特务到我们党内来，到我们边区来，到我们军队中，专门作破坏工作，这是整风初期所未料及的。我党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被国民党特务分子陷害了的青年改过自新，已经有不少的特务分子响应了党的号召，改过自新了，且愿为反对特务尽力。至于死心塌地、甘为反革命尽力的少数人，则已逮捕起来。这又是反共分子而料所不及的，真所谓“作伪心劳日拙”。

现在蒋发表一个《中国之命运》‘小册子，认为抗战已经可胜利结束，唯一的问题是要在国内消灭共产党。我们切不可再犯“五卅”时代在“一致对外”口号之下，而忽略了国内阶级斗争同时开展之错误。自抗战到今天以来，阶级斗争的形势改变了，蒋是要以法西斯的毒辣手段来和革命势力斗争了。现在在新的

国际国内形势之下，我们又要进行新的残酷的斗争了。我又要欢欣鼓舞地来迎接这一斗争，我又会同数十年的战斗一样，又要看到新的胜利。

回忆我一生，从孩童时即受祖母、父母、兄长的教育与爱护，坚强了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小时作事即能有始有卒。一般儿童都很少有责任心，热闹高兴时则积极，我能始终如一，尤其在收拾残局、整理善后时丝毫不懈。因为深深记得祖母常说：作事有头莫尾的人没有好结局。稍长又受兄长常引古人的言行以教训，因而养成我以“坚忍沉毅”四个字作为我一生行事的指南，却也得了不少的益处。因为有自尊心，就常想作一番可资纪念的事业。志不在温饱，也不仅在忠孝，有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的幻想。我二兄喜欢以曾国藩的家书及古人箴言、座右铭、正气歌等等给我看，尤以黄淳耀所作的“见义不为无勇也”这篇文章给我读，使我深深感动。这时我是仰慕古人，尊崇曾、胡等这些所谓“中兴名臣”，可以说思想是模糊的。就是随后崇拜康、梁的变法维新，也不过是旧思想的继续，就是说想以康、梁的办法去继承曾、左的事业。只有到了一九〇〇年时，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思想上才起了一个大变化，疯狂地信仰“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这种英雄主义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了

传统的呼声，在守旧沉闷的中国社会中，客观上在当时是有革命的意义，这些思想引导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到日本后看了卢梭的《民约论》及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十八世纪法国的思想和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想，杂然存在于胸中。见了中山的三民主义，以为是最好的，因而也愿为它奋斗。我之所以积极热诚为辛亥革命奋斗，其原因也就在此。辛亥革命失败后，见许多从前的革命战士，有的高升，有的退沉，有的叛变，革命党分化成孙、黄两大派，大派之中有小派。宗派主义是中国社会中最坏的恶毒，同盟会时代已是如此。章太炎、陶焕章等反对孙中山自不用说，而孙中山与黄兴是最好的，但也早就闹成孙、黄派。宋教仁、谭人凤、胡汉民、汪精卫等也都有派。四川的熊克武与杨庶堪、谢持也分派。我不但在二次革命后，在法国没有参加他们的派别斗争，就是辛亥前在日本，章、孙、黄、谭、宋等的派别斗争，我都是最反对，并且常为团结一致，各方劝解，始终我是不参加派别斗争的。谢持屡次要拉我入他们的实业团小派别，我坚决不允。他们认为我为熊派，但我也不是。我对于孙、黄、熊、杨各派都不偏袒，都能接近。他们都以我忠实老成，都厚待我，但都不信任我，因为我没有加入他们的派别。因此我也只能作一点补偏救弊的事情，而不会有负重责的事

情给我作。我虽然深知道不团结是不会成事的，但还没有了解只有从思想上的一致，才能团结一致，而不会闹派别斗争。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这一时期，我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只是同李石曾、蔡元培等接近，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但又没有任何组织，可以说这是我苦闷而没有找到出路的时代。一九一九年我看了日文的《过激派》（布尔什维克），这就走上列宁主义之路，自然还是初步的，但一直到现在都向马列主义的道路发展。

我自己计算，最初是从旧思想的忠君爱国到变法维新，又发展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三民主义，最后到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好象我毫无定见，只是随波逐流，崇尚时髦似的，那么将来思想还会不会转变？自己坚决相信，我是一定不会放弃共产主义的。因为我数十年辛苦追求的就是科学的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也就是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这是人类已确定了的真理，再不会变的。我从前之所以没有一定的信仰，就是还没有找着真理，没有认识正确的思想方法。现在既已寻得，所以可决然断定，不会再有变动的。我想我所以能这样作，是因为我前进的思想是纯洁的、真诚的、不自欺欺人的，我是能发展中国的旧的好的思想，而不为旧思想所束缚。我是一个忠实诚笃的人，没有什么特别能力，只是有些愚

笨，但有些时候愚笨之极也就开了聪明之端，成了它的反面。我看了我同时代许多比我聪明百倍的人，但因他们心里不纯洁，没有或不愿找出真正正确的道路，结果不得不成为一个愚笨的人。

一九四三年五月 于延安

皖南惨变记（节录）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日）

钱 俊 瑞

小 序

现在我已于万般创痛中，将此回忆录写完。行文虽拙劣，但写时我已将心血呕出，故直到此写完之一分钟，觉得心身轻松，象是对历史还却了一部孽债。读者读此文时，当能深切了解，我所负的这笔债是十分沉重的。现在却至少清偿了一部分，自然，这还债的责任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

这部回忆的原料是进步人群的血和泪，而其背景则是整个目前中国形势的辩证法。作者在这里最大的希望是凭着这粗粗的回忆，来唤醒人们的理智，作公义之审判。如有单凭感情，因此而胡作妄为者，作者恕不

负责。

现在我就想把这原稿寄出，如果万一印不出来，则朋友们誊写几份传观，对于自己，对于祖国，对于全人类也是有益的。

一九四一·二·二〇·

引 言

一九四一年中国第一件发生的大事情，当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之被取消及其皖南部队之被歼灭。这事震惊了全世界。关于此事之经过我们政府已公布了命令，发表了谈话，中外各报也都记载。但据我所知，其语焉不详者固多，而语焉不实者更多。我是个亲身经历这次事变的人，现在刚刚脱险，到达某安全地点，所以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义务，把事变的经过和脱险的情形，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真正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士，并诉之于比较健全的理智与最低限度的良心，以求有遂于团结抗战之伟业！以及世界和平与正义之确立。只因我狼狈脱出虎口，手头并无材料，所以只能凭记忆所及，将目击事实，一一写来。比较完全的报告，只能俟诸后日。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普通的文人。或者

说，是中国几千几万个爱国文人中的一个。我有热情，但我自信我尤有冷静的头脑。我有我确定的世界观，我有我确定的政治主张。对于全世界，我反对侵略和不义的战争，为此我曾热烈地参加国际反侵略运动(International Peace Campaign)，并不远万里赶到欧洲去出席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World Peace Congress)。对于祖国我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坚决主张团结抗战，民主建国。凡有利于团结抗战者，我都赞助，凡有利于分裂投降者我都反对。因此，在抗战未发动前，我们就坚决鼓吹停止内战，发动对敌抗战。在抗战发动以后，我就站在文化岗位上，参加一切足以巩固团结，加强抗战的工作。上海沦陷后，我随着许多前辈和同志到内地去工作。除写文章演讲外，在汉口就办了一个战时书报供应所，专将各项抗战书报供前线将士；并附设一读书写作函授班，帮助提高前方将士和后方青年之阅读能力，同时想培养大批大众作者。其经费由李宗仁将军、陈铭枢将军、黄琪翔将军等捐助，并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战时文化社补助。武汉失守，我又应李宗仁将军之邀，主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之工作。当时李宗仁将军非常重视民众动员和战区文化工作，在他的鼓励之下，我们在鄂东、鄂中、鄂北出版战地报纸，设文化站，文化队，在部队及民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都很顺利。

民国二十八年^①春，环境变化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解散，我就脱离五战区，到重庆续办战时书报供应所，并创办《战地知识》杂志，专供前方将士及政治、民运工作者阅读，二十九年^②夏季，又因环境关系，先后停办。其时适有南洋华侨团体电邀赴南洋讲演，同时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也决议派我为驻南洋代表，我就办好护照，准备出国做一个时期的工作。谁知事情突然变卦了，外交部所发护照因社会部的阻挠而吊销，离渝时又被阻于飞机场。其理由是：“奉渝像先生这样的人才，应该集中在重庆。”于是我就被强留在重庆这个大集中营里，到乡间去埋头写作。但所写文章又十有八九被扣被删。作几次讲演，又成了人家捏造情报的口舌，所住的屋子前后左右，终有些不相识的朋友老站在那里。自想我空有这一腔忠诚，而报国无由，奈何，刚巧那时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将军，路过重庆，返回前方。他坚决邀我到 he 那里去干文化工作，并答应我，可以完全照我的计划来办。我想抗战以来，我就从事战地文化工作，现在新四军既能给我以机会，而新四军又是进步的抗战部队，所以我就立即答应，告别了重庆许多朋友，七月底就到达皖南新四军驻防地

① 即一九三九年。

② 即一九四〇年。

点，参加新四军的工作。

这就是我在“自由中国”百十次找求工作机会，而最后才到新四军去的经过情形。老实说，我明知参加新四军工作一定会引起当局的误会，而且我衷心也实在不愿让我当局发生丝毫的误会。但诸位试想在当时那种万钧压力之下，我们愿意为国家献身的文人们，除此而外，还有什么路径可走？当回忆大前年有人介绍我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当个设计委员，以思想左倾被阻了；一九三八年有人又介绍我到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当设计委员，又以思想左倾被阻了。甚至在去年，因为作了一次演讲，累得那个成绩卓著的兵役实施协进会奉命解散了。理由很简单：不该请钱某演讲。却是推辞再三，而由该会许多青年会员的再四催请，最后接到了该会负责人吕超将军的信才去的。去年国民外交协会决定要我到南洋做特派代表、做对外宣传工作。我南洋虽未去成，却累得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在重庆大大受了限制。理由很简单：不该派某人出去。而协会给我的聘书却由会长陈立夫先生等署名的。

于是我冒了“大不韪”而参加了新四军的工作了。我唠唠叨叨说了上面一大段，非为别的，是要说明：第一，我是现代中国热血知识分子之一员，这几年来，大批青年之参加新四军和八路军，其具体情形虽各不

同，但基本原因则都和我是一样的。第二，我是一个愿为一切抗战力量服务的人，对于任何抗战力量我决无丝毫偏见。因而我对皖南此次不幸事件感到特别痛心。同时，我在此次事变中虽吃尽了苦楚，但把这件事的颠末叙述出来，我相信还能比较公允。我希望我这篇记载是极端理智的产物，虽然我现今还创痛未愈，但我将尽力压制我激越的感情。我同样希望读者也不要用水泪和盛气来迎接这篇记录，而须迎之以万分冷静的头脑。我现时身虽在僻静小城中，但预知此次事变之推演发展，不仅有关中华民族之存亡绝续，而且会影响到全人类的命运。因之对此事件之观察，稍有差池，则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将发生严重的后果。读者须知，新四军和八路军是驰誉全球的军队，国内同胞对此之关心，固不待言，各国人士之关怀，我们也深切感到。读者诸君只要亲身体会当西班牙人民反对反抗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时，我们中国人民对于西班牙的共和军及国际纵队，是如何神往，如何关怀，则我人对于今日全世界人士对坚决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具有何等热烈之情愫，便能领略其一二。由此可知，我们对于此次事变必须以极端肃慎之态度，求得真切深刻之了解，否则感情用事，必至僨事有余，成事不足也。

以上就当作本文的引言。下面就是正文。这里没

有分析，也没有结论。我所要写的就是事实，而且多限于我所亲身经历，亲眼看见，亲耳听闻过的事实。结论是要靠着读者的良知来下的。

.....

第三节 决定北移和准备北移

新四军北移问题——谈判之内容

现在我们开始说到新四军北移和此次皖南事变的正文。夫新四军的北移问题由中央政府①正式提出，早在去年七月初。在此以前，中央曾屡次要长江以北之新四军悉数南调，并划江南狭长地区为其作战区域。其时我尚在重庆，故对当时双方谈判情形，略知梗概。迨春末初夏华北磨擦渐归平静，由中央划定山西、河北中间的漳河一线，为双方作战的分界线。从此国内团结气象，又复上升，而国共两党又重新谈判。去年六月，中共提出一方案，内容有三大项：第一项是请求政府规

① 本文所说中央政府、中央，均指国民党中央政府。

定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权。第二项是请求政府实行对游击区和敌占区内抗日武装的援助，普遍发动游击战争，并实施民主政治等等。第三项是关于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问题。中间关于新四军者：（一）请求扩编为七个支队，（二）划定与友军的作战分界线，（三）依照国军同等待遇，按时补充枪械弹药、被服、粮秣及卫生、通讯、交通等器材。

七月初，国民党中央对此提案提出一个对案，其内容据我所知是这样：关于一般的政治及政党问题，不谈（等到宪法公布后再谈），其中有关新四军的问题大致如下：

（一）关于扩编：新四军编为两个师（采取两旅四团制）。

（二）关于作战地区：新四军全部调到河北省境内，加入冀察战区的战斗序列。

（三）北移时期：须于奉命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河北省。

（四）关于经费：暂以军为单位，直接向军需局请领。

这样，国共双方就进行商讨。中央方面由何总长应钦、白副总长崇禧负责谈判，中共方面由周恩来、

叶剑英两先生负责折冲。七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又提出一个方案，申明这是由中央最后决定的。其内容分四项：（一）关于党的问题，（二）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三）关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的作战地境问题，（四）关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的编制问题。其中关于新四军的规定大致如下：

（一）关于编制：新四军编为两个师（两旅四团制）。

（二）关于作战地境：十八集团军全部和新四军全部调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将新四军加入第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归朱德副总司令长官负责。

（三）移动日期：须于奉命后一月内，全部开到指定地区。

中共对此方案研究的结果，再于八月中拟定，九月初提出下列办法（此处所述仅系有关新四军者）：

（一）关于编制：请改编新四军为三个师，其编制照甲种师及调整师办理。

（二）关于作战地境：

（1）同意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划定作

战地区及与友军之作战之分界线。

(2) 但为实行上述原则，应请中央解决以下各项问题：

甲，各抗日党派之全国合法权；

乙，中国人民之敌后游击权；

丙，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之作战权；

1. 请规定以华北五省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作战地区，并规定其与友军在该区内之作战分界线。

2. 请依同等待遇，按时补充枪械、弹药及各项器材。

3. 请依扩军成例，先行补充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一批枪弹器材，以便继续作战。

至于后来何应钦将军在其皓电中（十月十九日）所称：“周副主任委员返渝后：又提出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乃是指周先生在九月份所提的：

(一) 请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

(二) 按照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

(三) 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

对此方案，中央方面始终未加考虑。其时河北方面又发生石友三借口中央命令，配合敌伪，袭击八路军的事件。山东省内又发生鲁村事件（沈鸿烈部与八路军之磨擦）。而最重要者，即苏北又发生韩德勤部与新四军之磨擦事件。当时新四军之北移问题，原则上已告解决，且一部分队伍早由陈毅、管文蔚率领，已由苏南北渡（彼时北渡之另一原因，为在苏南受友军冷欣将军所部之逼迫）。至于为什么不移皖北，而移苏北，乃因无为渡江处已被敌人严密封锁，而其后又经友军阻断也。可是在苏北的地方当局，当时却要新四军江北部队重复南渡，于是大军围攻，当局并且发出“限本年年底消灭中共苏北部队”之密令；顾司令长官在七月十四日向苏北各军、师长发出寒电，认为“新四军仍未遵命南调（注意，当时中央已规定新四军应北移），亟应严厉制裁。”于是震动一时的苏北事件，就此发生。而新四军北移问题也就搁置起来。

命 令 北 移

去年秋季，国际局势发生极大的变化。从日本近卫重作冯妇，九月二十七日日德意成立三国协定以后，

英美集团与德意日集团正式抗衡之势已成。日本在德国怂恿之下，亟图结束“中国事变”，冒险南进，排除英美在远东之势力。其所用办法，最初想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冒险，三路进攻，一鼓而下昆明、重庆，迫我作城下之盟。终因我全国将士坚强抵抗，特别是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作战役的反攻，制敌于机先，把敌军打的一个落花流水。同时新四军江南、江北部队配合其他友军亦在长江南北，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拖住敌人溯江轻进的尾巴。于是敌军三路进攻之计划全盘塌台。敌见硬不成，改取软攻，乃发动声势浩大之政治诱降运动。读者当还记得，当时港沪谣传之可怕，真骇人听闻。敌寇一呼，汪逆及其他投降分子如响斯应。汪逆之和平反共运动遂响彻云霄，而我“自由中国”之反共运动亦大大嚣张。

还在此际，乃有何参谋总长、白副总长之皓电闻矣。何白之皓电乃致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军长的。其内容除疾言厉色，对八路军、新四军大大申斥其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吞并友军等等而外，末了，即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全部开到冀察及鲁北、晋北境内。

决定北移并要求宽以限期

部队的移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那样的部队。第一，“缘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为抵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至难。”（见朱、彭、叶、项答复皓电的佳电）第二，“自平江惨案、确山惨案发生后，新四军后方各处，如赣南、闽西、湘赣边区、鄂东、皖西、豫南等地，其家属及留守人员，横被摧残，毫无保障。今又欲华中各部北移，彼等甚惧覆辙相寻，故无不谈虎色变。”（同上）第三，“又况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树叶为粮，道殣相望，该地军民已甚感维持之困难，有请南移者，有请他调者，德等方勉为抑止，告以苦撑，实亦甚难容纳其他之部队。”（同上）再加上这些部队驻防地区的民众，都不忍其离开，坚相挽留，如欲勉强移调，其事实至至惨。

但皓电催迫，军令森严。八路军、新四军为顾全大局，遂遵令决定将新四军江南部队全数北移。只是“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同上）八路军、新四军负责将领在其佳电中同时请求中央早日实行中央所规定的扩

编办法，“并请对编制额数，酌予增加，以慰前线将士之心，亦为国家培养一支可靠之抗战力量。”（同上）关于补给，因为他们“已十四个月未蒙发给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同上）。所以请求稍为补给些弹药。

皖南部队准备北移

朱、彭、叶、项的佳电是在十一月九日发出的。当时（十一月俭日），叶军长鉴于当局所出题目，实难交卷，曾向中央电请辞职，中央不准，恳切挽留。顾司令长官亦来电挽留，称“该军开拔在即，领导统率，正深依赖，所呈辞去一节，应毋庸议。”（十二月冬日）从其时起，新四军皖南部队就开始准备北移。所以十一月九日（即发出佳电那一天），叶军长即从军司令部所在地之云岭，起程到上饶，谒见三战区顾司令长官，洽商一切有关北移的问题。其中如经费一项，长官部对新四军九月份以后的经费就没有发给，子弹则自四月份起就未发给。此外如北移路线、日期和开拔费等都须商定。叶军长在上饶和顾司令长官谈了两天，顾氏对叶军长所提问题所作的答复是这样的：

（一）新四军开始北移时，所欠九、十、十

一、十二月份经费当即转请补发。

(二) 自四月份起尚未发给的子弹当转请补发。

(三) 对在前方抗敌受伤的将士，答允予以适当的处置。

(四) 北移路线：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

(五) 移动期限：部队限一月二十八日前撤完。兵站留守处限二月二日以前全部结束。

当时叶军长对第三、四、五点全部接受，关于经费子弹（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经费因为当局欠发，故非常拮据，伙食费都成问题。如若移动则沿路粮价比皖南高得多。子弹则更加成问题了）要求先补发两个月。当时顾长官亦予应允，并面告叶军长俟部队北移，经过宁国时向上官云相总司令部领取。于是叶军长便立即回来，布置北移。

在这里应该补说一句，朱、彭、叶、项的佳电发出以后，参谋总长何应钦将军于十二月间竟正式命令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即十月份未领之二十万元亦一律停发（八路军当时的反响是在陕北和华北各地加紧生产运动，设法抗战部队自足自给，并通电全国，要求继续发给军饷）。同时由他领衔再给朱、彭、叶、

项一个齐电，对佳电所陈各节痛加驳斥。文字骈丽抑扬可诵。但对八路军、新四军所提那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则在“军政”、“军令”等名词之下，一概拒斥。

当时新四军的干部在报上看到何总长的命令，其后又读到何总长的齐电其郁勃愤激之状，难以言宣。幸赖叶军长、项副军长等婉委解释，要求大家顾全大局，不要逞一时之感情，斗一时之意气，才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而当时各方电讯纷传中央以二十万人，对陕甘宁边区筑成铜墙铁壁一般的封锁线。河南、湖北的部队，以二十九个师之多，向皖北、皖中推进，围攻江北新四军。这真如火上添油，使当时已达沸腾状态之军心、民心，几乎一发而不可收拾。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指陈者，即共产党之领导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乃表现其制动机之强大作用。当时各级干部及战士开小组会时，均由负责党员作深刻全面之分析。指明目前形势投降分裂之危险虽空前严重，但克服此种危机之可能依然存在。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特别指明今天英美亦不愿中国发生内战，减弱其借助中国牵制日本之力量。而苏联固无论矣，而强大的苏联对中国局势之影响，在今日尤不可忽视。对国内局势，则加强指出国内国共以外之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都了解内战之结果必然是中华民族的灭亡，所以都反对投

降派之反共阴谋。当时在他们的分析中，还特别强调投降派与顽固派的分别。投降派主张投日反共；顽固派则主张抗日反共，今日投降派乃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希望利用顽固派之弱点与成见组织反共统一战线，先造成反共内线，再进而对日投降。所以忠诚劝告今日的当权者为其自身的政治前途计，应该悬崖勒马，不做投降派的尾巴，不受汉奸、准汉奸的包围，而做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历史罪行来。他们要求所有党员和非党员，在此民族生命绝续的紧急关头，头脑应该格外冷静，勿让感情控制理智，怒气冲昏头脑。据我所知，这种说服工作实在异常艰苦。在一般战士的讨论中，甚至有骂上述主张为出卖革命，对不起一批一批被人杀戳之革命先烈者。记得有一位在我这一部门工作的通讯员，湖南浏阳人，他的父亲是在抗战爆发以后，在故乡被政府认为是“共匪”而惨杀掉的。他在小组会讨论时，就咬紧牙齿痛哭流涕地大叫：“这种混蛋家伙，我们还不去打他，再等什么时候？”后经大家几次三番地说服，他才知道他的一番小道理，敌不住那番大道理，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见了。最后他就在墙报上写了一篇满清楚的文章，题目叫做：《我接受了同志们的批判》。他今年十三岁，这孩子我很喜欢他，他参加红军时候才只七八岁呢！

艰苦的解释工作

当我在别的战区时，看到部队的移动是比较容易的。但在八路军、新四军则比较困难，此在不洞悉新四军、八路军的实际情形者，确乎不大容易谅解。一般说来，其他部队虽然也是各省农民构成，但其与当地民众关系，决不如八路军、新四军那样的密切。新四军的战士绝大多数是当地的老百姓，武装起来参加部队，执行保卫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的任务。新四军现有九万人，据我知，其中只有极少数才是民十六年①编成时从红军游击区中集合起来的，其他多是江苏、安徽、湖北等省的健儿。而皖南新四军，虽是军的直属部队，扩充得没有像其他在敌后作战的部队之迅速，但其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皖南当地人。这些战士之参加队伍，目的是在保卫家乡、保卫皖南，如今要他们离乡背井，这决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服。所以如何能使这些战士们了解，新四军北移的决定是对民族国家有利的，对他们未来的利益也是有利的，这便是摆在新四军的领导者和各级干部面前的重大责任了。

叶军长从上饶回到军部后，先由项副军长以政治委员名义，召集高级政治工作人员会议，详细剖析国

① 即一九二七年。

内外形势，说明新四军北移之意义，在加强国内精诚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敌伪及投降派制造分裂内战的阴谋，同时进军敌后给敌伪以更大之打击。他要求各级政治工作人员用全副力量，向战士们作耐心的教育与说服工作，务使其普遍与深入。他还举出，内战时期红军主力西迁的时候，因为当时行动仓促，对战士解释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个别的引起严重的逃亡现象。他指出在行动之前以及在行动之中，反共分子必然会造谣中伤，企图瓦解新四军，如果上述教育说服工作做得不够，亦难免受其影响。

项副将军在该会议上要求所有政工人员，对当地老百姓也要做一番说服工作。他即料民众如果知道新四军要移动，必然大引恐慌，反共分子必然会乘势进攻，对他们威胁利诱，不被胁从者，不惜加以残杀。他告诉政工人员，应该将各抗敌团体，如农民抗敌协会、青年抗敌协会、工人抗敌协会和妇女抗敌协会等好好安排，将各团体中已经为当局所嫉视的负责人员，布置安顿之所，免受惨毒之摧残。

在该会议上，正式决定在进行此项说服工作中，第一阶段先宣布“进军敌后”，第二阶段宣布“东进抗敌”，第三阶段即等到已到达苏南时，才宣布北移。因为当时会场中大家估计到，如果一下子宣布北移，会引起一部分战士惶惶不安的心里，尤其是籍隶皖南

的战士。至于第一阶段说是进军敌后，乃是估计到新四军战士个个对打击敌伪都是非常高兴。所以在初步解释时单说我们现在不是等鬼子来打我们，而后我们才打他们，现在我们也自动地打他们。“你们看，我们的老大哥八路军这次不是采取主动，去找着鬼子打个百团大战吗”？这样的宣传鼓动是容易得到全体战士的了解的。

当场就决定由政治部宣传教育部印发敌后进军宣传鼓动大纲。同时在干部方面，规定对当前形势和统一战线策略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在这个研究之中，特别着重于这几方面：（一）目前统一战线遭逢空前危机，但国际、国内形势规定此种危机仍有克服可能，而且中国共产党以其六十万党员，五十万军队，配合全国抗战力量，必能克服此种危机。（二）此次新四军北移恰是克服此种危机的方法之一。此次北移当然是对国民党的一个让步，但革命在某种条件适度之让步与退却是必要的。目今大敌当前，如能以此项让步巩固国内团结，取得国共更进一步之合作，则对抗战建国之贡献极大，对革命进一步的发展无疑提供一强有力之条件。所以当场决议，各级干部应于最短期内，在每天规定的两小时学习时间内，读《战略与策略》一书，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东方大学报告的《列宁主义问题》中关于战略一段，以及毛泽东在去年春季所作

的统一战线报告提纲。并规定各单位应将上述参考资料，配合目前行动加以充分讨论，每周将各单位讨论结果报告军政治部考核。

接着，就由叶、项军长召集全体营级以上干部，在参谋处开会。首由叶军长报告此次赴上饶与顾司令长官接洽之经过，再从当前国内形势说到前途困难极多：一面是敌人必然会对我移动之部队加以扫荡；另一面是反共势力可能加以种种阻挠。所以他再三告诫部下，此时应特别戒慎，同时必须有充分准备，迎接任何方面地打击，克服各项困难。次由项英将军详细分析当前时局的特点，特别强调要用一切办法来加强团结，以打破敌伪分裂诱降之阴谋，而皖南新四军之移动即为其步骤之一。最后要求到会人员，要负责作各项充分之准备，在军事上必须准备敌人之扫荡和反共派之袭击。

布置移动路线

这样，全军各单位都为部队转移而动员起来了。

叶、项军长又召集军部各处长开会，商讨各处器材和人员的移动办法。首先命令各兵站遵照规定的路线，预先去妥为布置。派人和打电报到宁国上官云相总司令部和五十二师及其他友军，要求他们给以移动时的各项方便，并向他们告别。上官云相总司令及五

十二师刘师长等均曾回电，答应沿途给以方便，决不留难。据事后报告，沿路还贴有友军“欢送新四军北移”的标语呢。（注意当时新四军尚未宣布北移，对内为避免引起战士恐慌，对外则保守军事行动秘密，免受敌伪袭击。实际上此项消息早已由当局和友军宣布矣。）

军部直属各机关的辎重器材，立即开始移动。这时最感苦恼的是军需处、军医处和印刷所。军需处处长宋裕和先生，精明强干，但因上峰限期迫促，各项辎重器材，差不多都要由他负责布置。他其时还患极重的痢症，力疾从公，把在云岭、三里店一带积存的军米（足应皖南新四军部队一年之需），扫数用低价出让给专员公署和友军。其他器材除必不可少者外，亦经转让。

顶苦的要算是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先生。沈先生化了三年多的心血，对新四军的医务惨淡经营，其所主办的军医院，据各外人观察家报告，在全国野战医院中要算最好。我曾参观过其办在董村的一部分。据该院李院长告诉我，从去年五月间扫荡，曾经一度搬家以后，军事情势一直紧张，所以医院中各项贵重药品和用具，都另行保存。现所用者，只能因陋就简。但据我参观了两次，其设备还比我在其他战区所见医院好过几倍。别的不讲，该医院中竟有个设备相当完全的化验室，有几个人专门负责，每个伤病员入院还

要经过验血的手续，这即使在后方设备较完备之医院中也是很少见到的。又如其手术室设在一个新造的祠堂中（皖南祠堂极多，而且多极大，有的房子很讲究），布置得洁净整齐，消毒尤其讲究。普通后方设备完备之医院，对盲肠炎一症，往往不敢轻于开割。大家知道此项治疗工作必须高明的手术和十分完全的消毒，不能稍有差池。而在新四军医院里开割盲肠炎的已有十二、三起，从无一个出过毛病。医院内的看护工作均极科学（当然一切手续都简单化了），有几位看护小姐来自上海有名的宝隆医院。当她们初来时，生活都过不来（大家晓得上海宝隆医院是多么贵族式的），但到现在不但生活过得来，在工作上都在起模范作用。在这里必须提前说起一件事：有一位看护主任，就是从宝隆医院来的，她这次却没有先走，跟着部队打了这几天的仗，大概也给友军围歼在山沟里了。

……

总之，军医处人员和器材的搬动，使沈处长几乎呕出了心。医院里还有两百多伤病员，重伤的有几十个，完全不能走动，这怎么办？医药又多得很。经过沈先生在香港、上海和内地的奔走呼号，新四军从外国朋友和侨胞那里捐到的药品是相当多的。上两次敌人扫荡，附近稍稍搬动一下，已经要用两、三千夫子，还搬不光。现在要想长距离搬动，这又怎么办？那几

天在军司令部，我只见得沈处长愁眉不展，郁郁不乐。叶军长等尽量安慰他，说以后到达目的地，我们再来办他几个出色的医院。照沈处长的志愿，他还要在敌后办大规模的医学院，培养大批军医干部呢！

经过军医处全体人员的日夜工作，事情安排得差不多了。伤病员交给红十字会，给安置好了。药品、器材顶重要的带走了，有一部分转让掉了。大概十一月底吧！深晚了，我忽然接到一张条子，是写给我和任光先生的。读后，知是沈处长的告别信。他因为急于要赶到苏北，沿途布置工作，所以先和军医处一部分职员，先取道上海北上了。

笨重的印刷机

还有一桩苦差使：这几架对开和四开的印刷机怎么办呢？负印刷所主要责任的是文学家黄源先生和陈昌吉先生。陈先生因别的事先取道浙江北上了。印刷所内的铜模和一部分铅字先带走了。剩下来的人和东西都得由黄源先生负责调度。

黄源先生是从前《译文》的主编，他是鲁迅先生最好的助手之一。抗战后做新闻记者，随军工作。其后就加入新四军，主持全军对内、对外通讯工作。他和几个同志发动一个运动，要在新四军内培养大批文艺写作者。他在《抗敌报》上还编了一个文艺性的副

刊。后来，因为印刷所工作十分重要，就被请主持该项工作。据黄先生对我说，“这是一个尝试，新四军的印刷所不同外面的印刷所，它不以营利为目的，工人之来工作是来参加革命。但原来有些工人是相当落后的，原来的管理人员也不很了解这个新型印刷所的性质。经过一年多的苦斗，特别是经过深入的政治教育，这些工人可以说全部给改造过了，工作兴趣大大提高，生产量大大增加。”说到这里，黄先生那双欠缺光亮的近视眼，突然发出一种可喜的光亮来。他显然在感到一种无比的欣慰。

但这次搬场，却真正苦了黄先生。这么大的机器当然搬不走的。据他估计，有一架圆盘小印刷机，如欲搬动，就要三百多个伙子，其他对开、四开机不用说了。搬走既不可能，就设法出让。恰巧泾县县长兼行政专员邓昊民先生要办个报，知道新四军有这些印刷机，就派人来接洽。新四军方面当然愿意帮助，就廉价转让其一部分。不过当时新四军的报纸和各项印刷品还照常出刊，所以成交的印刷机直到最后移动的那一天，才来拿去。其余几架也就留在原处，当然是奉送给当地当局了。

深入的教育

从营级以上干部会议开过以后，军直属队、三支

队、老一团、新一团及各机关人员共约一万人左右，均实行精神动员，对进军敌后先做思想上的准备。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却遵照军政治部所发《进军敌后宣传鼓动大纲》向各该部队战士作深入的解释。在党员中则依据军政治部所发《统一战线策略问题研究大纲》，发动深刻的讨论。例如，教导队则由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先生和训练处处长薛暮桥先生等对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当前的特点，作详尽之报告，再由各小组根据此项报告，作更深入之讨论。当时军部所出的《抗敌报》也完全针对此项问题，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并对各单位提出之疑问，详尽解答。

军政治部宣教部特地召集全军负责宣传教育工作之人员，举行宣传会议，由出席人员报告各单位进行解释工作时所遭遇之困难与所发生之问题，同时检讨各单位进行解释工作之深入程度。军直属队和三团之工作显得最为普遍深入，各负责首长都亲自到各连队去作报告。据当时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全军战士对离开皖南，进军敌后，都表示无上的兴奋。其中顶有趣味者，凡属籍隶苏南的战士，都愿及早出动，理由是“到苏南家乡去过年”。而皖南的战士却曾个别提出要求，最好等到在皖南过了年之后再走。总之，一般战士对进军敌后之政治意义了解得都很充分。他们说起打鬼子，都会摩拳擦掌，好象就要去过过瘾似的。

从十月份打过鬼子以后，他们的手的确又在发痒了。当时报纸上连续登载的八路军继续扩大百团大战战果的消息，最使他们欣羨。他们觉得八路军，真不愧为他们的老大哥，而他们自己总也要不愧为老弟才好。

十二月初，我跟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先生到一团考察那里的解释工作。在全体干部会上，我做了个关于时局的报告，接着袁先生就指出当前新四军的具体任务。他特别着重说明，在移动之前和移动之中，巩固部队是顶重要的工作。他例举巩固部队的方法，又要求全体干部应该用最大的耐心，对战士进行说服教育的工作，革除一切对战士不好的态度，亲切的照顾战士家属的一切困难。

第二天，我就到一团各连队去视察。当时他们都在上政治课和文化课。团政治处的宣教股长正在对全团政治战士做政治报告，他提出许多问题和战士们讨论，当他说到投降派的反共投降阴谋时，战士们脸上的肌肉都显得特别紧张起来。他又说到陕甘宁边区被封锁，二十九个师准备进攻江北新四军。当时听众的眼睛都发红了，他们的手都不由自主地把枪捏得紧紧的。“那末，我……我……们该……该……怎么……怎么办呢？”一位战士站起来，口吃地问。大家的目光死死地钉住那宣教股长。

“我们是有办法的。这些都是敌人和投降派的阴

谋。他们为要使中国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使我们国内分裂，自己打起自己来。这是亲日投降派有意造成的挑战行为。我们是有办法打破它的。我们告诉中央政府，不要上敌人和这些投降派的当。我们告诉那些反共分子，如果你来打我们，我们也不客气的。但是我们，同志们，我们愿意内战吗？愿意内战？你说！”他指着刚才站起来问话的人说。

“不愿意。”那人回答。

“当然不愿意呀！”一阵群众的回答，响声震动了他们席地而坐的山坡。

“现在，中央政府要命令我们离开皖南了。”宣教科科长接下去说。

“怎么？”

“你说的是什么？”

“你说的是……？”

“我说，现在中央政府命令我们新四军离开皖南。”

“离开这里，这……里……？”

一阵痉挛抓住了所有的战士。大家要注意，政治战士是战士之中政治水准比较高的。

“是，中央政府要我们离开这里。而且，我们军首长经过再三研究之后，已经同意离开皖南，进军敌后去抗战。”

当他说到进军敌后四个字时，大家的脸又慢慢宽

松下来了。宣传股长接着说道：“现在我们就要向敌后去进军。同志们！你们要打鬼子吗？”

“要呀！”从对面山坡上传来的回声，也是“要呀！”

“你们的手在发痒了吧？”

“对呀！”一阵轰笑。先前的紧张情形大体上已归乌有。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准备。同志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多苦呀。我们饿也没有，子弹也不发给我们，我们说一句话，走一步路，甚至放一个屁，人家都要造我们的谣，掣我们的腿，我们在这里虽是老家，都是过的养媳妇的生活。我们到敌后去，吃的、用的，老百姓会帮助我们，枪械子弹，敌人会送给我们。同志们，敌人的罐头食品，我们多时没有尝到了。敌后是自由自在的天下，我们和敌人抢天下，是十拿九稳的。我们到那里去，可以大大发展抗战的力量，不必天天在螺丝壳里磨呀擦呀了。”

末了，还有一个政治战士站起来问：“我们部队里，皖南同志很多。他们假使要说，我们加入部队，为的是保卫家乡，现在叫我们离开皖南，那么谁来保卫我们的家乡？”宣传股长就说了一大套道理，第一层说明只有保卫住全国，才能保卫得住家乡。第二层说明打仗总是流动的，不能老耽在一个地方，假如像

他所说，皖南人只能保卫皖南，那末皖南新四军同志，有的是湖南人，有的是福建人，他们都只能回到湖南、福建去保卫他们的家乡，不愿来到皖南打鬼子了。第三层更加要指出新四军是全中国顶进步的军队，它不单要求到民族的独立自由，最后还要求到工农自身的彻底解放。参加新四军的多数是工农大众，他们的头脑里头应该天天存着这个念头，不能单以家乡为重，这种落后的思想应该快快打破才好。

飞扬着谣言

新四军的北移准备工作还没有着手，反对新四军的谣言却早已到处传播。上面说过，新四军的负责人员因为要免叫本军和当地民众引起过度的不安，所以决定事前决不宣布部队移动地点，单说要进军敌后，去和鬼子厮杀。谁知友军和地方当局所派工作人员，却早已在外边扬言新四军要到哪里哪里去。他们在新四军部队所在地及其附近，说中央命令他们调到外蒙古去，有的说开回江西去，有的又说要开到东北去。最可笑的，竟说要把新四军开到苏联去，“因为他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不服从中央调遣，所以要送到俄国去。”诸如此类的谣言，不一而足。且据各部队搜来报告，此种谣言完全是系统的、有计划的，其目的无非在使新四军战士心里动摇，使军人家属发生疑惧，

以达其瓦解新四军之目的。

不仅如此，特务工作人员进而设法勾引、收买新四军的战士，令其成批或个别的脱离部队，许以重赏。当政治部举行宣传会议时，第一团即有人报告，在汀潭附近某特工机关，出重资收买一团某连之排长。该排长思想落后，平日行为亦极不检，竟受其收买，且拟组织成批的逃亡。后经政治指导员发觉，即加以扣留，严重处罚。又如军直属特务团某连亦发生一战士开小差。当其逃亡时，行经云岭村左近之山坡，某守卫见其形迹可疑，即加以扣留。一经讯问，即供出受某友军特工人员之恐吓收买，嘱其另投某军，便可升官发财，故决定逃亡云云。后经严密调查，此种瓦解新四军之特工网，布置异常普遍，且极深入。

特工人员在此项工作中，对军人家属之恐吓利诱，真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一面扬言新四军就要调到蒙古，调到俄国去，一去之后，再也无回来希望；一面恐吓，凡属新四军家属，只等新四军一旦离开皖南，即格杀勿论。所以他们力劝家属教他们的儿子、丈夫，赶快脱离新四军，否则必遭大祸。当时，那些家属还是将信将疑，等到从新四军方面知道部队的确要移动，不免有些恐慌起来，就纷纷到部队里来探听真情。新四军就告诉他们，部队奉命进军敌后，决非回到江西、湖南，更不是到什么蒙古、苏联，同时告诉他们，千

万别信这辈奸徒的谣言。《抗敌报》上屡作辟谣的社论、短论，这样特工人员的谣言，就立即失却效力。

但那些破坏工作者的花样还多得很。他们又宣布，新四军走后，所有共产党员和农抗会、工抗会、妇抗会、青抗会 and 自卫队的人员，只要至诚自首，政府概予保护。泾县县政府就动手印发大批“自首书”，分交各乡、各镇、各保甲，征求自首。而下面的特工人员便遵令强迫这些农民自首。例如，茂林某大商店即是一特工机关。它平日对各个抗敌民众团体调查得非常清楚，当时它就是自首书的发行站，公开警告那些抗敌团体的会员，到那店铺里去填写自首证书，否则“定予严惩不贷”。这个强迫自首运动在各乡镇普遍发动之后，当地民众就弄得惶恐万分。

新四军看到这样，便连电顾司令长官、上官总司令和邓昊民专员，要求他们在新四军走后，对爱国民众和抗日军人家属，妥予保护，对民众抗敌团体，勿加摧残。电中并述及当时许多特工人员之不法行动，对抗战本身及新四军之移动均为极大阻碍。十二月下旬，顾长官等均有回电，说对抗属及抗敌团体，当然负责保护。上官总司令的回电，还说如有无知之徒，摧残抗敌团体，定予澈查云云。新四军方面就把这些回电，都在十二月底出版之最后一期《抗敌报》上完全批露，希望当地民众安心。

虽然如此，破坏工作还是有增无已。上官总司令和五十二师等友军来电，表示愿对新四军之移动给以各项方便，但新四军各部分却接连发生人员失踪的现象。十二月下旬，新四军在太平之兵站（大部分人员已撤退，仅留二、三人员办理未尽事宜），竟突遭友军某师之“洗劫”，粮食器材被夺一空，负责人员被架去。旋即派人去交涉，则相互推诿，最后才把人员释放。当时，其他各部队通讯员和战士无故失踪者屡屡发现。某团通讯员被友军捕去后，即加刑讯，逼其供出新四军实情，该通讯员缄口不供，即加毒打。数日后，该通讯员乘间脱逃，安返某团。新四军即向该友军提出交涉，但经全部否认，事情也只能搁起来了。

.....

咄咄逼人的密令

十一月三十日晚，叶军长打给我一个电话，说：“据确切消息，重庆已密令战区各部队，对你个人及其他较重要的几个文化工作者，恐有所不利，其罪名是未经军委会政治部同意，擅自在战地办理文化事业。你们还是搬一搬家吧。”

我接到电话后，只能苦笑一阵。我们究竟又犯了什么罪了呢？

我八月来到皖南，九月间成立了一个战地文化服

务处，邀集一些文化的同志，在战地继续做一些文化工作。十月间遇到了敌人的扫荡，经常工作差不多都停顿了下来；十一月间就准备要移动了。真惭愧，我们曾做了些什么事呢？编了七册部队用的通俗小册子，内有《世界大事》、《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问题》、《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等书，专为连、排干部阅读的。这究竟犯了什么罪呢？除掉犯了抗日罪之外，我想什么罪都没有犯的。

又编了几支新的歌，如《擦枪歌》、《筑工事歌》、《反对投降歌》等。在部队中教了几个新歌，从战士那里学多了一点作通俗曲子的本领。这究竟犯了什么罪呢？除掉犯了抗日罪以外，我想我们是什么罪都没有犯的。

着手编几册战士和民众用的识字课本，搜集以前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等所出的识字课本，仔细研究部队和抗战期内民众的生活状况，来动手编两种新的课本，让战士和百姓们识几个字。这究竟犯了什么罪呢？除了抗日救国罪以外，我想我们是什么罪都没有犯的。

把新四军驻区内的民众生活与抗敌情形，以及新四军的一般活动，写成通讯稿件，发到国内外各报纸，让大家知道抗战部队和抗战人民的情形（我们已经发

出的，有《十月间胜利的反扫荡》、《皖南的军民合作》、《新四军战士帮助农民收割》、《皖南青年的抗敌组织》、《新四军的文化教育活动》等篇)。这究竟犯了什么罪呢？除掉犯了抗日救国罪以外，我想我们是什么罪都没有犯的。

我们着手在部队和当地民众中征求许多通讯员，培养新的写作人材。我们又因为菲律宾侨胞送了一大套西洋乐器来，就由音乐家任光先生及侨胞周东君先生主办了一个音乐队，练习些抗战曲谱，预备培养一些新的音乐人材。我们又成立了一个资料室，搜集各项研究资料，在部队中提倡学习和研究的空气。这些究竟又犯了什么罪呢？我想，除掉犯了抗日救国罪以外，我们是什么罪都没有犯的。

不过，不管这一些，我们的办事处还是在第二天一早就搬了家。我和任光先生就应叶军长之邀，住在军司令部里。

……

适当其时，新四军又接到一报告，称由某中央委员为首，成立一反共机构，定于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消灭新四军云。

最不忍分离的

最可怜的是皖南的老百姓。千难万难，新四军的

部队终是可以走的。那些同情新四军，爱护新四军，与新四军已经血肉相连的当地老百姓怎么办呢？这不单是老百姓自己最担心，也是新四军负责人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新四军在未出动前，可以说用了顶大部分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新四军平时的政治教育的基础好，所以，因部队离开而发生不愿与家庭分开，而开小差的事情是非常少的。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倒在相反方面，即那一带的民众：一则感觉到新四军确乎是他们自己的队伍，一切为了他们的利益；二则鉴于新四军离开后，如若留在皖南一定朝不保夕。所以就发生大批农民要求加入部队的问题。

新四军在皖南三年，民众为了保卫家乡，除组织各种抗敌协会（会员共约二万余人，内农抗会约一万余人）以外，还自动组织了许多自卫队（约五千余人），其军事训练工作，则由地方士绅和农民领袖邀请新四军人员担任，所以两下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批自卫队队员在耕作之余，就时常和新四军在一起，如同一家人一样。现在听说新四军要开动，再加上那些特工人员的威胁恐吓，所以就纷纷请求加入新四军，随军行动。新四军见其事难却，深怕他们留在故乡，横遭蹂躏，所以就斟酌情形，收容了一部分。但如若看到那些一家老小，都要靠他生活的人，虽经坚决要求，也

不收受。

……

大批的自卫队员、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和妇抗会的会员，就在这样情景之下，要求加入新四军。而外面的流言又飞来了。“新四军又在扩充实力。”“新四军在大大扩军。”“共产党只想扩充自己力量，不管抗战。”

易地以处，你说，教当时的新四军该怎么办呢？

告 别 之 前

皖南民众当时的情绪的确是太激越了。经过特务工作人员的威迫利诱，他们变得更加愤慨，他们坚决要求新四军不要走。他们后来都已知道，新四军之走完全出于不得已。有一天早上，十多个云岭附近的老百姓，气喘喘地跑到军司令部，我们还以为照例的请叶军长吃饭，谁知道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请求新四军不要开走。你们走了，我们死路一条。你们在这里，谁要打你们，我们都起来帮你们打。”叶军长就温和地劝慰他们一番，说明此次移动的意义，同时告诉他们：我们已向上面要求，保护你们，等我们去了，你们还可以安居乐业。有一个老头儿，当场就涕泪滂沱，一面叫着：“我们没有福份！我们没有福份！”

最值得注意者，该区有许多地位很高的士绅，对新四军之走，非常惋惜。中村有一老者，董氏状元之后裔，在地方上威望极高，他得知新四军要走，就写了一封信和一首诗给叶军长，表示惜别，其信之末句云：“老夫耄矣，未知何时再得见岳家军也。”其诗全文我已全忘，仅记其一句：“恨不相随壮年时！”其情依依，诚老当益壮之好丈夫也。

章家渡有几个绅士，不但送他们的儿子进新四军，他们自己也要求加入，“为文书之职”（其信上语）。新四军见情不容坚拒，就请他们和第一批干部一同出发北上。他们把重要家产变卖了，余下的就捐给当地学校备用。

其时，老百姓请客之风大炽。各镇、各乡、各村，差不多每一个角落，每一户人家，都就近拉新四军去吃饭。首先是，各抗敌团体在云岭陈家大祠堂（新四军常在此开大会，可容一万多人），公宴新四军负责人，其后就是各家各户挨请。记得一次公宴席上，当叶军长被坚请起立讲了几句话之后，妇抗会的代表就即席陈词。她咬紧了牙关，说一句，停一句，最后，她的气给塞住了，竟放声大哭起来。满堂的人也就呜咽起来。叶军长是一个钢铁制成的将军，他的眼眶也红了一圈，默默的一个人跑回司令部里去了。音乐家任光先生带着他醉醺醺的步子，手里拿着他太太的那

块揩眼泪揩湿了的手帕，按着下巴，跑回房间里，嘴里喃喃地说：“伟大，伟大，今天我才看见人类美丽的灵魂！”说着就趴在他那架风琴上，发呆坐着。

我是素来不相信神话的。但神话的确是由人造出来的，现在我是知道了。十二月中旬，我到傅秋涛将军所指挥的部队去。坐在工兵连连长的房间里，那连长告诉我一件事情，这值得记下来。工兵连住的是民房，因为准备移动，所以事先把原来向老百姓借的门板、禾草及一切用具都如数归还。谁知道老百姓们非常固执的不要他们还，问其理由，则很直率地回答：

“你们一起都把它用光吧。即使你们不用，还给我们，也要把它们烧光，我们为什么留着要给后来的‘小日本’用呢？”我问“小日本”之意义何在？连长告诉我，附近的老百姓都称真正的鬼子为“大日本”，称非鬼子而同样杀害老百姓者为“小日本”。“哦！”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于是连长就接续讲一个故事。他说：“前四天，我住的这家的房主人忽然跑到我房子里来看我。他气喘喘问我：“你们新四军是不是要走了？”“不，没有这回事。”我回答。我当时的确不知道我们要移动的消息，上级又没有向我们讲。那老头儿说：“你不要瞒我了，街上的人都在说你们要走了。”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请您告诉我，街上的人怎么说？”

“街上人都说，你们奉了上面的命令，要离开这里了。不，你们已经要走了。而且，有人已经走了。”

“谁走了？”我问。“你不要瞒我吧，你们的什么军需处、副官处都走了。刚才有人从章家渡来，路上看见你们军需处的骡马都已牵在马口，准备装东西走呢？再说，你们的军长也已经走了。”

“怎么？你说，你说给我听，他怎么走的？”

“他亲眼看见他走的呢。他说，你们的军长骑在一匹白马上，一排卫队走在前面，他要离开云岭的司令部走了。云岭附近有五、六百个老百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手里都点着一支香，跪在地上，哭着求着，教他不要走。有几个老太太跪在他马前，拦住去路不让走，嘴里只顾喊‘青天老爷，不要走。’你们的军长对她们说：‘我们这次是奉了上面的命令，不得不走的。我们是去打鬼子，打退了鬼子就要回来的，你们放心。’老百姓哪里肯听，军长急着要走，你们军长的白马走前一步，老百姓就跪前一步，大哭大叫。你们的军长也哭了，还是一边说一边走。老百姓拉住他的马。你们军长就跨下马来，一面挥泪，一面对老百姓说：‘请让我们走吧，我们就回来的。’说完就再跨上马背，加上一鞭，就向前直奔去了。老远老远，还听见他的哭声呢。你们的军长就是这样走掉的。你们呢？”

连长讲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

叶军长当然没有走。假如他当时真是那样走了，倒不会象今日之所谓“就地被擒”呢！

新四军大部分上级干部，曾经请求叶军长带了些干部先离开皖南，倒确乎有其事的。这是在十一月下旬，大家布置好，让他先走。而叶军长怎样呢？他的回答很简单：“我不能离部队先走。我不能离开这些同志！”结果，他没有先走。如果他当时心肠稍为硬一点，先走了，倒也不会象今日之所谓“就地被擒”呢！

歌 声 遍 野

别离，一个伟大的别离，一个几十万民众和一万军队的别离，一个要割断血肉纽带的别离！如果要将一个个人的别愁离恨和这么一个庞大的、集体的、新的人类的别离相比，那简直微小得如沧海之一粟。

新四军是一支铁的军队，但同时又是一支血肉做成的部队。它有奔放的热情，它有纯真的天性，它会笑，它会哭，它是声震云霄的伟大歌手，它是气吞山河的伟大诗人。

现在，这新四军，真象一个人一样，要和他同患难的兄弟、姊妹们离别了。它应该唱，唱出它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唱出它对兄弟、姊妹们的关心，唱出他仁至义尽的劝告，唱出人类光明的伟大的前程。

于是有《新四军告别皖南民众歌》。开首是：“说皖南来道皖南，皖南本是好地方。自从鬼子打来了，大好河山变战场。当年京沪大撤退，兵慌马乱苦难当。”可惜全文我已记不得。中间讲到敌人扫荡时，有“泾县之战叶军长，身先士卒不顾身。”讲到军民关系有“军爱民来民爱军。”关于友军，则有“寄语友军官兵们，爱护民众最要紧，如若对我有成见，切莫迁怒老百姓。”对民众希望，有“切莫寻仇报私恨，皖南人爱皖南人。”告诉爱护新四军的民众，等到新四军开拔后，“一切言行要当心。”告诉反共分子则称“反共分子也来听，好汉应向鬼子拼。”全文我已记不得了。

这支歌是用安徽顶通行的凤阳花鼓调唱的。军直属队、一团、三支队、五团、教导队，到处到处地唱。有的再用了锣鼓铙钹。老百姓都来唱了，首先是小孩子，后来是女人。老头子们在田埂上走，也哼着：“说皖南来道皖南。”

在中村教导队俱乐部外面的大粉墙上，画了一幅新四军告别的大幅彩色画，底下写着告别歌的全文。俱乐部的男女工作人员整天站在它前面，打起锣鼓解释一遍，唱一遍，经常有二、三百老百姓站在那里听。当他们听到：“一切言行要当心！”“皖南人爱皖南人！”特别是听到：“如若对我有成见，切莫迁怒老

百姓”的时候，大家终是呜呜咽咽，泣不成声。

我亲见几个老头儿，特地到隔壁小店里去买了两张火纸，把歌词抄上了，塞进胸口，说：“这样好的部队……要……走……了”。说着搀着他们的孩子哭着走开了。

进步的、新的人类是艺术的、文化的。老百姓是新四军的母亲，新四军是从人民的娘胎里生出来的，所以老百姓也是大歌手、大诗人。新四军有向皖南民众告别的歌、皖南民众自自然然也就唱出了送别新四军的歌。

不知从那一个村庄先唱出了这样的歌声。这歌是仿照一个山西民歌谱的，我记不全了，只记得头上几句是：

“同志，你们要东征，
老百姓实在难留！
手搀着同志的手，
送你送到大路口。
手搀着同志的手，
送你送到大路口。
……”

后来，这歌声也就唱遍了山村。这歌声在个个新四军的“心灵”上刻上深深的烙印。一个是告别，一个是送别，一唱一和，相互应答，这伟大“心灵”

的别离，在那时完全成为诗的和戏剧的情境。

新四军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逐渐完成了。宣传教育工作已从进军敌后的阶段，进入了东征的阶段，甚至在部分单位中，已经宣布了最初的目的地是从苏南渡江到苏北。这样，全军人员就开始唱他们的《新四军东征歌》，其辞如下：

“嗾嗾哒嗾哒咿，嗾嗾哒嗾咿哒。

前进号响，

大家准备好！

子弹上膛，刺刀出鞘！

三年的皖南，别了！

目标：扬子江头，黄河新道。

那个来拦路，那个被打倒！

冲破重重叠叠的封锁，

穿进日本鬼子的窝巢。

我们一定胜利！

我们一定达到目标！”

这歌是配以鼓声、喇叭声的，非常悲壮。曲由任光先生配就，词是集体创作。此歌发到各连队去，立即漫山遍野唱起来。一团政治处的何云先生当面祝贺任光先生说：“这歌是新四军成立以来最成功的一支歌。”

任光先生作曲的态度是值得所有的作曲家和文化工作者学习的。他特别注意民歌，他的耳朵就专门倾听民众和战士的声音。他最喜欢将战士自己的作品来配曲子。他作了新曲以后，总先教战士来唱，时常跟着战士的声音和情绪来修改他的作品。他将他在法国八、九年研究音乐的成绩比之于在皖南几个月。他竭力将欧洲最新的乐理和中国大众的音乐配合起来。他对于中国各地民歌的音节有深刻的研究，他想写一部他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报告。他是中国新音乐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天才加上他丰富的素养和严肃的工作，将使中国的新音乐在世界音乐界放出异样的火花。

然而这位天才的音乐家，著名的《渔光曲》的创作者，在这次可耻的皖南事变中，大概是牺牲了（我说“大概”容下文详述）。

夜间行军演习

从十一月下旬起，军司令部即规定各部队、各单位加紧夜间行军，而对冲破封锁线一节，须特别注意。盖此次经过苏南北上，必须经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至少有两道：一道是京〔宁〕沪铁道，一道是运河。同时行军中可能遭受敌人扫荡，故各种部队对夜间战斗，应加紧训练。

此项演习由叶、项二军长亲自督率，各项科目由

副参谋长周子昆亲自规定。这对于初到战士之知识分子,尤其是我们那一部分的工作人员是一件苦事,但亦新鲜而有趣。这时节,天气很冷,半夜三更传来一个命令,在十分钟内,不但人要扎装完整确实,还要将粮食、马匹等项,一律搬走,集合起来,作夜间行军。有一次演习夜间急行军,天上有些星光,要爬过一小山坡,因为事前已经急急走了二十多里路,脚跟都有些不稳,所以那一晚行军,成绩的总结非常蹩脚。我就跌了三次跤,一跤是跌到水田边上,右腿浸到水里。一对刚从后方来的青年记者夫妇俩,他们可惨了,男的跌了五跤,女的跌了六跤,男的是十足的近视眼,差不多每跤跌的很着实。回来,总结成绩,大家就封他为“跌跤大王”。

这种生活,当时的我们已经觉得相当苦了,或者说,很苦了。但当时毕竟是演习,毕竟还是爬小山坡,毕竟还有休息,毕竟还有饭吃,毕竟还没有敌人的枪弹飞到身边;顶要紧的,毕竟还是假想冲过鬼子的封锁线。如果把 these 和我们后来的遭遇相比,那简直算得什么呢!

第四节 改变路线问题

第一批出动了

新四军北移的各项准备大致就绪的时候,第一批人员就出动了。那是十二月三日的早上,其时天才刚

刚亮。政治部战地文化服务处、军服务团等等单位的人员，浩浩荡荡向苏南进发了。

接着就是第二批、第三批。军需处的人员早在沿途布置粮食等项。大批的骡马和大批的伕子，挑着军医处的药品、图书馆的书籍、印刷所的铜模和一部分铅。在新四军人的头脑里，一个图书馆比三个子弹库还重要，新四军的图书馆，有书近万卷，各项重要参考书差不多齐备，即在后方亦很少看到这样有用的（我说有用，不是说完备）图书馆。为特别重视起见，该图书馆竟由项副军长自己主持管理。印刷厂也是他们所特别重视的。他们认为一个印刷厂，就胜过一师的兵力。黄源先生以一文学家，被任为印刷所主任，可见对此事之重视。现在搬运这些东西，均由专人负责照顾。项副军长一箱子书，中间藏有过去三年游击战时之各项重要资料，且有一个整理完竣的报告。临行时，他特别嘱咐军需处人，无论如何这箱子东西千万不能失掉。

第三批人主要是教导队的一部分工作人员，由全国著名的农村经济专家薛暮桥先生（前任广西专科师范的教授，曾主编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出版的《中国农村》）为队长，率领前进。薛先生现任教导总队训练处长，教育事宜全由他负责。他光着头，骑着马，俨然一指挥员也。这任务是相当艰难的，但他勇敢地接受了。

第四批人员和物件由军需处处长宋裕和先生亲自率领前往。宋处长为红军中之老战将，做过政治工作，做过指挥员，后任职于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局长，专管军需事宜。红军长征时，军需饷给多由他料理。他在此次移动中之物资运输，负全部责任。他走时，还带了一架电台，以备随时发报，报告途中状况。

两方面的艰难

上面说过，新四军移动的路线是由顾长官规定的。同时上官总司令和五十二师等友军都曾负责声明，对新四军移动愿给以方便。所以新四军的头几批人马，在未到达敌占区前，当然毫无戒备。谁知奇异的消息不断传来。宋处长的电报说：当前批人马行抵马头镇时（此为规定路线内必经之地），友军五十二师却严阵以待，不让通过，迫他们绕道过渡。再到离开杨柳铺八十里的处所，友军正在强迫民众筑工事，而且就在战壕里架好枪，对着新四军。又行经郎溪南三十里处，其时敌人并未在扫荡，友军却命令当地民众彻底破坏道路。新四军南渡的兵站被抢了一部分粮食，新四军的通讯员又被捉去，严刑拷讯。这些事情使新四军负责人预感到事态之严重，或者会超过他们平日所想象的，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循此路径，遵命北移的决心。

后来，新四军三支队谭震林副司令自苏南来电报告，说为首几批人员已经到达苏南某地，但敌人早已知道新四军要经过此间北移，故已开始扫荡，原有据点势将移动，大批人员要冲过封锁，一时完全不可能。来电并称：少数人员前往尝试突过封锁，但已为敌之扫荡部队冲散。所以现时已经到达苏南之人员，只能暂留彼处，个别化装过去，后续部队请勿再开来云云。这样的报告连来了几个。于是后面的军直属队等，都不能按照原定日期，向苏南进发。而叶军长乃电顾司令长官，说明这种困难，不得不稍延日期。

以上所说两种阻难，就是当时新四军不能按照限期离开江南北移的真正原因。

突令改变北移路线

正在新四军进退两难之际，谣言就到处传播起来，说新四军不愿离开皖南，要到天目山、黄山创造游击根据地，说北移困难实是一种推辞。据我们当时所知，此种谣言之传播是非常有计划的。造谣者绘形绘声，说新四军已经派某某人等到天目山去布置，派某某人等到黄山去安排。更可笑的，说新四军甚至已派大批干部，到浙江金华一带去准备创造后方根据地，以便与前方策应，彻底扰乱第三战区云。

适在此时（十二月中旬），顾司令长官突然来令：

新四军全部改道经皖南铜陵、繁昌，渡江北上并催促于限期以内必须完全渡江。平心而论，这个命令就等于置新四军于死地。何以言之？原来新四军在江南、江北的交通运输，确是经由皖南芜湖附近之敌区，渡江到无为这条路线的。不幸后来李品仙将军之桂军开到无为一带后，对新四军交通运输人员及器材，经常加以袭击。去年夏季，竟将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夫人、孩子及工作人员曾昭铭二十余人，悉予扣留，并袭夺军饷七万元。自此以后，这条从皖南渡江的路线即告断绝。迨新四军北移问题发生后，更产生下述情形。

（一）新四军渡江北移，友军方面早已传播，而敌军则早已广播几次。敌军对此已加紧布置，准备堵袭。在陆上，其十五师团就集中在铜陵、繁昌地区，以逸待劳预备一鼓而歼灭新四军过境部队。在长江渡口，则动员几百艘汽艇，来往梭巡，专等新四军渡江时猛袭。这是敌军方面的布置。

（二）皖北李品仙将军早已统率好几个师（当时有二十几个师进迫江北新四军）在江北津浦线西段，追击新四军第四、第五两支队。当顾长官改道命令传来之时，李品仙将军却又抽调三师人马在沿江无为一带集结，占领渡口，封锁道路，扣留交通器材。不但如此，他们公开声明要把新四军消灭于扬子江滨。闻

此即为在梁园设立之“扫荡新四军总办事处”的任务之一，这是皖北友军方面的布置。

(三) 新四军为准备于万不得已时，从皖南渡江，所以事前曾对此交通路线做实地侦察和布置，但结果均告失败。如江北指挥官张云逸将军（新四军参谋长）曾于十二月间派少数部队到无为地区侦察，半途却遭友军（李品仙将军统率之广西军）猛烈袭击，大部失踪。皖南军司令部亦曾派军需处副处长张元培及教导队队务处长张元寿等渡江侦察，已经筹备了一些船只，但大部队渡江，谈何容易。

所以当时新四军要从铜繁渡江北移，是完全不可能的。再加上友军三面包围：东有冷欣将军之部队，南有张文清、莫兴硕之部队，西有范子英、陈万仞等之部队，围迫之势，业已造成。故据当时估计，如新四军当时经铜繁北移，除遭遇敌人之阻袭外，其渡江部队将先遭无为江边友军之袭击，而后续部队则将遭江南友军之威胁。如是首尾夹击，新四军这一有力的抗战部队，真个休矣。

当局同意仍走苏南

当时叶军长连电重庆和上饶，要求仍循原定路线，经由苏南渡江北上。电文内陈述各项困难，极为详尽，除上述各点外，还说明新四军自奉命北移后，

朝夕筹备，颇非易事，今沿苏南各站，交通、粮食各项都已办好，如再改道，则铜繁渡江之线，全无准备，势必延误日期，有违上峰之命，徒增无穷之罪。项副军长且曾要求亲赴重庆，向委员长面陈新四军各项困难。经委座转托军令部次长面告周恩来先生阻止。叶军长请求电报去后，顾司令长官首先表示同意，其回电所称，唯求新四军之赶速离开皖南；并称，前电指定改道铜繁，乃指两条路线可以斟酌采择。上官总司令也回电表示允许。最后蒋委员长也准予取道苏南。

在此来往磋商期内，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参谋陈淡如先生几度往返传达意见。惟据新四军诸负责人之意见，陈君使命，主要似不在完成谈判，而在探听新四军之军事实情。盖陈君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先生相知颇深，所以确切知道其任务也。其时，上官总司令亦派参谋某君，前来军部，传达上官意见，催促新四军早日完成北移任务。

当时新四军方面，亦派袁国平先生及政治部秘书长黄诚先生等到各友军接洽，恳其对我行军时，确切予以便利。袁先生曾与中央军五十二师及一〇八师诸将领交换意见。据袁先生回来报告，友军高级将领中对新四军的确误解颇深。他们总以为新四军要袭击他们。推源其故，都因特工人员之捏造报告，以及上级之指示。惟一般中、下级军官则情形显然不同。川军

之表示显然不愿内战，且洞悉如内战一起，彼等自身之命运便显然岌岌可危。但彼等坦白说明，如中央命令他们打新四军，那只有开枪，不过希望事前谅解，“相互不为已甚”。黄秘书长到友军中，曾研究友军中战士之情绪。据称，除极少数认为新四军为杀人放火的红军——匪军（他们的政工人员均如此报告，别项消息又无从传达到他们那里）外，对新四军英勇杀敌，均极钦慕，对内战，则痛恨。不过他们总觉得长官命令，无法违拗，故希望新四军快快走开，免得上面下命令要他们来打新四军。谈到他们的生活，则据称异常困难，饷项欠发颇多，官长打骂制度依然如故。谈到这些问题，其情绪异常愤激。

音乐家任光先生听到这些情形，立即奔到他的风琴上，谱成《友军呼声》一曲，写实也，其音节哀而婉，唱时令人啜泣。其词曰：“我们本来是老百姓，为打鬼子来当兵。老父老母卧在床，妻子流汗把田耕。不发军饷好几个月，吃不饱也穿不暖，挨打挨骂不算大事情。为打鬼子吃苦也甘心！忍泪含恨，一心一意要和鬼子拚，不打抗日军。”

就在这时，新四军还力图增进与友军的友谊。比如曾和中央军五十二师比赛篮球。那次参加者为军政治部的篮球队（新四军对各项运动均极注意，文学家黄源先生在网球及乒乓球比赛中，曾获全军冠军之

称，作家夏征农先生——政治部民众运动部副部长，亦为新四军篮球名将。军政治部篮球队为皖南全军之冠，其名角差不多都是南洋侨胞)。惟事前经黄秘书长向全体队员说明，此次比赛必须输却几分，并须特别遵守规则。嗣由黄先生亲自率领，到五十二师司令部。当开始比赛时，双方球员握手言欢，非常亲密。比赛之时，五十二师球员犯规次数极多，最后由新四军输却二分，尽欢而散，此去年年底事也。其后，其他友军亦相继来约比赛，有一次定在一月五日，但那天新四军已全部出动矣。

补发饷弹问题

十一月中，叶军长与顾司令长官商定各项，除北移限期及路线外，尚有补发饷项、弹药等问题。当时顾氏面允先补发两个月的经费、子弹，但须经过宁国时向上官总司令部领取。当先头部队过宁国时，这笔经费没有领到，旋经再三再四和司令长官部交涉才得补发到十二月份。而弹药一项则自去年三月份起就没有补充，移动前所答应先补发两个月也毫无着落。至于新四军方面，因连年作战，伤亡一万多人，要求当局给一些抚恤金，结果分毫未得。又棉衣费一项数十万元，也未得分毫补给。最后，新四军因移动时经费浩大（据当时确实计算，即伙食一项，每日即须万

余元。因皖南物价较低，苏南物价较高，所以请求照例给以开拔费。长官司令部直到一月初，才批准两万元。一月四日晚上才由新四军驻上饶通讯处负责人吴金魁领到，他回到军部，部队已经开动了。

第五节 在移动中被歼灭

一月四日晚上全体出发

以上所说新四军皖南部队一部分约千余人，在十二月里，已经到达苏南，而且大部已零星渡江北上。新四军共约九万余人，而在皖南者仅为军部直属部队、三支队一部分、一团及各机关工作人员，总数约一万人。其中各机关工作人员及各项干部、伤病员，倒占去了三、四千人，内有女的工作人员及家属数百人。

这不到一万人的部队（中间有三、四千人是完全徒手的），原定一月二日即行出发。后因天雨，顺延到四日晚间出动。行前发表《告别友军书》及《告别皖南民众书》，均载《抗敌报》末期。其所以在四日夜行动者，盖避敌机轰炸也（因为那一时期，敌人已知新四军将整个移动，敌机时来侦察，且作小规模之轰炸）。是晚九时起，各部队、各机关人员即渡青弋江浮桥，向茂林、凤村一带进发。夜深漆黑，各队人员均掌火把，遥望之，蜿蜒如火龙，盖日间须避敌

机，夜间则不必避任何人的耳目也。据我深知，当时新四军负责人员自叶军长以下，均作如是想。到后来回想，此种想法未免太过天真矣。

陈联络参谋同行

这里有一段插话必须叙述。当四日晚，军司令部移动前，忽报长官部联络参谋陈淡如先生有事看叶军长等。其时叶、项及周副参谋长等因调度部队太忙，故请袁国平先生以旧交关系先去商谈，知道并无什么紧要事，惟要求新四军暂缓出动，免生“误会”。大家听了，莫名其妙。先前顾长官等力促新四军速行，如今反劝暂缓启程，此中道理，真令人莫测高深。据当时新四军负责人非正式估计，陈氏此来，许是兵家所谓“缓兵之计”，他硬要新四军坐待友军包围全部完成，好让人家一鼓歼灭。此种估计乃根据一月初所得各方面情报而作，但究竟是否如此，尚不敢作最后判断。但当时新四军负责人都认为：此次行动中，部分的受友军袭击，已属无可避免矣。

叶、项军长见情形如此，一面再三用电话告诫各部首长，此次行动务必戒慎，在人家犯我时，固然坚决地执行自卫，但千万不可先向人开枪。此项谆谆之嘱，乃在参谋长办公室内之电话上为之。而这半夜，叶军长、项副军长、袁国平先生及副参谋长周子昆将

军及余等五、六人几乎并未离开该办公室一步。叶、项并嘱袁国平先生去向陈联络参谋说明部队业已开动之情形，并请其暂留此间，与新四军军部同行一程，一则可以请他实地观察，新四军是否真如外间所传，要袭击友军，不想北移；一则如沿途友军有所阻难，请彼以长官部参谋名义，从事劝阻，如是则对大局也许有所帮助。陈氏俯允。惟在彼心目中，以为新四军此举乃将彼扣留，并非友谊的行为。故当时一面表示：新四军不欲掀起内战之真意，彼完全了解，外间所传，尽属谣言。惟彼以为局势如此，不容乐观（此点实费人思索：盖彼既然了解新四军决不愿与友军冲突，如若友军亦如是想，亦如是做，则何以需要如此担心！）且长叹数声，曰：“我参加政治十多年，一生奔走，惟知报国。这一时期，我奔走于长官部及各友军之间，其任务亦属如此。今竟不能挽此狂澜，心中实在惭愧。如能以身免，今后当告休回家，吃大米饭，不再问政治了。”云云。实则陈氏对当时新四军留彼之真意，完全误解。叶军长其后屡次派人去说明，他终不能释然。

司令部人员出发时，特为陈君备一轿子坐着，与司令部同行，且派政治部《抗敌报》成员方先生为伴。行军中伙食，一般非常马虎，叶、项等只在头一两天稍带几个鸡蛋佐餐，但对陈参谋之伙食终比较特别优待。

四日晚将行时，叶军长乃致电顾长官及上官总司令告别。电文中首先对彼等表示谢意，其后重行申述团结御侮之决心及仍须取道苏南北上之原因，最后希望令饬各友军多方协助，勿加阻难，爱惜此抗战之力量，令其以敌周旋，报效民族国家（大意如此）。拍电时，因司令长官部之呼号不通，改请上官总司令转发，同时致电附近各友军——五十二师、一四四师、七十九师、四十师、新编第七师及第一〇八师等，恳其沿途协助，俾达成上级交给之任务。此均一月四日晚间事也。

友军包围圈

一月五日晨，全军各部到达茂林及其附近地区。司令部人员驻扎在茂林附近的一个村落上。本拟连日开拔，第一因天雨，其次因各方情报，知道周围情况非常紧张，所以决定留在茂林一带，权作休息。这两天，我和叶军长同住一室。叶、项及周副参谋长讨论军事行动时，我经常是个旁听者。叶军长常戏谓予曰：“再过一些时候，你也可以带兵了。”我这时期的确用力研究军事，实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之名言。

住在茂林的第二天，各部队的电台都已经建立起，司令部秘书处的电台，早已和各处通报。据当时所得报告，周围友军确切知道者已达七个师，人数约七万

余人，彼等对行动中之新四军已形成一坚强之包围圈，其驻防地点大致如下（仅凭我现在的记忆，或有舛误，但大体如此）：

第五十二师——泾县县城一带

第一〇八师——青弋江、大康王地区

第一四四师——从包村、厚岸到茂林、章家渡一带

新七师——自木镇至中村一带

第四十师——星潭、三溪一带（自苏南溧水经广德开来）

第七十九师——太平、铜山地区（自浙江开来）

这样可以说已将在茂林一带之新四军，包围得水泄不通。到此时，新四军负责人才了解友军对新四军不但要加以个别的袭击，而且要全部予以歼灭。证明当日所获情报，友军已“奉令将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更见显明。五日晚间，叶、项、周等就仔细研究对策。当时决定的方针是：友军不开枪，则新四军决不开枪；新四军继续向苏南进发，其路线则蹿友军包围圈之空隙。循此方针，乃找熟悉当地地形之工作人员及民众，精密研究脱出重围之路线。当晚决定之后，即分配各部以具体任务，用电报拍去。

五日下午，友军某师之一连，已在高岭附近向新四军开枪袭击，当时新四军并未回枪，后来见友军增

援冲来，遂予以回击，双方死伤数人，友军被俘四人，即解到军司令部军法处。六日，我和政治部汪科长等特去审问。他们只说此次冲突终不能免；我们完全奉命而行，没有办法。问他们，友军究竟作何布置，坚不肯说。后来经军法处多方探询，始知这四个都是相当老练之特工人员，并非普通战士。

六日，军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部长林植夫先生以与陈联络专员亦有几面之交，遂去看陈，且告以友军之布置如此。陈大惊，当时以为林氏此行乃给彼以警告，实则林氏全无此意，仅向彼说明，新四军的意向决不愿与友军冲突而已。陈当场表示：如新四军方面对彼已有所决定（其意是指枪决），请早早执行，如欲令其有所报效，彼当致电并致函于司令长官说明新四军的苦衷，并希望令饬各友军解围。言罢，泪下如雨。林部长就告诉他，新四军对他决无别意，其生命安全，敢绝对担保。同时表示，如彼愿意从中斡旋，使不幸局面得以和缓，则彼以国民一分子资格，表示感谢。陈即乞纸笔，草拟一电报，乃致顾长官者，并写附一信。此外，他还写了一封家书。林先生拿回来，即交秘书处都给发出了。

同 乐 会

到茂林后，凄风苦雨，天气闷人不堪。各部队、

各机关均举行同乐会。盖新四军对文化娱乐极端重视，定为行军中之重要工作。任光先生于五日上午即集司令部卫士及杂务人员于一堂，教彼等唱《王老五反对开小差歌》及其他新曲。下午，我们都又参加政治部的同乐会。因地方太小，干部及杂务人员分别举行。我们参加了干部同乐会。大家说着笑着闹了半天。其中捉汉奸一幕顶有趣味。我亦被坚请表演小魔术一套，博得大家哄堂大笑。底下一间房间里，就由杂务人员在开同乐会，他们唱戏的唱戏，说双簧的说双簧，真个热闹非凡。其时《抗敌报》油印号外出版，都争着看。上面载着一则消息，说友军某部已向本军发动进攻，被某部某连当场击退，并获俘虏四人。大家看了，一面担心，一面紧张起来。

揭示牌上粘着政治部的行军壁报。最惹人注目者，即差不多十分之七、八的篇幅都是诗篇，有的新诗，有的旧诗。盖诗人的情感是最凝练的表现，故在行军紧张时，大家都有琳琅诗篇出现也。六日晚上，李一氓先生亦赋诗一首教我应和，后来因为当夜出发，我来不及和出来，其后则事过境迁，原诗既经忘却，应和当然更谈不上了。李诗为七律，仅记其第五、六两句曰：“不入黄山千丈雾，横跨青弋一江云。”描写当时在章家渡渡口过青弋江时情景，同时驳斥谣传，极富神韵。

翻 过 丕 岭

一月七日晨三时，全体部队离开茂林向丕岭进发。盖事前探知，此处系友军包围圈之间隙，或能通过。将抵高坦，即有某部通讯员来报告，前线已发生接触，丕岭上有友军阻路，且密集开枪，某部已将其击退矣。司令部即在高坦汪氏祠堂上稍事休息，其时天将明，而转酷寒，大家就挤在祠堂里歇下。参谋处又架起电台与各单位联络。周副参谋长当即派一参谋，上岭侦察，如无多大动静，全队人马，即行上岭。

旋得报告，岭上已无友军踪迹。全部人马当即沿一小溪前进。当时决定不走大路，恐遭意外之袭击，故循小径上山。沿路有侦察员传达报告，首次称丕岭上尚有枪声；其后称友军已尽退山下去了。经过百姓人家，最初都闭户逃避，当告以是新四军，即开门出来诉说他们昨夜听得枪声、机关枪声，十分惊慌，因事前已有某师一排人马，前来抓鸡抓猪，掳了一通去了。我们告以不必惊慌，不久便可平息。乡民便指指点点，口里说：“这部队真好，真好！”

山路越爬越陡，山峰越来越峭。而且峰迴路转，好象路总走不完，峰总爬不尽似的。云雾迷漫，涧水峥嵘，真是绝好风景。项副军长笑谓我曰：“打游击才能看好风景。此等地方平时哪里走得到。”这时我就想

起，前些日子项和我们畅谈三年游击战时，谈了几晚还没谈完。他当时也说江西、福建、广东边境的好风景，他都看遍了，将来谁要写一部东南风景志，那非请他为顾问不可云云，询非虚话。

路过一小山洞，洞前有机枪弹壳甚多，知为友军早上打新四军时所用。其实项及袁国平先生均称，此路曲折而险，如友军在此等山坳处对我施以袭击，且坚守不退，则确乎难于通过的。我们最初都骑马上山，后来路转险陡，遂徒步爬山，马都跟着走，骡马都气急喘喘，累得要死。路过一处断崖，我们都累了，就驻足休息一下。将行，叶军长忽然大发风雅，站定在山野旁边叫我道：“俊瑞，我有两句诗，你接下去和成一首，好不好？”我想叶军长在此又饿又累的时候，还有如此雅兴，而其实，我当时的兴致也并不坏，就应他说道：“好，不知我接得上否？”他就念出他的两句诗来：

“雾里美人云里山，临崖立马君试看。”

真是不仅风雅，而且有些风流呢。老叶对其夫人之爱 and 惦念，我是深深知道的。我想了一下，便转换口气念道：

“层峰直上三千丈，出押蛟龙插翅飞。”

这仅表示我当时的希望而已。我们吟的虽是歪诗，但回想当时的情景来，真是怪有味道。

再过了几个山头，快到丕岭顶上时，即听得那边山下有枪声。等到爬到山顶，则山下不仅有步枪声，且有几阵机关枪声。于是知道战斗尚未结束，大部队尚无希望过去。在山顶休息片刻，山下枪声稍疏，乃朝着枪声起处，走下山去。此时，我们事实上已经上了战场。我和任光先生等都是未习惯于战场生活者，那时心境确有些两样。但此种感觉亦异常新鲜，同时预想此种情形亦大约不会继续好久，不久即能平静。

沿路就看见几个新四军的负伤战士，躺在路旁，工作人员在为他们敷药，且有担架等着。有两位受伤颇重，口中喊痛喊妈不止，我们见了心里非常难过，但亦只有把他们留在后面，此外别无办法。因新四军的医院早已撤销，医务人员差不多全已调离皖南。当时我们都说，假如此时沈其震处长在此，其心中不知要苦痛到如何也（沈处长对伤病兵员之爱护，无微不至，是全军皆知的）。

我们下山时，步履都极慢，因恐两旁有友军埋伏，事前总先派人员上前侦察，然后前进。走了一个多钟头，就到山谷内（皖南人称为坑）。坑内有三、四户人家，我们因为肚子饿得不得了，就走上一户人家，给了些钱，叫他们烧些东西给我们吃。谁知村里人回答，他们的米早已给友军拿光，他们的一个病孩子，今天还睡在床上叫吃没吃呢。不单这样，他们的衣、

被也已被拿光，那位家长出来见我们时，身上还穿着他女人的一件夹衫。我们无奈，就将各人所背米袋（行军时，多数背一长形的米袋）中的米，拿出一部分米，借他们的锅子，烧些稀饭来喝。我的卫士在茂林街上替我买了一包花生，也全拿出来，大家吃了。吃了之后，精神大为振作。而其时步枪声、机枪声又来得密了。而且到傍晚时，还听得很近的炮声。

星潭遇阻——第一次折回

叶军长在当天下午，带了几个卫士，亲自到火线上去视察。他回来时讲，坑口一部分仍为友军占住，坑口前面就是星潭村。据侦察员报告，友军第四十师（从苏南开来的）在该村筑有碉堡，其中有两个辅助碉堡，新四军已经占领，其主要的一座仍在友军手中。现友军封锁坑口，火网猛而密，所以完全不能前进。当时某参谋即建议，翻过裘岭或另一山岭，或能冲出重围。盖当时新四军一团和三团正在星潭一带和友军激战也。

将晚，叶军长即召集一军事会议，项、袁、周等均出席，对当前局势及眼前处境作慎重的检讨。会议历六小时始散，决定不向前进，而自该坑撤退，再翻丕岭回到原路。当夜即仓促出发，检查人马时，见已有小部分迷路散失者。黄源先生率领之印刷厂职工，

其时即四处寻找不见，盖因黄昏天黑，失却联络所致。直到第二天下午，我们已到丕岭另一山脚之坑内时，才发现他们蓬头垢面的来到。盖他们已伏在山上榛莽中饿了一天一晚矣。

当天晚上重翻丕岭之时，实已非常疲劳，因为白天刚才翻过这云峰层层的高山，晚上又要翻过去。加上天色漆黑，又不能照火把，张电筒，实在难走。任光先生还要扶着他太太。我则恨煞是近视眼，山径曲折，一不小心，就要迷途。我没有办法，只能叫我的卫士在前面走，我在他背上缚上一块白手巾，走时只能不看脚下，单看他背上，跟着走去。因为当时跌跤事小，迷路事大。当然，有时沿绝壁走时，跌跤也并不好玩，一失足便会成千古恨的。但毕竟跌跤事关一己，迷路则事关大家，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大部队，如若你一人走错了，后面的人就会跟你全都走错。这种苦痛经验我们后来遭遇不少。即如这翻丕岭之行中，黄源先生一千人马之特别吃苦，何尝不是如此。

在没有翻过山顶的时候，经常担心背后有炮打过来。那时“灯光管制”特别严格。叶军长屡屡从前面口头传下命令，绝对不准点灯，不准掉队（即落伍的意思）。但我就是一个时时刻刻有掉队之虞的宝贝。这时我才悔恨不该把眼睛弄成这样的近视。至于点灯，也是有的。这是几副担架，中间有一副就是担着社会

科学家朱镜我先生。他是政治部宣教部部长，他害胃病很重，最近因跑路爬山，过于辛劳，就吐起血来，行走不得，所以只能睡在担架上。另外一位，就是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李子芳先生。他刚才在临时军医院割治盲肠出院，就碰到这样的关头。他也行走不得。另外的就都是这次受伤的战士。这些担架，在漆黑的深夜，要抬上这样陡的山岭，路又狭又不平，如若没有火把，那怎么行呢！所以虽经军长再四严令不准点灯，而还有盏灯火点着，在山岗上如萤火疾飞者，以此也！

未到山顶，有些人实在已经走不动了。任光先生的太太眼睛也不好，拖住任光先生走，弄得他满身大汗，气都喘不过来。他委实走不动了。一面因为肚子饿，我实在也走不动了。老于行军者如教导总队队务处长（后为代理参谋处长。因原任参谋处长赵凌波已调到第一团去协助傅秋涛，为副指挥）张元寿先生，走到山顶也只得躺着，走不动了。当然，他又当别论。他是从江北赶渡江来（因曾被派侦察无为一带交通线路），又被调到参谋处工作，连日连夜毫无休息所致。

这样走了五、六个钟头，才重新翻过丕岭，到得一家土纸厂里休息。太累了，一倒在稻草上就鼾睡了。

到后来，从纯军事的眼光检讨起来，如果这次不折回来，沿裘岭及其左右，两翼包围，当时完全有冲

出重围的可能。

高岭再遇阻——第二次折回

八日晨，天刚亮，就起身。吃过早饭，就又向原路退回，朝高岭进发。当时新四军负责人认为，高岭坑道左右，有间道可以通过，也许可以避免冲突。

此时大家估量局势已成定局，三战区陈联络参谋同行，亦未见其有何帮助，乃请其回去，免生其他误会。彼乃去。临行时相互道谢而别。

我们仍是沿着山涧走。叶军长及其卫队是在先头走，我们在后面跟着，还都骑着马。我们在马上一时看看风景，一时还可以读读书。走过小村庄，老百姓站在门首，看我们走过，总显得惊奇，觉得这个部队温文尔雅得可以，骑在马上走路，还要用功看书。

将午，前面又隐约听见枪声。侦察员来报告，高岭有友军第七十九师拦路，现正与五团冲突中，详情待续报。这时我们沿路看见，有五团战士及政治工作人员向前增援，就知道高岭战斗，一定相当激烈。

再想继续前进，但闻炮声及机关枪声益密。于是又碰到了钉子。但那时叶军长却率领其一部分卫队独自上前去了。大部队却停在路上。项副军长等即请叶回来，又坐在山脚下商讨应付办法。决定再度忍让，毋使冲突扩大，立即命令全队人马仍向原来路折回，将晚到

达土纸厂，权且做饭宿下。

当夜，叶军长和我住在一个阁楼小房间里。晚饭后，他告诉我，他已致电重庆及延安，说明目前处境之困窘。他认为这局面恐非一再忍让所可解决，如此下去，全军人马恐怕都要拖累而死。他还追述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在潮汕一带退兵的情形，言下，不禁长叹。

我当时还不知道，当晚要立即动身。所以还准备睡觉：把皮包解下来了，呢大衣脱下了。叶军长告诉我：“就要走的，不要睡了。”果然，不多时某参谋就来通知立即出发。于是我们立即上路。

在未出发前，司令部命令各人把行李全部重行检点一下，将一切不是最必需带的东西，全部送给当地老百姓或竟丢弃，准备轻装战斗。这样，我就只留下一只身上背的小皮包，一条轻的小棉被，一身短衫裤。其余的全部丢了。这丢，对于我当然是非常伤心的。这里面有我三年多来的读书笔记，特别可惜的有一部在重庆时所写而在皖南已部分补充完的原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约十二万字，另有一篇去年十二月间在司令部时所写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及其指导问题》稿子，约三万字，都被迫丢掉了。另外，还有两张答应人家永不丢掉的照片。但这些损失，如和当时全军所丢掉的东西相比，又算得上什么呢？

大雨和弹雨

又是黑夜行军。又不准点灯！不准掉队！我们向高坦进发。今夜行军的情形和前两天完全不同了，现在已变为完全的战斗行军。新四军，从所有的负责人到全体战士，都认为再作退让，便是死路。无论如何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站在保卫民族抗战力量的立场上，坚决战斗了。我们要老实说，当时新四军因为连日的“倒回头走”，士气已经大大受了影响。而且此次移动，绝不准备打大仗，原有粮食全部转让，现在这山区里边，并无大的村落，如何办得到这许多粮食？所以当时大家觉得问题是非常严重了。

半夜，到达离高坦三、四里处。两边都是紧密的机关枪声。流弹已纷纷从头上掠过。夜是漆黑，北风刮得劲，冷到刺骨。我们停立在路旁。其时叶军长已亲率一部分部队，在高坦山坡上作战。这里对新四军作战的主要是第一四四师，他们在高坦两旁山上，都构筑了工事，布置了机枪阵地。等到先头部队到时，他们便密集射击，所以叶军长就命令部队向前冲去。

这时的战斗非常激烈。几千个非战斗员的队伍都站在高坦附近的路上，其时忽乌云密布，大雨倾盆，把所有人马下得都象落汤之鸡。再加上刺骨的北风，简直吃不消。我们这几个人弄得一把伞，大家紧挤在

一起，还冷得牙齿突突作抖。流弹密密的从头上飞过去。大家静寂地站着。对面山坡上离我们不到三百米的地方，已有人持着电光在梭巡。我们想：如若是友军，我们就都糟了糕。

前面不断传来叶军长的命令，叫三团、五团等等武装队伍赶速前去增援。大家全部的希望也都寄托在这些增援部队身上。我们站着的一条路是很狭的，这些非战斗员要尽量让战斗部队赶上应援，有时被挤下路边的水沟里去，似乎也觉得应该，好象这样才算尽了一点义务。

快要到天明的时候，枪声稀疏了，前面来的报告说，友军已经给这边打退了。于是我们就走上前去。走过桥，就是高坦的汪家祠堂。不多一刻，就有一个副官走来，对我说：“军长请你去。”于是我们就走进祠堂，叶军长就在右边厢房里休息。我和任光先生等因为站在路上一夜，吃风吃雨，疲乏万分，也急急忙忙倒在铺上就睡。那时从叶口里知道，这祠堂左右两个山坡的友军已经全部退出，但友军封锁重重，前面山头还在友军手中，并且已有开始向这边进攻的模样。同时，叶军长又在向集合在祠堂附近的部队训话了。

但我们实在因为太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睡了一觉再讲。

走上高坦火线

枪声和炮声越来越密，毕竟睡不得。我们也就爬了起来。须臾，第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来了，叶军长见了大大欢喜。张在内战时代，曾任红军师长，是一员猛将，性如烈火，但坚贞胜常人，作战尤勇猛无比。他一到，叶军长便命他先到背后坡上去视察一下阵地，然后带了人马，向右翼迂迴，绕过友军背后，设法冲出一条路，可让干部队伍通过。（那时作战主要目的即在保存干部力量，其他在事实上已难顾及了！）

其时，祠堂门外忽欢呼声大作，我们都莫知所以。我就出去一看，见政治部工作人员及大批在休息中之战士，在高呼“欢迎友军参加新四军共同抗日。”仔细一看，一群人簇拥着一个战士在中间走。后来才知道他乃一四四师的一个排长，在早晨战斗中率领其半排人投诚过来，且携带枪二十余支，还有些子弹。众人把他推到祠堂左旁的草坪上，由政治部人员即席致欢迎辞，略称：“我们决不愿打友军，我们要求友军让路给我们转移。这位同志能深明大义，率部投诚，共同抗日，我们十二万分的欢迎！”说完，他们一阵热烈的鼓掌。那位友军排长感动得什么似的，他梦也没有梦到，到这里来会受这样的待遇。在场的战士们就唱起新四军军歌来，唱到末尾：“东进！东进！我

们是铁的新四军。”的时候，特别有力。忽然间，“轰！”的一声，向这草坪方向过来。

“大炮！大炮！”大家叫着。

那位政治部的临时主席，就叫着：“大家散开，快快散开！他们的炮兵阵地找见了这里的目标了。”

于是一面临时装成，写着：“欢迎友军同志！”的大旗在前面引着这位排长到祠堂里来看军长。那时叶军长已从房间里走到祠堂里，那位排长由人领过来，他见是叶军长，便立正行了敬礼，大有觳觫之概。叶军长立即温慰他一番，接着就问他的姓名，在哪一部队，他一一回答了。

“你为什么要投诚？”叶军长微笑着问，手里摇着他那支随身不离的手杖。

“我们不愿打新四军。”

“你们为什么不愿意打我们新四军呢？”

“因为新四军抗日的。我们同你们共同打过日本兵。”

“新四军不是‘匪军’吗？你怎么相信他会抗日的？”叶军长笑着说，那时听的人，大家都笑了。叶军长是怪会这样幽默的。比方，他对那个看守汪家祠堂的六十多岁的老头子说：“你们汪家出了大好老了，出了汪精卫这个皇帝了，你们这些姓汪的还会苦吗？”弄得那老头儿窘得连连摇手道：“不、不、官人，他是广

东汪，我们是安徽汪呀。我们没有交关的，官人！”

那排长连忙回答道：“不，不，那是我们长官教我们说的。我们知道新四军顶平等、顶文明，你们打敌人打得好。这次长官命我们出动，说是打敌人，谁知是打你们！”

这时后面的枪炮声又紧起来了。叶军长就嘱咐政治部好好照料那几位友军的战士，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不要去打搅他们！还有一位友军战士挂了彩了，军长嘱咐好好先替他敷药，而当时新四军自己的负伤战士，还有几十个躺在祠堂厅堂上等敷药呢。护士们就替那位友军战士先敷了。

当下叶军长就带了参谋一些人员上山督战去了。所有上山的人都拔出驳壳枪准备冲杀，我们也跟上山去，走上第一线。前面指挥的人，叫大家伏着爬，不能站着走。友军的阵地就在对面山坡上，离此不到一公里，我们抱着充分的战斗决心爬上山去。这是个小山。前面友军阵地所占的山比较高，大炮不时向这边放。不过，很奇怪，我没有看见这些炮击损坏了什么，于是我对炮的戒心减少了一大半。爬到将近山顶上，叶军长拿着那个望远镜，挂着他那副照相机（这是他永远带着的），撑着那根手杖，独自站在那里，对面山上的子弹“虎！”“虎！”“切！”“切！”地飞过来。他兀自不动站在那里，用望远镜望着对面友军的阵地。

他指挥着左右山头上新四军的队伍向对方射击。

“带了你的辩证法上战场”

新四军这时候除开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冲出一条血路之外，其余全无路走。现在各个队伍都开上火线了。连教导总队的干部队和政治工作人员队也都开上火线去作战了。所谓干部队者，其学员都是全军各部调来的现役干部，为求深造，所以再入队受训，使干部的政治与技术水准更加提高。政治队则是专门培养部队政治指导员、政治干事和文化教员的，来队学习的差不多全是后方思想进步的青年。他们格于后方环境，不能偿其抗日夙志，就纷纷到新四军教导队来学习。最近的教导总队第三、第四队约三百余人，都是政治队。而第四队的学员都是最近入队，训练才不过一个月，共一百多人，其中多数系来自上海、浙江、江西一带之知识青年。有几个女青年，原在胡兰畦女士领导的妇女劳动战地服务团工作，最近脱离该团，来到皖南，也加入了该队学习。另有一位王君，原在重庆全民通讯社工作，近因环境关系亦脱离重庆来皖南，原来想参加战地文化服务处通讯组工作，他中、英文都很好，长于采访工作，终于因为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工作人员已都离开皖南北上，不得已遂亦参加第四队学习。这些青年同志怀着满腔热情，准备学习些抗战

建国的理论和军事技术，替国家切切实实做些事情。如今受训一月，枪刚才会拿，是否会放还大成问题，现在却因友军所迫，不得不奔上火线，寻求活路。

一小队、一小队的增援部队从指挥所（我们所站的那个小山坡）的小径转到另一个山坡上去。这里便有教导总队的干部队和政治队。我和他们都熟悉，因为我也曾上过他们的课。我看见那位姓王的朋友（他从重庆来不到两个星期）居然也捏着一支梭标，挂着两个手榴弹（还没有带步枪），向火线上走去。他看见了我，连忙向我招呼，同时表示惊异：为何我也冒险站在那里准备冲锋！四队里还有一位刚从桂林来不到两个月的朋友，他却能背枪了，现在昂然跑步上阵地去。他们都很紧张、兴奋，同时脸上都显得带一点骄傲的坚定。他们已经没有个人，只有集体，因为在那时个人是何等的渺小呀。任光先生也爬在山坡上，和我一道。他经常时时提起的那种在巴黎和马赛生活的回忆，那种愉快而有生气的回忆，现在这些都变得十分猥琐，他绝口不提了。总之，人到了这里已全都变了，人的生命决定于集体战斗的一瞬间。大家都显得勇敢，都显得美丽。同志的爱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人类在这时才从生命的血肉里，找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你笑，只能通过大家来笑；你哭，也只能通过大家来哭。光荣与毁灭决定于刹那之间。你看那叶

军长，简直满身是胆。他在泾县之战，敌机十多架已经低飞到头上，开始丢下炸弹，他还要站着拍敌机的照。现在友军的流弹集中射到这山坡来，已经从“虎！”“虎！”“丝！”“丝！”之声，多数转而为“切！切！”之声（这声音表示流弹已近在身边），他还在站着打望远镜。这是一个英迈的躯壳，这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他镇定得象钢铁做成的人，在这个人的灵魂里蕴藏着热烈的爱，辛辣的恨和新人类的幽默，甚至于诙谐。

我也早已爬上了山顶，借着叶的望远镜瞭望友军的阵地：看他们忙着放机关枪，忙着在树丛中放炮，忙着在爬上爬下，转过头来又望着新四军的阵地。很多人已经发动了冲锋，因为冲锋号已经吹了两遍，已经有五、六人爬上友军阵地的山脚，后面有二十多个人紧紧跟着。

又有一队教导队过去了。又是一部分四队的学员。他们对我都十分熟悉。一位学员红光满面，十分兴奋地招呼我：“喂，钱同志，你看，我们是带了教你教给我们的辩证法上火线的啊！”原来我在他们队上曾经教过新哲学的。当时我被他们激动得几乎流泪了。

战斗在进行着。战斗快要结束了。友军大部已退却。这边的部队开始进入友军的阵地去。

饭，从山脚下挑上来，大家吃了一个饱，现在我们是什么辣的苦的酸的都要吃了。饭，米甘如饴。

迷失了道路

高坦战斗到下午已完全结束。新四军各部就继续向前进发，预计在大康王附近或能找到一条间道，容许部队通过。但当时友军之封锁已如铁箍，其实已再不容存此幻想。

晚八时许又开始行动，预定爬过东流山，向大康王进发。是一月九日事也。其时，部队已相当分散。我们参加司令部的行列，背后是各机关和一部分队伍。初行时，微有月光，行时不太困难，此次所爬山径，均未翻过岭顶，盖东流山之岭顶太高了（比丕岭还高，确苦死了教导队，详见下文）。行十余里，作小休息。其时忽有人来报告，谓“捉获一人，在路旁鬼头鬼脑，探问路由，其人谅系奸细，惟彼称认识你，且可由你担保，他是教导队学员。”我即请那人过来，视之乃新自重庆来之全民社通讯员王君也。他确由我介绍到教导队学习。我即问王君，何以孤伶伶在此问长问短，他答道：“奉命侦察这一带路线，因第三、四队亦想在此设法通过。”我遂叫人释放他，并温言安慰之。王君乃去。真苦正惨！他那等文弱书生，怎当得起那般惊骇！

当晚，月色昏黑，山径狭小。一声起行，各个上马的上马，步行的步行。乃人马杂沓，不辨路径，故

我们和任光先生等一千人马，便与叶军长等失散，而参谋处人员也一时不知去向。我们仍策马前进。其时夜色更加昏黑，去路完全无法辨认。转过山头，忽到一山村，约有十几家人家。我回头看看，我们这一批，总共只剩下了任光先生等五、六人，前后均已失却联系。那时心里稍有些恐慌，因路径完全不知，我仍领着众人向前走去。我见上山处有一小径可通，乃加上一鞭，策马向上爬去，爬了一程，人迹全无，而左右山头，都各个挂着一盏明灯，盖友军之瞭望灯也。这时我们不免着急。正走之间见前面山径已没于榛莽之中，再不见有人行路，实在此地并非正路，仅系打柴人之方便小径，前面却不能通行。我们乃策马回头走去，刚才回到山村，见有新四军战士二、三人，我即告以我的姓名，要他告诉我们司令部人员究已往那里走了。他们也都不知道，仅云村上有三团办事处，可往讯问，我就叫他们领我前往，因见三团政治部某君，他告我以去路。我们遂照他所说方向前往。谁知走来走去，老是绕着这个村庄，并无向前去处。再想回转来寻他，而该人已不见。我又没法去找三团其他人员。那时天色太黑，我乃下马步行，而任光夫妇仍骑马跟在我后面来。前面忽有一池塘，我们全不知道，正向前走去，我第一个失足，“扑通”一声跌入池塘，而任光夫人在后赶得急，她来不及勒住那马，也竟连

人带马跌入池内。幸喜池水并不深，乃赶紧爬起，全身浸湿，冷得入骨，而当时既不容你换衣，亦无衣可换也。就不管一切，去找三团人员，再四找寻，并无着落。那时后续部队源源来到，政治部夏征农先生、李子芳先生（他已勉强不坐担架，骑马走了）、黄诚先生、林植夫先生及印刷所黄源先生等都碰在一起。他们也全不知道去路。遂会同一道，拣着一条向下走的路走了。走了一程，赶上了前面一些部队，但序列已乱，司令部人员都没有看到。

到得一处，前面传令来，非战斗人员全部停着，快催某团某营跑步上去。我们就在路旁等候。前面枪声又作，战斗已经激烈进行。移时，某团、某营全副武装开上前去。再等了一时，枪声转稀，我们又向前走，但政治部诸先生已不在近边。我和任光先生等五、六人，就夹在队伍里行进。

当时月亮已经西沉，夜色完全漆黑，我这近视眼虽经这几天的锻炼，目光稍有进步，但毕竟尚少办法。只能叫卫士拖一步走一步。此时走的是下坡路。走到一处，完全是低洼之地，漆黑黑，阴森森，时常要走过小涧，下坡时并无路可走，只能随身滑下去，因天色太黑，又不知滑到哪里去。这时我想到但丁所著《神曲》中描写的地狱境况，而此时的苦境真有过之，无不及也。我拖着我的卫士走，他也累得要命，也看不

见，口里只是叫苦。

如此走了约莫一个多钟头，从附近村庄上已经传来头遍鸡啼，这时大家心里有些着慌，因天明以前，必须走脱这边的陷阱。过了这条“地狱路”，前面忽传来消息：向前已不知去路，路标也找不到，这才使大家急坏了。不多时，前头奔来一人，要找负责人设法找路冲出。他听到我的声音，就坚请我出来主持，率领全队前进。这才叫做：“问道于盲”，找错了人！我自己暗笑：如若叫我讲几句话，写几篇文章，还可以凑合凑合。现在叫我带领队伍，摸陌生路，要说我是外行，还算是万分客气。但其时事情已十分危急，村上又传来第二遍鸡啼，我想我不出来，便大家没有办法。我就带了我的卫士，叫教导队张君，紧跟着我，权充我的参谋；再将这队伍里所有带武装的人约三，四十人，全部齐集起来，跟在我背后。我立即站到队伍头上去，执行临时指挥职权。当时所有武装中居然有一根小钢炮和一挺机关枪，驳壳枪有十多支，步枪有二十多支。我当时拿定主意，如真冲不出，便往两边山上去躲着，再行设法脱出重围。我立即派我的卫士和另外一战士分两路向前去侦察，自己在叉路口等候，忽然听到右边山坡上有“嘘！嘘！”哨唿声，我料定是新四军队伍，大喜，就叫人打回哨，并往前迎接。回来的报告说，那里有五个人是教导队五队的，

因迷失道路，要找大队伍。我一面失望，一面就叫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后来，我的卫士回来报告侦察的结果：他问到老百姓，说一两点钟前，此处大路有大队伍过去，但不知是新四军还是别的军队。我根据当时情况判断，必是新四军无疑。遂决定向左边路上走去，走了二、三里路，忽然有一人持枪走过来，我们叫他“站住”，认为是友军步哨。他就叫“你们是不是某团？”我听他口音熟，知道是参谋处人员。上前问时，果然是参谋处派来的。我就叫他领我们前去。我问他司令部人员是否在此？他说：“是的。”我问：“叶军长在吗？”他答“不知道。”

于是，我们就安全到达这坑里的村子里。首先我就找到了冯参谋，其后又找到了李科长。我把所带队伍二百多人交给了他们，顿时觉得身上轻松了许多。同时觉得指挥员的艺术是满够味的。到村子后，却不见任光先生夫妇到来。我四处派人寻问，原来他又告失散，走到一家老百姓家里去躲藏去了。我们再派人去接，他们才回来。

弹 尽 援 绝

这时新四军大部人马已被冲散。那天晚上（九日晚）有些部队如教导总队等和友军打了个通夜。其他部队除指定从另一路冲出者外，沿路已均散失。现在，

教导总队还在东流山上支持着。到坑里来的都是些零星的武装，他们饥渴劳顿，一到就躺在地上睡觉。即如我的卫士何洪元，他也累得倒在桥板上睡着了，尽管我催他去找任光，他哪里动弹得，天却慢慢亮起来了。

这是一月十日的清早。这坑便是石井坑，这坑该是永远不会被人忘掉，永远受人诅咒的陷坑了吧，新四军的主力，就全部在这坑里被共同抗战的友军歼灭的。

我瞌睡了半点钟，即设法找叶军长。先叫人领到一草棚内，只见叶在用望远镜从草棚顶上的破漏处，远望对面山上的阵地。他也刚才休息了起来。他刚来时，周围全无部队，他要找些战士在他卧房周围守卫，遍找不得，后来见路上陆续来了些零星队伍，即传令叫他们站岗，谁知他们一站在那里，就倒地睡觉。这时真个已经弹尽援绝，无法可想。等我们从那草棚回到他的住处，对面山上已闻得枪声。据报，后面山坡之一角也已由友军占领。如此四面被围，友军又一刻刻迫近。身旁全无武装力量，真个奈何奈何！叶军长便叫大家准备便装，设法分别走脱。其时对面山上的枪声越来越紧，副官都催我们到后面山坡上去稍躲。但后面山坡上也已经有了友军，而且已在开枪。这时叶军长就一个人走近窗口，望见后边坡上有两个自己的

战士横躺着鼾睡，不禁悲从中来，沧然泪下。他取出手帕，揩了眼泪，回到桌旁，便手草一电稿，交秘书处拍到延安毛泽东先生请其转发给蒋委员长（当时与重庆无从直接通电）。大意为：“职遵命北移，到茂林地区即遭友军四面包围，其后即到处遭遇袭击。今四面被围，弹尽援绝。如委座以为新四军仍系抗战部队，而职仍系抗战军人，则恳立即命令各友军解围。如获成全，职当立即来渝请罪，虽死不辞。临电惶恐，伏维钧裁。职叶挺。”同时草一电，亦托延安设法转澳门致其夫人，略称此际被围，生命大致不保。唯如此牺牲，殊出意料。末后，嘱其夫人善事教养子女，令其继承父志云云。他一面起稿，一面啜泣。我们也都啜泣。叶并叫我亦致电香港，托付后事。此时境象可说惨绝。其时，我们都劝叶不必如此悲伤，我尤恳其积极起来，终有办法打开出路。适某参谋来报，五团人马已到。大家就兴奋起来。当即决定召集军政治部及教导总队政治处人员，动员石井坑全村民众，令其为我们煮饭煮水，并买大宗猪肉、牛肉，慰劳全体将士。叶军长传令后，各部分人员就紧张动员。其时各机关散失人员及各部队，均源源汇集石井坑，如三团、一团、特务团等，真如众流汇注，惟均疲累。叶军长乃草发一告全体指战员书，说明革命战士之职责，并鼓励其勇气，最后并称尽一月十日尽量休息，恢复

疲劳，整顿所部，准备作最后之牺牲。当时全军战士除疲劳外，士气原来仍旺，经此一番鼓励，再加政工人员之工作，士气乃益旺盛。叶军长决定在此处坚持一星期，如能完成此项任务，则大局可定。当时全体将士均具此决心。为筹集粮秣计，特设一粮食委员会，由军需处副处长张元培主其事，该委员会约同政治部人员调查各处粮食储量，向各户说明向其购粮之缘由。当地民众，虽然因粮食已被友军拿去大半，但均愿罄其所有以出售，有几户人家且坚决不肯收钱，说“愿意送给新四军吃。”各户所有大猪、老猪、小猪，都自动交给粮食委员会，再由该会分发给犒劳三军。

新的部署

一月十日上午，项副军长、周副参谋长、袁政治部主任、李一氓先生等，亦均分别前来汇集，军心尤为振奋。当即由叶军长召开高级指挥员会议，首由叶说明当前处境，及其所定坚持作战之决心。大家表示同意。继即将各汇集部队重行编制为四个团队，并以一部分为总预备队。会议毕，各指挥人员即分返防地，部署一切。其时延安方面亦来电慰问，并称如能采取游击战当能保持大部力量，继续抗战云。

军政治部方面，各部工作人员完全分配到各作战

部队去工作，教导总队政治处人员亦然。参谋处人员亦重加调整。当时粮食问题最关重要，故新成立之粮食委员会工作特别紧张，任光先生夫妇亦自动要求临时参加该项工作。

在这样紧张的时候，新四军并未忘却其优待俘虏的工作。在作战中，友军被俘者二、三十人，亦已到达石井坑。政治部宣教部特派员前往招待，并特别为之排一短剧曰：《重见光明》。描写一友军战士当兵及弃暗投明的经过。友军战士看了，均痛哭失声。

总攻击——总歼灭

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全体指战员总算休息两天。不但吃到饭，而且吃到了肉和鸡。疲劳已恢复了大部分。十二日清晨，各部队就准备友军开始总攻。拂晓时，竟不见动静。有人估计友军也许不用硬攻，但用坐困，令新四军活活饿死。叶军长估计对方必将硬软兼施。

晨十时许，我们都在参谋处，炮声突起，知攻击已经开始。果然，四面八方的枪声、机枪声就十分紧密起来。山炮屡向坑内打来。幸喜司令部已于十一日晚搬家。一个炮弹适打中原来军长所住地方，房屋尽倒。

我们在参谋处空场上瞭望各个山头之阵地，战斗

异常激烈。那几天我们已习惯于战争，故炮声、枪声已完全不放在心上。我们所站处所，只有大炮可以威胁，却在机枪、步枪射程以外。

十一时许，远远听见东流山山顶冲杀声，用望远镜望去，见顶上的人有骚动状。不多时，即有人来报：东流山顶阵地已被友军抢去，教导总队工兵连坚守在彼，惟对方火力太猛，故暂撤退，请即派队赴援。军长即令参谋长电话指挥应援部队前往，宁死勿退。参谋长不断在电话上指挥各部应战。下午二时许，西首岭上之机枪声突然转紧，盖友军以十倍于新四军之兵力，向这边压来，火力之猛，为彼等参加抗战所未见。移时，机枪、流弹纷纷向参谋处所在地飞来，我们遂走到室内去。该山头之新四军阵地亦经友军夺去，一部分队伍已在后撤。参谋长又立即用电话命令另一预备队出击，务须堵住友军，令其不能再行前进。但当时各线状况，除北线一隅阵地较稳外，其余均极危急。而西线炮弹、机枪弹已纷纷飞到指挥所跟前，故叶军长命令：即将指挥所移到背后小山坡上。

我们都在十分紧张和危急之中，跑上了那山坡。因流弹极多，所以只能伏在地上，不能站起，更不能多动。山坡上架起电话，周副参谋长复用电话沉着指挥。当时各线增援部队，均已赶上火线，故东流山及西线亦渐趋稳定。大家的心才比较放宽一些。

四时许，叶军长复命三团调来两连，加上另外少数部队，作为临时总预备队。其时友军方面炮声又大作，知是总攻击业已开始，各线所用火力较前尤猛。大炮频频将坑内房屋打毁。向指挥所飞来之流弹，重复密集起来。当时估计，如此项攻势能抵抗到天黑，则对方必再而衰，三而竭。故叶军长命令各线战士，不得退却。并命参谋两人率少数卫士等候在坑内路口，如遇不奉命令而后退的部队，即押上前去，不从，即行军法从事。实际上此时各线新四军部队除奉命移动，调赴他线作战者外，绝无退却者。

将晚，教导总队所守的东流山，因死伤过大，加之对方火力压迫十分厉害，故第一峰、第二峰、第三峰相继失守。此时万分严重，因该阵地为全线最重要之一环，如被突破，则金瓯全坏，不可收拾。叶等得报，当即一面勉强从其他线上抽些部队前往增援（可怜实在已抽不出了!!）；一面严令教导总队重新冲上山头，收复已失各山头。各位须知，教导总队乃干部受训机关，其学员成分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如此千仞高山，坚守这些时候，已经超过预想，今欲令其重新夺回阵地，实在千难万难。适当其时，教导总队的指挥员余主任（政治处主任，在此次行军中，教导总队军事、政治全由彼负责）来到指挥所，报告东流山作战情况，并请示。叶军长乃告以必须坚守，付任何代

价在所不惜。当时约定如抢得一山头，即在该处举一烽火，以为信号。余主任奉命，即赶上山脚，督率教导总队残部向上冲杀。友军机关枪集中射击，一次冲杀，一次死伤。教导总队各队长、各指挥员均身先学员，踏着尸体，向前冲去。不多时，我们在指挥所上，果见底下第三个山头已点起烽火，知己为教导总队收复，大家即在指挥所欢呼。再半小时，第二个山头又点起烽火来，知第二个山头又被收复。这时大家的兴奋、安慰和钦敬之情，真无从表达。而到最后，最高的第三个山头也竟点起烽火来了。呀！教导总队的英雄们！你们崇高的血和神圣的祭礼果能保得全体的安全吗？第三个山头也竟被你们收复了！

指挥所上充满着天真的快乐与安全之感。毁灭之神好象已经把他的魔手从我们的头上轻轻抹过去。战士们的牺牲似乎已经最后获得他们的代价。我们陶醉在虔诚的欢呼里。

叶军长命令秘书处在山下架起电台来，试收一收重庆和延安的电报。他也许想，这几天来（特别是这一天）新四军所流的无辜的血，可以邀得重庆的“宽恕”了。

刹时间，东流山左边的山坡上熊熊的火烧起来了，这是友军放的火。这火遍山的蔓延开去，这是他们已经夺得那个山坡的记号。不久从那山头上就飞来了密

集的流弹。新四军在那山头的阵地被突破了。这将使东流山的教导总队切断归路。于是参谋长立即命教导总队分一部力量去抢回那个已经失掉的较低的山头。可怜教导总队人员那时已所剩无几，它哪里再有力量分到那边去？但命令下去了，教导总队的确是分了一部分人去抢那个山头了。正在这时，指挥所左边的山头又已经起火，那里的阵地也经友军突破了。参谋长立即命令卫士连去接应堵住。

在这同时，指挥所背后山上也发现了大火。这是三团所守的阵地。阵地虽未突破，但已万分危急。

东流山抽去了兵力。第一个山头的烽火渐渐熄灭了。这熄灭是可诅咒的。跟着就是机枪声下坡来。不久，第二个山头的烽火也渐渐熄灭了。这些山头又重新被友军占领了。

流弹的声音已经再不作“嘘嘘！”声，它们大部分都“切！切！”地叫着。从前面及右边山坡上来的子弹，已经构成密集的火网。已经不再是流弹了。指挥所已经成了集中射击的目标。

叶军长还是象钢人一样站在山坡上。子弹肆无忌惮的从他耳朵边、头顶上飞过去，但他还象钢铁制成一样的站在坡顶上。他决心坚持到最后，坚持到全部牺牲为止。

几个高级干部最后向他建议：局势已经不可挽回，

能保持一分力量还得保住。

他静默了约莫有两分钟。他镇定地转过身子向四周山上望了一望，回过头来肯定地简短地讲：“我同意你们意见。”接着他指着周副参谋长说：“你照这个意图立即定出方案来！”

任光先生挂了彩

最后的方案，也是唯一可能的方案，就是分别穿过封锁线，觅得安全。

叶军长同意了 this 决心，立即下命令部队分别撤退，设法冲出，干部分别穿出封锁。

说时迟，那时快，友军的先头部队已经从对面的山坡冲下来了，有少数已经进了石井坑的村庄。于是我们开始分散向坡下走去。正将走时，忽然有人奔来报告：“任光先生挂彩。”我问其详情，则称：“他和他的夫人原来伏在坡上，当大家看到前边子弹飞来过密，退到坡后的时候，他们没有来得及动，任先生的腰部就中了一颗子弹，现在他夫人陪着他，他们都不能动，他只叫着叶军长和钱同志搭救他。他叫痛。他……”

“怎么办？”我问叶军长。

“……”叶军长摇着头。

“我去看他们。”我挽着我的卫士就想走过去。

“那不行！”大家把我拉住，而且挽着我向坡下走去了。

“难道我能丢着他……”我边走边叫。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担架又没有！伙子更没有！

这样，任光先生的肉体一定被自己的同胞践踏了。他一定牺牲了。这新的一代的大音乐家一定死了！我们未来的马耶科夫斯基一定死了（我称为未来，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一年和两年内一定能成为中国的马耶科夫斯基）！我们人民的和战士的歌手一定是死了。

我记得，他在法国曾热烈地参加了罗曼罗兰所主持的反帝同盟的工作。他说，罗曼罗兰的路，就是全世界一切革命艺术家的路。

我记得，他在巴黎时曾经为了替祖国募款，为了祖国的光荣和自由宣传，主持和帮助过多少次规模盛大的演奏会！

我知道，他在国外，曾经和罗曼罗兰，和法国、奥国、捷克不少进步的艺术家长共同努力，为建立全世界的新艺术而艰苦奋斗。而且，他专心致志于中国民歌的改造，来填满中国在世界音乐地位上的空白的一页。他私淑着苏联的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П.И.Чайковский），他说，在世界上，他是自己最钦佩的同志。

我知道，他在上海曾经多么热诚地帮助了中国新音乐家的开山祖——聂耳先生以及别的前进的音乐

家。

我们知道，他曾经用全副的力量，运用唱片来提倡和普及中国的新音乐。他到了新加坡，又用最大的力量把国内的抗战歌曲灌成大批的唱片。集合好几百个青年，培养他们成为中国的新音乐运动的干部。

我们知道，他在十分钟内就决定从重庆跑到皖南，踏进了新四军。他的耳朵永远靠住战士们和民众们的胸口，他向他们学习，向他们摄取生命的力量。他永远以为把他的名字和战士跟老百姓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无尚的光荣。他把战士和民众的力量看作自己的力量。他认为在战士面前用“你们”的称呼为可耻。他要使他每首新歌的音节配合着战士们的呼吸。他痛恨中国的靡靡之音，同时又诅咒一味模仿西洋的教堂音乐，那庙堂之音。

他永远惊叹着组织的力量。他把集体的意志看作最高的意志，他认为脱离了集体，就没有生命，就没有爱。

他把音乐看成他的生命。而生命，在他看来也就是音乐。集体的、劳动的、战斗的生命，在他看来，就是新音乐的泉源。

他诅咒着腐朽的生活和垂死的气息。

马耶科夫斯基唱着：

“这里有好的
生活，
生活在这里是好的，
在创造的
艰难
和冒险中。”（见马氏“好啊！”之歌）

这就是他最近半年来心里的写照。
马耶科夫斯基唱着：

“深入工作
深入战斗
我们挺进，
而我的歌
就是我们的
凯旋门。”（同上）

这就是他最近半年来工作的信条。
而现在这样一位新中国的大歌手，被中国人自己
践在脚底下牺牲了。

无可补偿的损失

在这可诅咒的石井坑里，中国人民的损失，或者
说世界新人类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任光先生仅是中

间的一个而已。

当十一日下午战斗最激烈时，三支队突派人来报，支队司令张正坤为友军迫击炮弹片所伤，伤势极重。大家听了，有如晴天起了霹雳，但有什么办法呢？担架是没有的，伙子也是没有的。这样一员高级指挥人员负了伤，这时也全无办法。不一刻，消息传来，张司令伤重殒命了！呜呼！张司令在皖中沿江一带，老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即便是敌人，听到“张正坤”三字，也胆战心惊。现在却又死在同胞的手里了。

你们请想起，那位“创造社”的老将，中国有名的社会科学家朱镜我先生吧。他的胃病这样重，此次行军，吐血之症复发。他在九日清晨被抬到石井坑时，我已先他而到。当时他托人告诉我，他已安然来到，我便去看他。他瘦的不象样了。但当我硬着心肠告诉他：“叶军长说，局势十分困难，所以希望你能设法化装躲到农民家里。”那时候，他只点了点头，眼睛闭起来，眼圈却红了一阵。我劝他，现在大家正想挽回，请他不必担心。他只说了一句：“我们最后终是会成功的。”说着眼睛又闭起来了。

第二天我又去看他，他能吃些鸡汁，稍微有些精神了，便问起各项工作。我们劝他不必操心，有事我们在办。

十二日战斗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担架也抬到山脚下。但当时的情形是那样危急，大家分散时又是那样仓促，而后来分散要爬的山又是那样陡峭，他的担架是无论如何没有可能抬上去的。但友军却在后面赶上了，他的担架也就落在友军手里。而我们那样严肃的革命家，造诣极深的理论家朱镜我先生，我想一定也就在自己同胞的手里牺牲了。

总之，在十二日战斗中壮烈牺牲者，至少在二、三千人以上。如五团在与友军第十师的战斗中牺牲逾半。三团一营在星潭附近遭友军之袭击，伤亡殆尽。教导总队工兵连攻东流山时仅剩八十余人，而犹奋勇自卫，结果在友军密集机枪火力下所剩无几，连长及指导员均牺牲。教导总队的炮兵连，在东流山战斗中亦几乎全部伤亡。干部队及第三、四两个政治队，亦在东流山争夺战中，大部献出了生命。

至于工作人员及家属之被打死，而翻山时跌死者，为数极多。

这浩大的损失，我们相信是中华民族无可补救的损失。这些牺牲者均为民族的精英，人类的鲜血。我们除掉乐观的认为：新中国必须建筑在这样贵重的血肉基础之上而外，这种损失我们难道一定要肯定其为合法的吗？

第六节 脱 险

分 散 脱 险

分别冲出，分散脱险之决心既经下定，当时就立刻执行。最初，叶军长和我等为一批，由右边间道上山。项副军长、袁国平先生等为另一批，向后面山上去，预备与三团会合。迨爬上右边山头，见五团战士尚有数百人在此休息，而岭之那一边，即为友军阵地。五团战士之疲惫已不堪言状。我们当时爬山已全不走大路，只走小路，到必要时，便从石壁上翻过去，从丛中钻过去，为避友军耳目也。

翻过一个山头后，其时各部散失人员多来集中。理智的规律决定我们应分散，因为在彼时情况下，唯分散才有脱出包围圈之可能。集合便会成批的被人消灭。但新四军这光荣的旗帜及其伟大的同志爱，自然而然会其粘结一起，难分难散。在一个山头上休息时，我们和项、袁及周副参谋长、李一氓先生，及政治部夏征农先生、黄诚先生等，忽然又都会合在一起了。相见之下，不胜高兴。但同时都在担心，如此庞大之集体恐难穿过友军之铁箍。

这时跟在后面的工作人员和战士，大概还有千余人。而教导总队、三团、一团等剩余部队还在杀出一

条血路，故机枪声及步枪声彻夜未绝。

队伍前面由两个地方民运工作干部为响导。其时月色迷朦，走路还看得见，但当时所走者尽是羊肠小径，而多半是无路可走的地方。我们只在阴森森的丛树中乱钻。有时攀着一枝树条或一根葛藤要吊下二、三丈深的地方，从石壁上滑下去。等到滑到着脚处时，又赶快要拉到另一支条和葛藤，吊下第二次。而最可怕者，即吊下去时，面前尽是漆黑的树木，从何处去找前面的人，那真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时最苦的，又是我们这些近视眼。爬时，我总叫我的卫士走在前面，紧跟着前面的那一位，再向后面叫我，然后我接着跟上去。这样捉迷藏式的爬上爬下，爬了大半夜。因为精神上自有把握所以也不觉得苦。前后的朋友还笑着说：我们真变成“人猿泰山”了。于是我便喜吟打油诗一首，公诸同行者：

“山石嶙峋苦难行，
攀藤附葛学猩猩，
人猿泰山不如我，
留得此生改日拚。”

作此诗时，因聊以遣情，亦所以大家勉励勉励也。而其时所苦者，倒是肚子饿得不堪。盖十一日，自早

上吃一餐早饭后一直到下半夜，尚未有东西下过肚子。但这个问题可说绝无办法解决，原因是大家没有带干粮，或者说，大家没有干粮可带。

十二日晨五时许，月光全无，周围墨黑，真所谓伸手不见五指头。而其时所钻草径，曲折特多，我一个人已失踪两次，幸被我的卫士寻着接上前进的部队。但忽经一个转折，我的卫士也和前边失了联络，找来找去，找不见人，而后面的联络也失掉了。在半山乱树林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这时心里有些着急，还四处寻人，总算找到了参谋处的李科长，他带领着教导总队的两个女学员（妇女劳动服务团的团员）和两个战士，躲在树丛中。我就决定跟他们在一起，过后再作计较。

这样，我就和叶军长、项副军长、袁国平先生等分手了。我们躲在一棵树下，打开毯子来睡觉。天明时，树林中瑟瑟缩缩声甚大，且有谈话声，疑是友军在搜山，遂换过地方去躲。巧中逢遇到了周副参谋长和李一氓先生、军需处张元培先生等，遂齐集在一起，也颇热闹。惟白天坐在林里，绝不能走动，因对面山上就是友军阵地，并且向这一边侦察得极为认真。

歼灭——一不做，二不休

一月十三日，我们藏在半山丛林中。枪声整天价

响。有几次左边的山坡上的机枪声还发得非常狠。我们知道这是新四军教导总队和三团还有一部分余力要想从这里通过，又遭遇了友军的攻击。坑口就是大康王，这一带的友军是第一〇八师。他们把守住坑的双口，大康王村上驻着兵，坑内的小村上也驻着兵。这样使你躲在山上的人，既不能冲出去，又不敢下来找老百姓。他们知道新四军如鱼，老百姓如水，鱼得了水便要活起来的。

英勇的教导总队和三团的战士们还在友军猛烈的火力下，流着他们的鲜血，掷着他们的头颅。据我后来所知，那一天新四军的牺牲又非常惨重，而且牺牲在友军的小圈套里。当天，当双方战斗稍弛时，第一〇八师即派一副营长和一位排长率少数徒手队伍来招呼新四军，态度表现得非常诚恳，非常殷勤。他们说：

“我们本不愿打新四军。现在战局既已决定，我们还是和好如初，再不要打下去了。现今我师长特地派我们来接洽，请你们推负责代表到我们师长那里去接头，一切问题自然解决。”这时新四军方面的人听了，初时还有些犹疑不决，后来考虑到：现在只要共同抗日，别的什么都可以不问，新四军移动，原来也是遵命到敌后去抗日，如果友军方面能够和平让我们通过，那当然求之不得。所以立即决定推派了两个人为代表跟着他们去见第一〇八师的师长；而新四军的部队就被

领到山傍的小河边上。谁知不到一小时，小河边上的菜园地上却布置好了十几挺重机关枪，就开始向站在河边的新四军部队密集射击。新四军知道是中了奸计，也就奋勇冲上，有一部分就散到右边山上去。这次的伤亡又很惨重。

到下午五时许，散在右边山上去的新四军又集合起来企图第二次冲出。友军对之，不仅开枪，而且还开炮，这边的战士还是奋不顾身，向前冲杀，在友军密集火力下，小河边满是含恨牺牲的尸体。

英雄和健儿们是成千成百地在死去。坐在东京和南京等地的敌人在哈哈地笑。难道只有“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勾当，今天才能代表现代中国的法律哲学？

死的成千成百的躺在河边、躺在沟傍、躺在山石下、躺在草堆里。他们恬静的躺着，鲜血涂满他们僵白而光荣的脸。历史为他们祷告：“安静地躺着吧，你们已经光荣地完成你的任务了。”

活着的还十个八个，或者三三两两，躺在山上密林里。他们无时无刻不准备去接上死的同志的行列。活着在那时似乎是一种羞耻，至少，是个无比的累赘。

但历史又命令这些活着的人们：“苦苦地活下去吧，苦苦地挣着活下去了。新的时代是生，不是死，死是为着生而死的。你们，你们这些人类的苦工呀，

就那么活下去吧。”

……

于是，这些人就千方百计地挣着要活下了，挣着要脱险了。

穿过第一重封锁线

十三日暮色苍茫中，我们这一批二十多人（内有周副参谋长、李一氓先生等）就潜行下山。及晚，月色正好，我们沿山脚溪边向前走。路上，自然先就溪边痛饮一番，不在话下。这时肚子已两天没有吃得东西，饮些溪水，不但解渴，权可充饥。大自然似乎总比人类少残酷些。

到得一个处所，遇见一部分新四军部队，即日间经友军扫除冲散至此者。不久，教导总队余主任亦来，大喜，参谋长嘱与同行，但其部队及工作人员须分散。余主任遂向彼等指示今后分别脱险之任务与方针，谆谆叮嘱他们务须小心，动摇乃破灭之代名词，并每人分给他们一点钱，作为沿途川资。其干部依依不忍相别，经再三催促，遂挥泪踉跄而去。其时与我们分开者，有教导总队政治处及训练处工作人员多人。其后得知彼等均于途中被俘虏矣。

我们决定于月光中穿过友军之封锁线。两旁山头上均设有机枪阵地，时发枪扫射，其射击瞄准点为一

条毫无荫蔽之山岗。我们通过时又须经过这条山岗，别无他路可循。未到该岗时，我们先将队伍疏开，然后匍匐疾驰而过。有几位通过时，被友军发现，遭遇扫射，幸未受伤。事前闻项副军长等亦在此通过，中间有人受重伤，未知其为何也。

这样的封锁线，当晚半夜我们通过三次，遂爬上山头。所走的路是一条石子涧道，没有水，但滑得很。顶大的问题，是我们踏住石块爬上去时，石块滚动，声响极大，这声响曾几次唤起两旁山头上机枪阵地内友军之注意，故一发生大声响，山头就“朵朵！朵朵！”射击一阵。其时我们的胆子已经吓大了，已经不再惊怕，只管向上爬去。如此走石径、钻树林、攀藤葛、拉树枝，翻了三、四个山头。既饿且渴，又不能不向上爬，不得不向前拖，困惫得真要命了。

天明时，我们已爬过狮子山，蹲在半山茅草里看动静。四周山上还都是友军阵地。前面山头上友军的巡哨，了然在望。左边山上又不断响着枪声。不多久，这枪声越来越密，且杂以炮声、机枪声，知道新四军还有一部分在那里挣扎，但究属哪一部分，已不得而知。枪声渐渐逼近，估计或已经发现我们所藏的山头的目标。时已傍晚，遂决定移动，此时最大问题为如何分散为细小单位，千万不能保持这样庞大的行列，继续前进。因为当时我们这里又象雪球一般，越滚

越大，齐集了二、三百人了。这是一月十四日的事情。

不 断 分 散

是晚，参谋处李志高科长自率一部分人去了。且说我们这一起人，就翻上另一山头，坡旁有溪水滴沥声，众人狂喜，就分批去盛水，喝了一个痛快。但肚饿问题仍无丝毫办法解决。原来离茂林时，有些人身上还带着生米，后来，这些生米大部已给煮饭用光，另外的也在路上嚼着吃光了。我也曾嚼到两把生米，味甘而美，能充饥，且较有持久性。记得我在饿到第二天时，因为嚼到这两把米，精神好过平常。现在呢，则全无办法。

这已是十五日的上午。我们躺在密林里，看对面山上倒极清楚。友军已开始山上、山下搜山。他们看到新四军散兵，便一面开枪，一面高声叫喊：“下来、下来！下来都没事情，不下来，开枪打死你们。”这样，一幕幕惨剧又在我们眼前演出。举例言之：我们为要分散，军部秘书处工作人员多人，当天就由章君率领，分别走开找出路。他们就找到对面山上，去寻一条涧道穿出去。当他们下了我们这边的山，爬上对面的山上去时，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当时东边山脚上已经发现枪声，及“下来！下来！”的大叫声。这是

友军在搜索另一部分的新四军。我们真为那几个爬上对面山上去的朋友捏几把汗。正在这时，对面山脚下突然枪声起了，接着我们就看到四、五个友军战士赶上山去，口里叫“下来，下来！红军，下来！”“砰！”“砰！”“砰！”“我们一同打日本，你们不要怕，下来，快下来！”还是粗暴的叫，还是枪声。

这几个新四军人员，三个是拚着命飞奔上山去了，还有两个，身体不很健康，既饿又渴，累得爬不动了，再加上后面友军追上来，就站住不动。稍后就听见他们叫：“我们是要抗日的，你们抗日，我们就跟你们走。”友军就在下面高声回答：“我们是抗日的呀，快下来，快下来，你们的生命全无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他们两个就下山来了。友军就把他们的身上全都搜了一搜，把些东西拿了下來。不久，只听得“砰！”“砰！”两声枪响，这两个新四军的人员就倒在地上了。他们就合法地倒在地上死去了。

我就回想起在高坦，新四军欢迎友军俘虏的情形。我又回想起在石井坑那样危急的情况中，新四军演戏给俘虏看的情景。那么亲切！那么热爱！那么体贴！那么同情！但阿拉不妨开导开导阿依：世界上所有这些字眼——类似“亲切”、“热爱”、“体贴”、“同情”等等字眼，都不能包括在法律字典以内的，你竟知道吗？瘟生！

死的门敞开着

那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死的可能太多了，计有：饿死、渴死、冻死、打死、累死、跌死等六、七种之多。但有一种可能是没有的，即灵魂之死亡是也。这也就大可以告慰于全中国的同胞和全世界的朋友们了。

饿，我们实在受不住了。从一月十二日那天吃了一顿早饭以后，直到十五日晚上，一点东西都没有吃到过。皖南的山也真怪，你要找些可吃的草也是没办法，加上是冬天，绿色的树叶除松叶等针叶外，便什么都没有。我曾试吃过一种树叶，但因叶背及叶线的毛太多太长，就无法咽下肚去。伯夷、叔齐吃过的薇和蕨，我们没有福分找得到，毕竟夷、齐生在上古时代，多少还剩一些羲皇之风，现代世界的自然界也极显得斤斤较量了。我们当时饿死的威胁的确很多。人，我看你，你看我，都瘦黑的不象人了。但是骨头却没有软下来。有当时我的打油诗为证：

“荒山乱石怎依凭？
采蕨采薇何处寻？
敢效夷齐古圣贤，
首阳饿死亦成仁！”

.....

渴，实在比饿还要难过。这是我此次的新发现。一面爬山，一面持久的渴，会使你的舌头完全粘住，起着“人生乏味”之感，所以顶苦，顶危险。友军的封锁非常周到，每个坑的溪边小村，都有兵守着，因此我们躲在半山腰里，尽管听得到山脚甜美的溪水声，但此只能增加你渴的痛苦，因为我们决不能下去。当时，我每天唯一的解渴时间只有早上。那时山上的树叶上面多少有些露水，我就摘几片树叶，每一片放到舌头上横拖一拖，吮到一点露水，那真是甘露。王守仁祭鬼，叫他们：“餐风饮露，无尔饥矣。”这真是太浪费。十五日深夜，我们翻过第三个山头，实在困倦到爬不动了，要想在山顶荫蔽处休息一下。谁知天不作美，下起大雨来了。大家淋得满身通湿，格格发抖。但世间事情总不能单看一面，有好必有坏，有坏也往往必有好。天下雨会使我们冻死，但另一面却解救了我们渴的问题。我们就发明了一种新的饮具，大家把嘴张开来，让雨水一点点落下嘴里去。如此相当痛快地饮了一阵。

冻死的可能性也很大。我们的衣服都丢掉了。十四日我还穿着呢大衣的，那真是顶幸运的了，许多人都只穿了一套棉衣，几次的雨水都把棉衣淋得绷硬，不暖和了。我也因为跌在水里，淋了雨，衣服也已经不成样子。但毕竟我晚上还有一条毯子，和卫士合起

来睡，还可以一条毯子垫，一条毯子盖。多数人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这几天天气特别冷，幸好我们晚上都在爬山，淌汗还来不及，不会感到冷的，但一到清晨，却必须躺着休息，那时却终是特别冷。尤其是十五晚上下雨那天，大家真冻得要死。后来，我们在十八日夜才真冻得够呢。如若那时不冒险去弄些柴来烤火，那末我们即使不冻死，也要冻得爬不起来的。

在脱险中被打死的危险，除冲过封锁线外，便是当友军搜山时。十六日，我们躲在一个山上，便遭到两次搜山。友军十多个成一群到山上乱寻，而且胡乱开枪。幸好我们藏身的密林，总在没有路可通处，而搜山者总是见路才走的。不过第二次搜山险些被发现，因有几个人受了风寒，患重伤风（我就是），不时咳嗽，当友军搜到离二十多米时，有一位朋友忽然咳出声音来（我们当时咳嗽，都要咳在厚厚的手巾里），急得大家要命。幸而还没有听见，否则也全都休矣。

最危险的一次是十七日那天。当我们和周副参谋长分开，另外转上一个山头去时，我们实在渴得难受。听见坡下有溪水声，就先叫人侦察，说是未见友军，我们就大踏步来到山脚。果然是一条好涧，水清得十分可爱。我们急急牛饮了几杯，看看周围没有动静，而且风暖日和，大有阳春已到江南之概。我们就放开了胆子，在溪边痛痛快快地洗了阵脸，刷了阵牙齿，我

和李一氓先生、余主任等居然还刮了胡子，舒服极了。假如世间是有顶顶舒服的活的话，那末我们在那时可算是顶顶舒服了。树枝上有小鸟在试他的歌喉，在祝福春到人间。溪水快活得跳跃。坡上的树梢在撩拨着和暖的风，逗引着它的微笑。我们从溪边懒洋洋地爬上山坡，在林荫中躺下来，想好好舒服一下。霎时间，“砰！砰！砰！”的枪声从溪的那边打过来。接着便是“下来！下来！”的叫喊声。这真糟糕！友军发现了我们了。我们就爬起身来往上跑。山下的枪声越来越紧，友军在赶上来了。子弹“切！切！”从身边擦过。我们拚命地往上跑。树枝牵住我的衣服，我就顺手把呢大衣脱下来丢掉了。一鼓作气跑到山头上，约莫爬了二十多分钟。山下的枪声绝了，我们就安心坐下来，躺了一阵。谁知对面和左边又起了枪声，我们就钻到茅草里躲着。这时我觉得头和四肢都在发烧，躺下来，几乎不省人事。

没有吃、没有喝，受冷、受惊还要拚命爬山，又都在黑夜爬小路、爬险路，当然把人累得不成样子。周副参谋长、罗副处长和我等下山时已经不能走，早已把身子坐着溜下去，棉裤的背后都擦成了大洞。深夜，当爬上一个非常陡的峭壁时，我的头晕了，接着就呕吐了两次，之后，倒比较清醒了一点，就再死命地往上爬。当时我们爬了十多分钟就必须躺着休息一

阵，而一躺下保证你就睡着。有几次我就因为倒地睡着，几乎和前面的人失去了联络。当时这样的黑夜行军，时常攀援断崖绝壁，身子累了，脚软了，跌死的机会也就很多的。

叶军长自动到一〇八师去接洽

一月十六日晨，我们翻过裘岭，天下雨，就派人到山下去侦察，有无可以觅食处，一面我们在山头淋着雨休息。无何，有人来报山脚有村户四、五家。问其有无友军守住，答曰：“目前尚未发现”。当即嘱其冒险向老百姓买些米及包谷（玉蜀黍）之类烧顿东西吃，再作道理。

不多时天已黎明，我们即顺小道下山。至坑内，先就溪边痛饮涧水，同时见自己的侦察员已在路口相等。问其有无东西可吃，答曰：“有包谷粥”。真是谢天谢地！自十二日晨至今已足足四日夜未吃到东西，现有包谷粥可吃，该是何等美妙。粥桶一经拿出，由李一氓先生分而食之，实在因粥少僧多，每人仅分到半碗，但味极鲜美。吃完后，个个神清气爽，生气勃勃。

其时，忽见教导总队教员袁慕华君亦在，相见恍然，但亦不胜其喜欢。袁君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即与我同事，在汉口时亦曾共同工作，到新四军已两

年多了。彼称，该村中老百姓对新四军均极爱护，仅以友军相迫，不敢从容招待。惟有一王姓老头，为农抗会会员，家中薄有资产，在附近有相当威信，昨夜他即留袁君住在家里，并愿多方帮助。其后，袁君即报告叶军长之消息，其时老百姓已都知叶军长已赴友军中去接洽停止冲突。唯所传有许多神话。袁君就目睹情形，报告如下：

当十三日教导总队及另一部分为一〇八师所骗，遭受两次扫射歼灭时，叶军长都在那里。其后，即退藏于山脚密林中，即命其副官持个人名片去到一〇八师阵地，谓“我自去看他的师长，我认识他的”。不久，一〇八师即派人跟着叶军长所派副官来接，他就带了几个卫士去了。此后的事就不得而知。关于叶军长所谓“就地被擒”之事实，当时所知仅如此。

十六日晚，我们复启行。副参谋长周子昆因过度疲惫、病，不能走动，遂与袁君同留王姓老百姓家，过后再设法冲出。我们翻了一夜山，天明时即到上面所说的地方痛快休息一番，正舒服时，即遇友军追赶，仓皇脱出，已如上述。其时对面山上亦枪声大作，其后才知周副参谋长与袁君亦被迫走路（因友军前往该村附近搜山，王姓村民不敢再留他们），而途中亦遇到枪击。此时我们这一起还有十多人，晚宿坑内一茅蓬内，还约定一老百姓，为我们送饭来吃。此举全属

冒险，因当时友军在这一带搜索极严，老百姓均被友军按保、按甲，拉同上山搜索。但老百姓对我们之帮助依然无微不至。

十八日，我们决定再要分散，十多人在一起无论如何不能脱出重围。遂教卫士及另一些友人另成几小组，给以一些钱，令其设法乘间穿出此重重叠叠的封锁线。卫士等都不愿离开，说无论如何要和我们同生同死。我们再三和他们说明理由，遂出声大哭而去，我们亦都流泪。但又不能不嘱其勿出声哭，恐为友军闻见，发现了目标。这样，我们这一批只剩下了五个人：李一氓先生、教导总队余主任、教导总队五队队长黄君（为参加三年游击战之老战士）及副指导员王君（为菲律宾华侨）和我。

一切靠民众

从十八日起，我们吃的问题已告解决。盖当地老百姓听说是新四军，虽冒万险还能按时送东西给我们吃。当天晚上，该村张氏兄弟为我们在山坳里找到一个草棚。入晚，夜色昏暗，我们走上山去。将近半山，忽刮大风，移时，大雨如注，我们当时只在露天山径上稍待，而雨不稍停，还是向上走。因漆黑全不见路，乃折树枝点火（这实在大大冒险，此星星之火恰是最好目标，然当时已顾不到这些了），向没路中找路。

但所点火又时常被风吹灭，被雨淋灭。到一个处所，便迷失了路，再也找不到那草棚。再上前时，恰有一断崖，我和李、余等均从崖上翻跌下去，所幸下面并非岩石，没有撞死，也都没有受伤。爬起来再走。如是摸来摸去，而大雨下个不停。大家心里在想：大概此番非死即病，奈何、奈何！忽王副指导员大叫：“已经寻到路了，快快上来，快快上来。”我们就跟着上去，果然不到三十步路，就是那个草棚，真怨煞天公也！

到得草棚，见棚顶洞穿，雨淋得通湿，地上已不能睡觉。才大家挤着靠住一起，休息了一番。但那时风雨仍劲，身上衣服透湿，所以觉得印心肝冷。初时还不敢烤火，但过后实在冷得熬不住，就大胆折柴生起火来烤了。实在这草棚的目标异常显露，背后山上都是瞧得见，只是当晚我们看不见，不知道耳。我们就取出民众给我们的包谷烧起来，他们还给我们一盆咸肉呢！哈哈！我们就痛痛快快吃了一餐大肉饭。

第二天清晨，张氏兄弟俩就来探问，并称：“今晚你们必须离开此地，因保甲长已来通知，说明天要来这几个山头搜山。”接着他就介绍我们到河对面村中的王家去。他又说，他家里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所以只能把所剩的包谷都拿来给我们。又说，昨晚保长叫他去，说：“人家说你帮助新四军，军队对你已经

注意，你千万要当心。”我们也劝他们要特别小心，免得因我们之故而受累。当时就约定将晚时，他们在某地点来接我们过河去。

日落黄昏时，我们就动身。张氏兄弟亲自用竹筏，把我们送过第一道河，再领到第二道河边，指着对面房子说：“那边走过去，就是王家，他家虽穷，但十分义气，必不亏待。”我们深深谢了张氏兄弟，就卷起裤管，脱下袜子，涉水而过。水冰冷，印入心肺，但也管不得这许多了。过河后，即在黑暗中摸到对面。走进一家人家，他们吓得要命，以为是友军。后来知道是新四军，即烧汤来喝，并煮了半锅包谷粥，取出其所藏咸菜给我们吃。问他姓甚，他说姓朱。原来王家在村子那一头。问他还有米卖点给我们没有？他说：“哪有米卖？我们的米和大部分包谷已给大队伍（当地老百姓称友军都称大队伍）拿走了。”他说着，听里面有人叫痛声，问他为甚，他说女人忽然肚痛。我们就将剩下的一包八卦丹送给他，立刻教那女人服了。过后，他催我们快走，说大队伍常来巡查，要挨家挨户地搜。前天来搜时，把他家阁楼上的稻草都翻开来了。他还说起一桩惨事：对面朱家是一个中等富户，从前出外经商，现在在家守富。前天下午有两个新四军人去敲门，那朱翁就把他们接进去，闻道是新四军，即出肉饭相待，并留他们在楼上住。谁知到了黄昏，

巡查员到他家搜查，朱翁坚决不肯让他们上楼，说：“楼上是眷属住的，她们都是女流之辈，见了你们必然惊怕。”巡查员不由他分说就一步当二步，抢上楼去，见床上躺着两个男子，而且穿着军装。遂大怒，把这两个人拖下楼来，指着朱翁：“这是你的眷属”？就一记耳光，拳足交加，打得他口吐鲜血，然后再把他捆绑起来，将两手反绑，吊在他家梁上。再到后房，把他的女人、小孩，连两个新四军一块儿带走了。

我们听了，自是十分难受。即向他告辞而去，踉跄到王家来。王家的门已闭上，我们敲着，请他们开门帮助，就走出来一个农妇，开了门，知是新四军，就叫我们里面坐，叫她孩子倒茶给我们喝。我们问，老板何往？她说：“刚才送你们一批人到那边山里去了。那边的山你们的人多着呢。”说着，就生起火来叫我们烤火。我们问她：“老板什么时候回来？”她说半夜就可回来。我们就在屋里堆些禾草胡乱睡下了。那女人就和她的女儿在磨子上磨包谷粉。同时，还不时叫女儿把禾草盖在我们身上，怕我们受冻。不隔两点钟，她老人家就叫醒我们，说：“包谷粥烧好了，请出来吃。”我们感激得什么似的，就都起来，一面烤火，一面喝粥。她告诉我们：老板已经回来了。过后就有一个忠厚的老农夫从里边走出来，背后还跟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我们问：哪一个的王老板？

为首的突然吃了一惊，答道是“我”。我们再问他刚才送走的新四军，送哪里去了？他不作声；再问还不作声，等一回，他走进去了。那后面的老头儿也走进去了。屋子里的空气顿时有些紧张。那女人、小孩的脸色也都变了。孩子跟到父亲里边去了。怎么一回事呢？

过后，那跟在后面的老头儿又走出来，坐着，非常之恭敬而惶恐地问：“先生，你们是……是大队伍派来的吗？”哦，原来是这样的误会！我们立即向他解释，我们是新四军，不是“大队伍”。

“真正是新四军吗？”那人把我们五个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是新四军，真正是新四军。”我们都说。

“刚才王老板送走的一批，还是我们同走的呢。”余主任加上一句。

“那么，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姓王的呢？保长告诉你们的吗？”

“不是，是前村张家兄弟介绍的。”

“哦，哦，王三弟！出来，他们真正是新四军，不要怕。”

于是他们都出来了。并告诉我们，这两天大队伍要来搜山，“天亮你们就得走”。我们要求他们把我们领到一个安全地方去。王老板想了好久，就说：“有

了，有了。天明我就领你们去。”

其时，已五点钟，天也快亮了。再烤一回火，东方已发白，王老板父子俩就领我们出去，沿着河道走去，走了四、五里路，即有一草屋，那就是刚才那老头儿的家（王的亲戚，现避居王家）。他就说：“这里很安稳，晚上你们可以住在这里，白天躲到那边山坡上。”接着他们还领我们到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密林里躲着，他们还为我们带来一条棉絮和些稻草，叫我们安心躲在那里。这山坡沿河，对面山上是大队伍，但他说，他们决不会过来的，“你们听到枪声，也不要急。那边坑里，还有你们的队伍，还有几百人呢。我们还要替他们送些包谷去。”

“我们吃东西怎么办呢？”

“放心，我会把饭送过来。我不来，我儿子会来，你们安心在这里，不要急，我要去了。”

吃饭时，他的儿子果然把饭送来了，而且是大米饭。呀，大米饭，多时不见大米饭啦！

我们这时就叫他们到街上去买衣服改装了。有几件衣服，还是那王老板送给我们的。

这样，我们躲了两天。附近风声愈紧，王家父子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必须离开该地，因保长已于十九日通知，这三天内全村的人，无论男女，都要上山搜查，如有不去者，以通新四军办罪。我们当时就决定

二十二日清晨就走。王家父子答允我们，当天早上他们之间必有一个，前来领我们渡河，走向三溪去。他们当于二十二日上午四、五时即到草屋内来看我们。

二十二日上午四点钟已到，不见王老板他们来。天快亮了！还不见来。我们便有些发急。再等一回仍不见来。乃派王副指导员向他村迎去。约莫一小时后，王回来说：王家搬得空空了。在路上碰见有人说，全村的人都被押着去搜山了。

那怎么办呢？路既不熟悉，化装还不完全。不得已，就硬着头皮渡河去。我们扮成农民模样，拿着菜篮上街去了。于是我们就这样朝行夜宿，每天走上七、八十里路。路上遇到几次盘问，几乎看出破绽，幸得安然脱出虎口。路上顶严重的问题便是住宿，饭店须有通行证才得借宿，我们哪里能得通行证？所以一路住宿，终是费尽心思解决。但终于被我们解决了，这都靠了老百姓的帮助。有些老百姓，明知这批人是新四军，但终愿热诚款待。当然，一路上碰到的钉子也苦不尽言。

如是走了四日，便到某城。因无通行证，不能住旅馆，幸半路遇到一苦力，姓沈，我们对他说说明苦衷，他就招留我们到他家里住。他家接到我们这几个怪客人，居然快快活活过了一个旧历年。我们总共在他家里住了七、八天。他除招待我们，替我们解决住的问

题外，还替我们弄到了几张通行证，这真是天大的帮助。他之弄到手，也真万分不容易。

于是我们便“活”了。在他家里住时，我们还托他买些旧报来看，就知道叶军长业已“被擒”，新四军番号已被撤消。读到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谈话。最后还读到蒋委员长的训词。我们几个人只是相对默然。黄队长太年轻，几天夜深，在梦头里大声痛哭起来，大家都睡不着觉。在新年，那沈家兄弟都很快活，我们一定也要很快活的！

过了几天，我们就坐了汽车到浙江来。现在我仍留在这沿海的小小城市中。李一氓先生、余主任、黄队长、王副指导员，他们都已分开走了。

尾 声

现在我已脱险，到达此宁静之小城市安然度日。我遥想皖南山地中不知还有多少人在苦苦挣扎，死里逃生？我挂念着叶军长，挂念着他那英勇美丽的灵魂。我盼望他在最短期内重新获得自由。他的爱和恨就是我伟大民族的爱和恨。他热爱着祖国的人民。他的自由是我伟大祖国获得自由的重要保证。我挂念着项副军长、袁主任，和所有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们。他们死的死了，我祝福其能安然长眠。即使他们已身

首异处，或竟骨肉粉碎，或竟炸得无影无踪，但我敢保证，他们光荣的灵魂是整个的，它们将永久生长在新的一代心坎里。活的呢，他们还在挣扎，还在熬苦，死神的翅膀一分一秒钟都不会离开他们。我祝福他们也能安然脱险，因为这世上受苦的人群还需要他们，不，简直象生命一样急迫需要他们。人们尽可以不必要用死去威胁他们。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求仁得仁，又何恐！”如果他们能够安全，那中国的安全才有真正的意义。

我惦念着那些活着的被俘的战士们。他们内心的痛苦是不能言喻的。我们请求当局能够早早释放他们，让他们重新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请耐心地等着吧。如果办不到，那末，我且把俄国诗人莱蒙托夫（М. Ю. Лермонтов）的那首《被俘的战士》中两段献给你们，你们咀嚼咀嚼也不是无益的。

“时间就是我的马，这驰骋的战马，
阴沉沉的铁格子的牢狱是我的假面具，
牢狱的墙壁就是我沉重的石甲；
铁的门紧闭着，我只是等待。

赶快！哦、飞一般的时间啊、跑得更快些，
我窒息在新的甲里，我昏眩了。

死神，请拉住踏鞍吧，我要跳下来，
揭开那假面具，暴露我冷酷的□面目。”

关于这番惊天动地的事变，我总算已经把我所见和所知的约略写出来了。孔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所以我只写事实，别无议论。我只希望公义的冠冕还能留在人间，一切由公义来审判。关于新四军，“不论中国人或是外国人，都承认他们的做法已经得到人民真诚的支持”（Epstein《民之战争》），这且不论，但我仍然祈望我们当局能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古训，以及“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六章）之教义，“按着公义审判”（新约提摩太后书）这震惊世界的惨变。

至于我自身，则颇能从哀痛中找寻到快活。原因是“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灵魂，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三)

李志民

我在前两部分记叙了抗大总校和遍布全国抗日根据地各分校的情况，从纵、横两方面展开了抗大的历史画卷。这个部分，我想总的概述抗大的教育方针、优良传统、作风和主要经验。

抗大为什么能在抗日的烽火中“越抗越大”？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撰文纪念抗大成立三周年时曾作过精辟的分析：抗大之所以最革命，最进步，是由于它有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领导，有革命的教职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思想哺育青年。因此，它才能象一座革命大熔炉，把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锻炼成钢，成为全心全意为民族、为社会的解放而英勇奋斗的抗日干部和共产主义战士^①。

**黄河之滨集合了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抗大学员来自三个方面：一部分是经过土地革命

战争和长征战斗考验的红军老干部，他们是我军的砥柱，抗大的栋梁；一部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包括一些白区地下党的干部）；是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的坚强的骨干力量；再一部分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是播撒到全国各地，成为抗日战争中各条战线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这三部分同志从四面八方汇集于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担负起抗日救国、人类解放的重任。他们都不愧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都不愧是劳动者的先锋。

这里我着重介绍各地革命知识青年进入抗大的一些情况。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我国的侵略。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全国各阶层人民都迫切要求抗日，把驱除日寇、拯救中华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党和人民军队身上。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更加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忱。在这种形势下，延安，很自然地就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革命圣地，抗战的中心；抗大，也就随之成为全国青年、特别是革命知识青年响往的革命熔炉。因此，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和侨居国外的革命知识青年便不远千里，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线，来到抗

大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参加抗日战争。特别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到一九三九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封锁抗日根据地这两年时间，更是成群结队，接踵而来。据统计，仅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八月的四个月时间，从武汉、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革命青年就多达二千二百八十八人。当时毛泽东同志曾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要求做到“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要把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都贴上一张，向全国革命青年大开入学之门。那时候，我们政治机关接待了许多革命青年，耳闻目睹很多动人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东北四省^②的青年从亲身的痛苦经历中，最深刻体会到国破家亡、人如草芥的惨境。他们流亡关内，经常聚集一起，探索着救国救家的道路。从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东北流亡学生从我们党的宣言和红军东征、西征的积极行动中，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有些先进青年就陆续投奔陕北。“七·七事变”后，更是大批拥进延安，进入抗大。如东北大学电机系学生李东野等十几个同学，同数以万计的东北流亡学生一样，从东北流亡到关内，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和抗日宣传工作。一九三七年秋，在中共东北特委和东北救亡总会的教育帮助下，他们

一部分学生到山东和冀中参加游击战争，李东野等几个同学则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投奔延安，到抗大第三期第九队学习。

北平、天津是我们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策源地，也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从一九三六年春开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地下党员、学生抗日救国会主席彭友今，委员郭奇等一些平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就陆续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留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学生、抗日救国会委员兼纠察总队长牛克伦同志和他的同学刘唯宁、国立师范大学官克非、郝仁初等许多积极分子，在党和“民先队”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七月，平津相继沦陷，他们悲愤交集，但恨手无寸铁，只好强压怒火，撤离平津，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有的深入农村宣传，武装群众；有的几经转折奔向延安。此后，在八年抗战期间，虽然日寇疯狂镇压爱国青年，但平津学生仍在我党的领导下，一批接一批地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我记得，袁世凯的亲外孙，清朝两广总督张人骏的孙子张象耆，就是不甘忍受“亡国奴”的奇耻大辱，在一九四二年与封建家庭决裂，化名艾地逃离北平，进入抗大二分校学习，后来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

继平津沦陷之后，上海、南京、武汉等许多大、

中城市相继沦亡。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流浪他乡，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即使随着国民党政府流亡“大后方”^③，想为抗日尽点“匹夫之责”，也是处处受到限制，不得自由。所以，许多革命青年在到处碰壁之后，终于投奔了抗大。如天津南开中学学生鲁子敬、邢方群、丁志刚、陈健等人，随学校流亡到重庆，高中毕业后，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但对怎样才能抗日救国，感到迷茫，就联名写信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亲笔给这些彷徨的年青人回了信，热情地鼓励他们要继续发扬抗日救国的精神，并向他们建议：毕业之后，继续升学也好，到前线去也好，只要坚持抗日，到处都可以发挥青年的作用。他们收到回信，受到很大鼓舞。鲁子敬、丁志刚、陈健等同学，就拿着周恩来同志的信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要求介绍到延安，进入抗大。一九三八年二月，成都电报局的助理会计员石于、周荣国两个知识青年写信给朱德总司令，要求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杀敌报国。朱总司令亲笔给他们回信说：“只要你们有决心，能背着行李到八路军总部来，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他们收到回信后，从成都坐火车到西安，然后背背包步行到延安抗大学习。

当时，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青年，要寻找抗日之路也是不容易的，有的要几经周折才找到

通向抗大的大门。一九三九年春，安徽省濉溪县十八岁的知识青年戴著生，为了参加抗日，到国民党一支“游击队”去当宣传员。过了几天他就发现这支所谓“游击队”，不仅不打日本鬼子，还欺压群众，横行霸道。他一气之下，跑回了家。不久，他听说新四军游击队是抗日的队伍，又跑到新兴集找共产党的涡阳县县长，要求抗日。他参加新四军游击队，战斗了几个月后，县委书记、县长都在反“扫荡”战斗中相继牺牲，他也负了伤。但他真正认识到要抗日只有跟着共产党走，革命意志更坚定。一九四〇年三月，组织上送他到抗大第四分校学习，把他培养成优秀的游击队干部。

抗战初期，文艺界的革命青年是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一支轻骑兵。他们在我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许多“战地服务团”、“救亡演剧队”，活跃在抗日前线，起了很大作用。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破坏，宣传工作很难开展，不少文化人、甚至整个演剧队都投奔延安，有的进了抗大。据我所知，他们中间有：电影演员吕班（参加演出过电影《十字街头》）、田方，剧作家欧阳山尊，作曲家贺绿汀、吕骥、郑律成以及苕荪、裴东篱、史若虚、苏里、汪洋、张平等许多文化人。他们的到来，使延安的文艺工作大大活跃起来。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日，张际春同志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一篇《抗大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奋斗的三周年》的纪念文章。他写道：革命青年“几乎把进抗大学习这件事，当作过去‘参拜南岳、五台、峨嵋’那样看待。他们中间有的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结队成群地来到抗大。有的不怕千山万水，不惧艰难困苦，千方百计，冲破一切限制来到抗大。第三、四期闻名全校的，有孙炳文烈士的夫人任锐同志和她女儿孙维世“母女同学”；傅涯同志（陈赓同志的夫人）和她的妹妹傅英、弟弟傅燊“姐妹、姐弟同学”；还有上海演剧队的文化人林寒流（留学生）、凌霞和严熹、范杏仙等好几对“夫妻同学”。

在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中，有一部分原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还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④或特工人员。他们激于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义愤，毅然脱离国民党，奔向延安，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事变”之前，被蒋介石驱使向红军进攻时，耳闻目睹共产党和红军坚决抗日的行动，早已倾心；“西安事变”后，又目睹蒋介石背信弃义，先后囚禁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千方百计瓦解、吞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种种罪行，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纷纷脱离国民党军队，投

奔延安。特别是东北军“学兵队”的学员，大部分是我北平地下党组织秘密介绍去的抗日积极分子，其中很多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东北流亡学生和平津大、中学生。他们的行动最积极，联络了不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到了抗大。东北军中有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和他的秘书高崇民同志的儿子高存信，学兵队学员陈剑飞（陈峰）、杨恬、韩复东等许多同志。十七路军中有冯玉祥将军的侄儿冯文华（后任抗大第五分校教育长），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赵寿山将军的儿子赵明德、儿媳罗兰。此外，还有傅作义将军的弟弟傅作良等同志。他们每个人投奔抗大都有一段颇为曲折的经历。就以张学思、高存信同志为例吧：“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俩都随着父兄入关。一九三三年夏天，张学良将军为了让他们今后能带兵打仗，收复东北，把他二人送进国民党南京中央军官学校第十期学习，张学思同志在步兵科，高存信同志在炮兵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高存信由他父亲高崇民同志在武汉请周恩来同志写信介绍去延安，到抗大任军事教员。张学思同志于一九三三年就参加共产党，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学习后，一直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工作。由于他在步兵科学习，要增加半年的预科训练，补习文化，所以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才毕业。当他要返回西安时，发生了“西安事变”，即被国民

党当局扣留，直到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到南京，才获释回到西安。他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为营救张学良将军而奔走。以后组织上送他到香港隐蔽了一段时间，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周恩来同志请他回来，经西安到了延安，分配到马列学院学习，并负责组建抗大“东北干部训练队”（简称“东干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他在马列学院毕业后，即到第三期“东干队”任队长。

抗大为了接受东北军、十七路军官兵，培养一批东北干部，曾举办过三期东北干部训练队。一九三七年下半年举办第一期，有三十多人，由东北军副师长张雨久任队长，学员毕业后，大部分返回东北军去了。一九三八年八月，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高崇民同志到延安，要求中央再开办几期“东干队”，为收复东北培养干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陈云等同志接见了高崇民同志，同意他的意见。所以，在一九三八年冬又在抗大举办第二期“东干队”，有东北救亡总会介绍来的学员七、八十人，由原东北抗日联军的军长李延禄同志任队长，李仿吾同志任政治指导员。这一期的学员于一九三九年七月随抗大总校挺进敌后，毕业后就地分配在太行山区工作。一九三九年四月，举办了第三期“东干队”，七月总校挺进敌后时留在延安，划归抗大第三分校，编为直属第二队，有学员

九十八人。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这一期学员毕业，由队长张学思、政治指导员高存信同志带领，通过敌人封锁线到冀中军区工作。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军对日寇进行大反攻时，张学思等东北干部都先后带领部队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为收复东北和最后解放东北贡献很大的力量。

抗大教职学员中除了大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官兵外，还有不少国民党其他军政人员。他们冲破国民党的囚笼投奔延安，也是非常不易的。“七·七事变”后，青年学生周湘帆抱着抗日救国的理想，从四川跑到南京投考国民党中央宪兵学校。开学不久，日寇向上海进犯，直逼南京。宪兵学校没等南京听到炮声，就向西南逃跑，一口气从南京跑到湖南长沙，又跑到常德，还准备逃往四川。周湘帆正在愤懑徘徊之际，忽然在长沙街头看到了抗大的“招生简章”，象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便约好同学李哲，两人穿着宪兵的黄呢子军装，大摇大摆地闯关过卡，经武汉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奔向了光明。国民党中央军校中尉教官黄烈也是在广州沦陷前夕，看透国民党假抗日的面目，穿着国民党军官制服，藤箱里装着印有蒋介石签章的军校教官“委任状”，闯过国民党军警的重重关卡到了洛川，进抗大第四期第六大队学习的。由此可见，当时抗大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了。

日寇的铁蹄踏破了华夏金瓯，也踏碎了海外赤子的心。抗战爆发后，许多华侨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捐款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一批又一批的华侨青年组成“华侨战地服务团”、“华侨记者团”返回祖国，直接参加战斗。有些华侨青年则结伴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抗大。马来亚华侨青年陈明回国探亲，在我党抗日救亡主张的影响下，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返回马来亚后，便积极联络进步同学，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告别了父母和未婚妻，与同学陈人颂等人一起回到祖国，投奔延安抗大。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福建省集美中学林有声、白刃等五位华侨学生为抗日救国，不畏艰险，克服了种种困难，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了西安后，步行八、九天到了延安，分配到抗大第五大队学习。这五位华侨青年经革命队伍几十年的锻炼都成了才，现在，林有声同志是一个省军区司令员，白刃同志成了剧作家，是电影《兵临城下》的编剧。

在投奔抗大的知识青年中，还有翟默然、霍丁、杨宪吾等一批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一位名叫黄鼐（黄乃）^⑤的留学生很引人注目。他原名黄一寰，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儿子。一九三六年三月，他东渡日本留学，参加了左翼学生团体和“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活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被日本警察逮捕，

幸好在他父亲过去的日本朋友的营救下，才幸免于难。他出拘留所不久，于八月初回到上海，参加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春到了延安，进抗大第四期学习，据不完全统计，到抗大学习的华侨青年、留学生和港澳青年，第四期有六十四人，第五期九十五人。因为华侨青年大多是在抗战爆发一段时间，了解祖国情况之后才陆续回国的，这时由于战乱和敌人的封锁，要到延安比较困难，所以，分散到南方抗日根据地的人数更多。一九四一年十月，抗大“华中大队”（第九分校的前身）就接受了近百名从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来的华侨青年，单独编成一个队。一九四二年四月毕业后，都分配到新四军部队工作。海外赤子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歌颂的。

在抗大不仅有中国的革命青年，还有不少外国青年朋友，他们中有抗大一期越南学员洪水同志；五分校教育长朝鲜同志任信虎；深受抗大师生怀念的朝鲜同志郑律成，以他火一般炽热的感情，谱写了《延安颂》、《延水谣》、《八路军军歌》等经久不衰的作品。此外，还有日本“反战同盟”吉田太郎等多人也进入抗大学习过。他们虽不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但他们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中国革命；有的为中国革命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甚至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和英雄业绩，同样应该载入抗大的光荣史册。

革命青年不远千里、历尽艰辛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受到党中央和各地党、政、军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和亲切关怀。

毛泽东同志对革命青年从西安步行八百里到延安这种精神给予很高评价。他说，你们到延安找共产党，方向是对的，很不容易，这是很大的考验。进抗大没有考试，大家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延安来，这是最好的考试。他对来抗大的知识青年特别关怀，每到一百多人，都要亲自接见，并与他们亲切交谈。一九三七年二月初，他接见了从北平来的一批知识青年，向他们表示欢迎之后说：延安的抗大和你们北平的大学不一样，北平的北大、清华、燕京大学，有礼堂，有教室、实验室、图书馆，有桌椅板凳，有名教授；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接着，他指着露天会场说：这就是教室，你们看，没有桌椅板凳。我们抗大的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同志们要准备吃苦，只有吃苦才能革命。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同于别的军事学校的，就是我们抗大是研究革命道理的大学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大学校。我们人很多，一两千人；我们的理想大，奋斗目标大，我们这个大学校，在中国过去是没有的，世界上也是很少的。这一席话，多么豪迈，

多么鼓舞人心啊！还有一次，毛泽东同志知道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大学学生郭奇同志到了延安，住在西北旅社，便到西北旅社去看望他，向他了解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情况和北平学生运动的动态，直谈到深夜。

一九三八年十月，朱德同志利用六届六中全会休息的时间，特地到抗大第四大队第十队看望学员。他听指导员雷钦同志介绍，这个队有六个国民党县长，一个国民党团长，还有华侨青年，非常高兴，就到窑洞里一个一个找他们谈心，问他们生活习惯不习惯？有什么困难？他见了从马来亚回来的华侨青年李泗美时，很亲切地对他说：你们远涉重洋回祖国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真不容易啊！这种精神很可贵！

这次，朱德同志还顺便看望了在这个队学习的大儿子朱琦同志，检查他的学习情况，并把朱琦同志带到雷指导员面前交代说：“你不要认为他是我朱老总的儿子，不敢管。你这个指导员对他的学习、生活各方面要管得严格一些。”雷指导员向朱总司令汇报说：“朱琦同志各方面表现都很好，请您放心！”朱总司令临走还是再三勉励儿子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好上前线。老一辈革命家严格要求子女的“家风”，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中央领导同志对抗大毕业的同学也很关心，又题

词，又亲自欢送，使学员深感觉党对自己的关怀和托付的责任重大，更决心勤奋地工作，更英勇地战斗。一九三九年九月，抗大第一分校第一期一批毕业学员分配工作，路过山西武乡县砖壁八路军总部，朱德同志亲自接见他们。在谈话时，朱德同志问他们是什么地方人？问那个省，那个省的同学就举手，结果，全国大多数省份的人都有。朱德同志兴奋地说：“全国革命青年都汇集到抗大来了，你们代表着全国青年，代表着全国人民。”朱总司令这句话阐明了一条真理：黄河之滨集合着这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代表着全国青年、全国人民的意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崭新的中国！

党对抗大的坚强领导

抗大要不要党的领导？这个问题是抗大创建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斗争的焦点。当时，王明等人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三民主义是抗大的重要课程”，“三民主义是抗大政治团结的基础”，妄图否定党的领导，扭转抗大的政治方向，改变抗大的性质，把抗大办成所谓“统一战线的军事学校”。为了同王明的错误进行斗争，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

告中，系统而深刻地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在抗大的建设问题上，他再三强调：抗大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不是什么统一战线的组织；抗大的整个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学生的绝大部分都是共产主义者，或者倾向共产主义的，所以，抗大就比昔日的黄埔更革命，更进步，能够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作出更加伟大的贡献。经验证明，党对抗大的坚强领导，使抗大成为培养锻炼革命青年的大熔炉，是抗大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党中央、中央军委把办好抗大作为我党我军建设的“重工业”，十分重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在创办过程中，党中央、中央军委经常对抗大的工作进行检查指导。一九三九年一月，抗大进行工作大检查，向中央写了检查总结报告，党中央还为此作出《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总结决议》。一九三九年七月，抗大总校已挺进敌后，中央军委特对留在延安的第三分校进行工作检查，并发出了《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再次强调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后仍经常通过电报、文件，对抗大的工作进行指导。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中央军委又适时地作出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抗大分校，以及抗大总校返回陕甘宁边区等重大决策，保证抗大在

那样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更好地保存自己，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一九三七年一月，抗大第二期开学时，中央军委为加强对抗大的领导，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以后，各大队和各分校，也相应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加强统一领导，保证党的教育方针、计划得以贯彻实施。

抗战初期，红军刚改编为八路军，按国民革命军的编制不设政治委员，所以，抗大各大队也不设政治委员，只配备政治协理员，政治工作有所削弱。一九三九年十月，总校到达晋察冀边区后，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电示精神，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机关的组织机构，在各大队、后勤部门和各分校配备了政治委员，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

抗大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建和直接领导下成长、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抗大的领导，从制定教育方针、路线，审定教育计划，确定领导班子等原则问题，到参加抗大集会，给教职学员讲演、上课、个别谈话，出版校刊等问题，都抓得很紧。

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运用报刊指导工作，加强思想建设。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同志亲自选拔胡耀邦同志担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兼党总支部书记，

并教导胡耀邦同志要做好党的总支部工作，首先就要办一个好的校刊。胡耀邦同志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亲自主持创办了校刊《思想战线》，运用它来正确地领导开展思想斗争，以加强全党的思想团结和健全整个学校的政治生活。当时，毛泽东同志批评抗大的领导同志没有自己动手写文章，遂亲自撰写了著名的战斗檄文——《反对自由主义》。胡耀邦同志把这篇名著作为《思想战线》第一期的头篇。同时，自己也写了一篇读后感《关于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结合抗大的实际情况，强调反对自由主义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同时，罗瑞卿同志发表了《把学校全体干部放在思想战线的先头》，莫文骅同志也发表了《克服知识分子入党两种不良现象》等文章。这一期《思想战线》对当时克服自由主义，端正党风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思想战线》出了两期，以后改为《抗大》校刊的油印小报，毛泽东同志又为校刊书写了刊头，并多次题了词。抗大通过这份油印小报，及时反映了全校教育、训练的动态，交流教学经验，起了指导工作的作用。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王稼祥、罗迈（李维汉）、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抗大也十分关怀，经常出席抗大的开学、毕业典礼和重要集会，而且亲自担任抗大的兼职教员，给抗大作报告、讲演或上课。抗战期间，周恩来同志

大部分时间在重庆、武汉等地领导统一战线工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同志也大部分时间在前线，但他们每次回延安，都到抗大去作演讲。

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对抗大的坚强领导，为各级党委作出榜样。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央局、军分会的领导同志也都把办好抗大分校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陈毅、彭雪枫、李先念、陈赓、粟裕、黄克诚、张爱萍等同志都曾兼任过分校的校长，亲自抓抗大的工作。一分校在太行山区时，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曾到分校作过报告和指导工作。聂荣臻、贺龙等领导同志，也无不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抗大无微不至的关怀。

要办好抗大，选配好一套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是个关键。当时，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前线和各抗日根据地都急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特别是有领导才干的干部。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认为抗大的领导干部“是干部的干部”，一定要配好配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事实也是这样，抗大历任的领导干部，除林彪之外，诸如刘伯承、罗瑞卿、张际春、滕代远、徐向前、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和许光达、莫文骅、胡耀邦等同志，都是建党初期、北伐战争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不仅久经斗争考验，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而且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领

导水平；政治思想比较敏锐，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民主作风好，善于联系群众，办学经验也比较丰富，深受教职学员的爱戴。讲到这里，我想有必要顺便澄清一个问题：一九五九年林彪把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林彪、江青及其死党借“宣扬抗大”为名，又搞展览，又拍电影，又写文章，大吹特吹林彪在创建抗大中的“伟大功勋”，好象没有林彪，抗大就无法创建、生存和发展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否！一九三六年抗大第一期开学时，林彪是学员兼校长，当时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和罗瑞卿、莫文骅等同志的协助下，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但只有一年多时间。一九三七年八月，第三期开学不久，林彪被任命为第一一五师师长，便离开抗大，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全校工作由罗瑞卿教育长主持，莫文骅、张际春、胡耀邦、刘亚楼等同志协助，开始进入抗大大发展的新时期。一九三七年秋天，林彪在山西负伤以后，曾回到抗大养伤。在养伤期间，给抗大师生作过一次报告，不久就前往苏联养伤。此后，虽然他仍挂校长的名，但再没有回抗大工作过。至于江青和叶群，既不是抗大学员或工作人员，也与抗大毫无关系。不言而喻，林彪、江青及其死党借宣扬抗大之名鼓噪一时，不过是欺世盗名，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舆论的鬼蜮伎俩罢了。

要办好抗大，还需要一支坚强的、有较高水平的

教员队伍。建校之初，由于缺乏教员，中央首长和机关干部曾前来兼课，这对解决当时的困难起了很大作用，但终非长久之计。所以，从第二期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下决心从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一批军政素养比较好的干部，到抗大担任干部或教员。第三期之后，每期又从学员队中抽调一批优秀毕业生，经过各种训练班培训后，充实教职员队伍，逐步建立起一支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丰富的军事、政治理论知识的教学队伍。在老干部中，徐向前、罗瑞卿、李逸民、冯达飞等同志都是黄埔军校早期的学生；何长工同志是建党初期的党员，青年时代曾到法国留学，深通法文、英文，还会讲俄语、西班牙语，是个博学多才的干练之才；王智涛同志一九二五年就到苏联军事院校留学，一九三三年回国后，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可谓军事教育方面的专家；还有谢翰文、张如心、吴亮平等同志，也是长期从事党的政治教育工作，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有较深造诣的老教育家。“七·七事变”后，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同志中，还有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如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张庆孚等同志，都是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初在理论界就有些影响的知名人士。这两部分同志是抗大教职员队伍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培养下，逐渐扩大教学队伍，到一九三八年四月，第四期开学时，全校教职员队伍就

已发展到一千三百八十六人，比第一期全校总人数还多。

抗战爆发以后，抗大的许多教职员激于抗日的热忱，纷纷打报告要求上前线，不愿留在后方工作。为此，毛泽东同志曾亲自向全校教职员作了一次报告，给大家算了一笔帐说：同志们想一想，你们在抗大当教员，每个队七、八十人，如果他们都当连长，就会是七、八十个连；如果都当营长，就是七、八十个营；如果当团长、师长呢？教育工作就是革命工作，要树立死也要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的决心。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抗大的首长除了加强对教职员的思想教育外，也很注意提高教员的政治地位，扶持教员的威信，照顾教员的生活。一九三七年，延安的物质生活极端艰苦，小米饭、熬白菜是全校同志的共同伙食。但为了表示对教员的尊敬，抗大给教员每月额外补助两斤大米、一斤鸡蛋和几斤面粉，会抽烟的同志还发给四包“风车牌”纸烟。到了一九三八年，延安的生活略有好转，开始发津贴费，学员每月一元，学校领导干部最高是五元，一般是三元半，只有从外面请来的教员是十元，高出一倍以上，钱虽不多，但却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体现了我们党尊重知识，关怀知识分子的政策。抗大政治教育科长杨兰史同志，长期患肺结核病，仍坚持教学工作，当时延安药品极

缺，学校想方设法为他找来希罕的进口药品。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七日杨兰史同志不幸病逝，抗大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朱总司令亲自主持大会，毛主席亲笔写了挽联：“哀悼我们教育战线上的勇士，杨兰史同志永远不死。”党中央的悼词中颂扬杨兰史同志是“忠于革命学校工作的典型工作者。”党中央如此关怀抗大教职员，使大家深受感动，纷纷表示要以杨兰史同志为榜样，一生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抗大各级政治部门，是党在抗大实施政治领导的办事机关，它对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保证教学和各项任务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抗大政治部的建立和发展是随着抗大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一九三七年一月第二期开始成立政治部时，只有几个人，到一九三九年十月抗大总校抵达敌后，仅两年多时间，政治部的干部就增加了几倍，政治工作的威力和作用也得到更好的发挥。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学校一切工作应以教育为中心。”罗瑞卿同志在一九三九年一月《抗大检查工作总结报告》中特别强调：“学校政治工作第一个任务，便是保证教育计划的完成，因而政治工作人员，应当切实研究与了解教育计划，正与前方政治工作人员，要保证作战胜利，首先要研究与了解作战计划一样……教育内容之是否恰当？教授方法有无缺点？学

习上有什么倾向？教员学员之间关系如何？以及教学方面其他问题。政治工作人员，应及时了解并掌握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而显出政治工作的威力来。”为了更好地围绕教育这一中心任务开展政治工作，张际春同志要求：“政治工作人员，应当随时参加上课、出操、集合、实习、自习诸活动，去了解学员的接受程度，并及时帮助关于教学内容与方式方法的改善。”当时政治部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工作非常深入、扎实，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

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础。打仗时，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党员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就产生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团结了周围的群众，去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一九四三年一月一个夜晚，总校通过敌人封锁线返回绥德途中，上干科一个小分队在徒涉汾河时，因淌水声被敌人发觉，敌人用火力封锁了河面，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共产党员阳自碧同志挺身而出，边指挥小分队迅速渡河，边开枪还击，把敌人的火力引向自己，不幸腹部中弹，肠子也流了出来。危殆关头，他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忍受剧痛继续把敌人的火力引开，用自己的热血为战友们铺开一条跨越汾河的“虹桥”。抗大的党组织，就是由许许多多象阳自碧

烈士这样的共产党员组成的战斗集体，所以，它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带领群众去战胜一切困难，挫败一切顽敌。

一九四二年几次反“扫荡”时，每天要翻山越岭行军七、八十里，甚至急行军一百多里，但由于连长程克、指导员李行、副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赤茜（郝治平）、支委铁磊（班长）等党员干部能吃苦耐劳，起模范带头作用，在行军途中帮助体弱的同志背背包、粮袋，搀扶走不动的同志赶上队伍，所以在艰苦的行军中，没有一个掉队，没有一个开小差，创造了奇迹。

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和传家宝。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抗大建校之初，毛泽东同志就强调抗大的革命性与进步性。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他在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的题词中，开始系统地提出：“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作为抗大的“校训”。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为抗大成立三周年而作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提出：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从事学习的。”

抗大的学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的阶级出身、社会经历、政治水平、文化程度各不相同，因而每个人的思想基础和觉悟程度也有很大差别。作为革命熔炉的抗大，它的任务就在于怎样教育人、改造人，转变学生的思想，把落后的人转化为先进的有政治觉悟的人；使所有的人都会在这座革命大熔炉里得到锻炼、改造、提高。为此，毛泽东同志针对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的特点，提出了“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口号，特别对知识青年提出了思想改造的任务。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在为抗大第四期毕业同学题词中就明确提出：“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这一指示，就成为抗大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指针。

要转变学生的思想，最重要的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抗大每一期的教育内容虽然根据当时的中心任务和学员成分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根据军事队、政治队的重点不同而比例各异，但

基本的政治教育内容有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理论课程。在重点打好理论基础的同时，结合实际，进行国内外形势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

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第三期向教职学员讲授《辩证唯物论》，为抗大的哲学课打下基础。此后各期和各分校，都以毛泽东同志的“讲授提纲”和《矛盾论》、《实践论》两篇哲学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开展哲学教育。

在理论教育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发展史》的教育。通过对它的学习使工农出身的同志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人穷不是命注定，而是剥削阶级造成的，只有革命到底，推翻整个剥削制度，才能挖掉苦根，彻底解放。有些知识分子存在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思想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经过《社会发展史》的教育，并通过实际劳动锻炼和接近工农群众，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培养了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从而初步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抗大在教育工作中一直把它作为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在“抗大学习法”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学习目的与资产阶级相反，我们不把学习看做‘升

官发财’的钻营工具，更不把学习当作‘镀金’、‘镀银’，装装门面的事；而是为了提高每个革命青年的政治觉悟与理论水平，使每个革命者能更好地献身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因此，学习法的基本特点是自觉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学习；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学习；是互相帮助的学习。这就要求教员在教学中要掌握少而精的原则，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原则，中国化、大众化的原则和革命的、批判的原则，反对“条文主义”。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批评“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的教条主义倾向。批评的就是抗大一位经济学教授，没能很好地研究中国经济特别是边区经济的特点，无法解释当时“边币”与“法币”之间兑换比价的现象。罗瑞卿同志在第三期总结工作会议上也曾尖锐地批评：“条文主义是我们教育方针——理论与实际联系中最凶恶的敌人，是‘害死人’的东西，现在虽然是残余的存在，然而我们还应当来一个猛烈的攻击，以连根带叶地根绝它！”

理论联系实际，首先是联系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经常进行形势任务教育，使学员认清形势，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为完成党提出的各项政治任务而奋斗。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不少同志主张杀掉蒋介石，报仇雪恨。当他们得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后，很不理解。这时，毛泽东同志在百忙中亲自给在延安的师以上干部作报告，并层层传达讨论，统一了思想。可是，有些同志仍有疑虑，怕放虎归山。一九三七年春，毛泽东同志利用到抗大讲哲学课的机会，用“前拉后推，逼驴上山”的生动比喻，阐明我党“逼蒋抗日”的政策，使大家茅塞顿开，既弄清了思想，又学会分析问题的辩证方法，一举两得。

理论联系实际，更重要的是联系革命斗争的实际，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提高。抗大总校和各分校经常遇到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磨擦事件。要对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政策性与策略性很强，对抗大教职学员都是很好的考验和锻炼，通过斗争增长胆识，增长才干。一九三八年四月，抗大第一大队驻在陕北瓦窑堡，这里有我们的安定县抗日民主政府，又有国民党的安定县政府。国民党县长田杰生是一个“磨擦专家”，不断对我一大队进行挑衅、破坏活动。一九三九年初，更变本加厉。一月十七日非法抓捕我八路军驻安定县办事处的民运干部薛铭山、贾仲清同志。三月十三日又以开清洁运动会议为名，邀我苏振华大队长、王赤军主任和我安定县薛兰

斌县长等同志赴会，然后乘机绑劫薛兰斌县长，挑起严重的磨擦事件。面对反动县长田杰生的挑衅，苏振华、胡耀邦、王赤军等领导同志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带领第一大队的教职学员与田杰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田杰生想利用保安队与我们抗大在一条街上站岗执勤的机会，瓦解抗大学员，拉拢学员开小差。抗大学员就利用这个机会向保安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结果不少保安队士兵“开小差”，参加了八路军。我一大队即和边区警备队联合行动，作好战斗准备，并举行请愿、示威活动，对田杰生施加压力。同时，我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河防司令肖劲光同志，致电国民党国府主席林森和蒋介石、阎锡山等人，提出强烈抗议，还通过《新中华报》公开揭露田杰生的罪行，迫使田杰生释放拘捕的我政府人员，取得斗争的胜利。

国民党顽固派不仅搞磨擦，还经常派遣特务和利用“托派”走狗对我抗大进行破坏捣乱。抗大的教职学员通过揭露和批判特务、“托派”的斗争，进一步提高了革命警惕性和斗争性。一九三七年八月，混入第三期第九队的国民党特务黄坚，经常鬼鬼祟祟到处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我们党和抗大。九队学员听到黄坚散布的谬论很气愤，就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由“救亡室”（即俱乐部）主持，组织批判会，对他

展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消除其影响。第三期结束时，学校把黄坚遣送出境。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特务王伟陵、刘流等人混入第四期第一大队第七队当学员。并与国民党肤施县党部挂勾，由国民党县党部出面，公然要求在抗大成立国民党分部，与我们争夺领导权；同时又秘密发展特务组织，造谣破坏。不久，他们的大量罪证公开揭露出来，被遣送出境。此后，抗大还破获了所谓“姐妹团”和以“托派”分子郑焰为首组成的反革命集团等反革命案件。通过斗争，既纯洁了组织，又使教职学员学会了对敌斗争的方法与策略。

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投奔抗大的革命青年大多是抱着抗日救国的热情而来的，一般都具有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参加实际斗争和劳动锻炼，在政治上逐渐成熟，开始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申请入党的青年日益增加，到临毕业前，几乎百分之百的党外群众都积极申请入党。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十分理解这一大批革命青年要求入党的迫切心情，非常关心他们的进步。一九三八年夏天，第四期开学不久，毛泽东同志到抗大作报告，休息时间把我找去，了解发展党员的情况。我向他汇报，不少学员提出了申请，一批“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已经吸收入党。毛泽东同志很高兴，指示说：

“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不容易啊！从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里，这就是一个考验，政治上不坚定是走不到的。你们要好好教育培养他们，尽快发展他们入党。‘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是我们党的发展方针。现在交给你们一个任务，每一期到毕业时发展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入党，能办到吗？”我欣然领受了这一光荣任务。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抗大政治部和各级干部都把发展党员的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宣传科加强了马列主义和党的知识的教育，为发展党员打好思想基础；组织科和各队的干部，则抓紧对发展对象的考察和政治审查工作，总是尽快把问题弄清楚，作出结论，符合条件的，便及时发展入党。现在回顾当时的发展工作，总的看质量还是比较好的，陈慕华、吴冷西等同志都是那时候发展入党的。

发展工作最慎重的问题是政治审查。由于国民党拚命要与我们争夺青年，采取拉伕式的集体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办法，不仅国民党军校、部队和公务人员要集体入党、入团，连中、小学教员和大、中学生也有采取集体登记入党、入团的，所以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的数量相当大。被迫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革命青年，为此十分苦恼。第四期第一大队第四队有一位姓柳的青年，特地写信请问毛泽东同志：

“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现在请求参加共产党行不行?”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回信说:只要你把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交代清楚,本人又符合入党条件,同样可以参加共产党。他接到毛泽东同志的回信,喜出望外,从此放下思想包袱,学习和工作更加积极,终于实现了渴望已久的入党愿望。

现在我们再回顾四十多年前这段历史,就更感到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待知识分子大胆信任、大胆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或是在政治历史上沾点“灰尘”的青年统统拒之门外,我们就组织不起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巩固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抗大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培养他们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所以,党的发展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据统计,除第一期没有外来的知识青年外,第二期知识青年六百零九人,毕业时党员达四百二十七人,占百分之七十·一;第三期知识青年四百七十七人,毕业时党员三百二十三人,占百分之六十七·七;第四期知识青年四千六百五十五人,开学时党员仅五百三十人,占百分之十一,毕业时

党员达三千三百零四人，占百分之七十一。

当时各党支部很重视对新党员进行党性教育，每一批新党员入党，都要举行隆重的入党宣誓仪式，请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同志参加监誓。胡耀邦同志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期间，就亲自做发展党员的工作，找发展对象谈话，并主持过第三大队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现在，许多当年入党的党员虽年过花甲，仍然牢记入党誓词，决心一生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

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奠定一生革命业绩的基础。我们可喜地看到，四十多年来，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场，还是在与阶级敌人殊死搏斗的隐蔽战线；无论是在胜利锣鼓和礼炮声中，还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的苦难岁月里，除了极个别出卖灵魂、投敌的败类外，绝大多数抗大同志都是立场坚定、经受住风雨考验的好同志。

培养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抗大自创办之日起，就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继承和发扬了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第一期红军学员在保安修整牛栏马厩破石窑当校舍，作出了榜样。第三期红军学员与知识青年学员并肩挖窑洞，修建延安飞机场。以后每期都有增挖窑洞或修建校舍、道路

的劳动，这都体现了抗大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

一九三七年十月，抗大第三期挖窑洞的劳动，正如毛泽东同志题词中写的，是“我们的伟大事业”。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起带头作用的是第一、二大队的红军干部。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还有不少军、师以上干部，大部分同志都负过伤。原任第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同志，力气过人，几个小伙子也赶不上他。卢冬生同志的脚残废，走路一瘸一拐的，不能挑土，就争着挖土；晏福生同志只有一只胳膊，便替炊事员烧水做饭或挑饭上工地，都想为建窑洞尽自己的一分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红军干部带头苦干，使第三大队的知识青年深受感动。他们向老红军学习，也争先恐后地干起来。虽然他们中间有的过去确是小姐、少爷，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他们有自我改造的决心，有劳动锻炼的毅力，一天天进步，终于锻炼出来了，不仅饭量大增，身体也健壮了。

当罗瑞卿同志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劳动情况，反映有人称这些窑洞有的是“红军窑”、“将军窑”，有的是“少爷窑”、“小姐窑”时，毛泽东同志激动地说：你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知识分子同工农隔开的一堵墙啊！

为了打破日寇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从根本上解决生活困难，抗大响应党中央的号

召，自力更生，开展了大背粮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这在古今中外办学史上，也是伟大的创举。

从一九三九年到抗战胜利，抗大每年都要进行生产，并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之中，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但抗大的同志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一九三九年春天的开荒生产和一九四四年大生产运动，前者解决了即将断炊、饿肚子的危机；后者则达到了“丰衣足食”、兵强马壮的目的，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九三九年春，毛泽东同志为抗大开展开荒生产运动的题词中指出：“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阐明了当时开荒生产的政治意义。一九四三年五月四日，朱德、贺龙同志在接见即将去陇东开荒的抗大第七分校第二大队的学员时说：“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央要你们去陇东开办抗大第七分校，发给你们每人三件宝贝：第一是镢头，第二是枪杆子，第三是笔杆子。你们要拿起镢头开荒种地，建设校舍；拿起枪杆子，保卫边区；拿起笔杆子学习马列主义和文化知识，用这三件宝贝来解放全中国。”第七分校的教职学员带着这“三件宝”开赴陇东合水县豹子川一带，在深山沟开荒生产，建新校舍，并担负学习和保卫边区的任务。经过一个夏天的艰苦劳动，把荒无人烟的豹子川变成了学习、生产、练兵的好地

方。朱总司令这三件宝贝，不仅是送给七分校的，也是送给整个抗大的传家宝。

在大生产运动中，抗大师生从不会纺线到纺出质量很好，可以代替缝纫机用的洋线；从不会捻羊毛到捻出毛线织毛衣、毛袜、毛手套，而且经过加工，还可以织毛毯和粗呢子，做成呢军装和呢大衣。其间经过了艰苦的努力，受到了极大的磨练。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以子弹壳、高粱杆代钢笔，以刮锅灰泡水代墨水，用破碗、墨水瓶做油灯，坚持了学习，渡过了难关，使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作风得到发扬光大。

在大背粮和大生产运动中，校务部（后称经理处）和卫生处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有的同志为了征粮、运粮、采药而光荣牺牲。他们为抗大的巩固和发展同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学习和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武装斗争是抗日战争主要的斗争形式，无论从事军事工作、政治工作或群众工作，都离不开武装斗争，离不开抗日游击战争这个中心，都必须具有一定的军事素养，才能成为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抗大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军事学校，因此，毛泽东同志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列入教育方针，就是要求抗大教职学员“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夺取

抗战的胜利。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集中群众智慧总结出来的战争经验的结晶，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一九三六年秋，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第一期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一九三八年五月，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的军事著作，指明了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和必能取胜的光明前景。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著，都成为抗大军事教育的必修课程。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形成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基本原则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已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熟知。毛泽东同志在此基础上又提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进一步强调了指导战争的灵活性。他指出：“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61页）为了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要求指挥员在指导战争中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用兵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审时度势”。在游击战中，要按照

情况灵活地分散、集中兵力；必要时能象流水疾风一样迅速地转移兵力。这样，我们打敌人时就要打着它，歼灭它；敌人打我们时，就让它抓不住，打不着，处处争取战争的主动权。毛泽东同志在论述这些战术原则时，很善于联系实际，启发大家的思路。有一次，他在讲课中批判“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时说：唯物主义就是从实际出发，老老实实按实际情况办事。路要人走，人要吃饭，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这是普通的常识。可是“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主观唯心主义，他们不懂这些；好象路不要人走是可以到的，人可以不吃，子弹不会打死人，搞盲目冒险，这不是革命，是葬送革命。我们有些同志，对情况不分析研究，人家一鼓动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一个鲁莽家。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不要当乱撞乱碰的鲁莽家，而要做一个勇敢而明智的英雄。在讨论中，同志们回顾过去的战争经验教训，决心要克服鲁莽的毛病，学会分析研究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做一个勇敢而明智的指挥员。

抗大的军事教员在讲授理论课目时，尽可能联系一些实际战例。部队干部实践经验比较丰富，授课前，教员就深入学员中召开座谈会，请学员讲战斗故事，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教员就帮助分析，提高到理论上认识，然后从中选择典型战例，在课

堂上作为教材，加以总结提高。知识青年没有参加过战斗，缺乏实战经验，教员就多搜集一些战例，画出图表，在课堂进行讲解、分析，组织大家讨论，以提高教学效果。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我军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虽然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还是那几条，但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平原游击战等许多新的战术战法已相继出现，新战例、新经验层出不穷，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战争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为了使培养出来的学员能适应实战的需要，抗大除了抽调一部分水平比较高的教员，组成军事研究室，及时搜集、整理部队新的战例和经验，进行研究，编写新的教材，并举办军事教员训练班，提高教员水平之外，还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一方面组织军事教员轮流下部队代职，亲自参加战斗，如百团大战、关家垴战斗、公司窑战斗以及一九四一年的晋西北大破袭战，都有抗大的干部和教员参加。他们通过参加实战，总结出经验，然后带回学校讲课，就更生动实际。另一方面，则组织参观团、考察组下部队参观、学习和考察。一九三八年九月，军事教育科长王智涛同志就带领过一个“参观团”，先后到达晋西北、晋察冀的许多部队考察，到战场实地参观，并与广大干部、战士座谈，历时半年，既帮助部队总结战斗经验，提高部

队的战斗力，自己又学到许多书本上、课堂上学习不到的知识。他们回到学校后，立即整理新战例介绍和经验总结，并编写了一本《战术学》教材。这种来自战斗实际的教材，深受教员和学员的欢迎。

形象化教学是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好方法。当时教学条件很差，没有什么教具，有时连块黑板也没有。但是，教员仍千方百计想办法，自己绘制图表，搞点简单的模型。搞沙盘作业，没有正规的沙盘，就在地下堆土为山，划沟为河，插树枝为树，用石头、砖瓦、破碗代碉堡，剪了纸片当枪炮，照样搞出土沙盘，讲得生动形象。

抗大每一期学习的时间不长，内容又多，所以，在教学上特别强调“少而精”和“精讲多练”的原则。所谓“少而精”，就是在制定教学计划时，根据学员的不同对象，以及当时战斗中最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术，突出重点，使学员对应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在实战中能运用。所谓“精讲多练”，就是讲课时讲得精练、简明，使学员一听就懂，讲完即组织实际操练，通过操练又进一步巩固课目的学习内容。所以，当时野外作业比较多，每次野外演练，干部、教员都亲临现场示范、指导。在每期军事课目基本学完，学员有一定基础之后，学校都要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一、两次行军、野营或战斗演习，以提高学员的实际作战和指挥能力。

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第一期讲课时就曾教育大家：“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65页）从此，抗大便把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战斗中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办学，就是为了更好地结合实战进行训练。在总校二千五百里的长途行军中，他们结合实际情况，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各学员队进行了各种演练，既保证了顺利挺进敌后，又实际领会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

抗大通过教育训练，使学员真正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会运用灵活机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学员毕业后到部队去，给部队输送了一大批战斗骨干，也给抗大各分校和部队教导队输送了一批教学骨干。他们在抗日战争的各个战场、各个根据地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良好校风

毛泽东同志亲手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抗大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培养良好的革命校风指明了方向；也成为抗大教职学员养成优良作风，抵制歪风邪气的座右铭。

抗大的教职学员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也有工作、

职务上分工的不同，但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汇集在党的旗帜之下，形成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情同手足，亲密无间。这个革命的大家庭有着一个又一个的好“家长”。副校长罗瑞卿同志既严肃又可亲，经常与同学一起参加操课，一起打球和散步谈心，大家都亲切地称他“罗头”，很愿意接近他。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非常和蔼可亲，经常找干部谈心，关心大家政治上、工作上的进步，所以大家都乐意接近他，亲切地称他“老妈妈”，心里有话也愿意对他讲。他从不发脾气、训人，而是耐心地说服教育，具体地帮助。在生活上，校领导也从不搞特殊化即使是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大家也是同吃一锅饭，同穿一样衣。

抗大前后几任校领导干部对教职学员都十分关心、爱护。一九四三年十月总校开展整风运动时，由于康生大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干扰，反特扩大化，伤害了一批干部，特别是伤害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徐向前同志很难过，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映。当他接到党中央下达的纠正错误的指示后，马上召集干部会议贯彻，交代各大队尽快查清情况，给受到错误审查的干部平反，赔礼道歉，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回家过个愉快的春节。在大生产运动中，有的大队只抓生产，放松教育训练。徐向前同志从干部发展前途

着想，及时指出，抗大是学校，要抓好教育训练，不能只埋头纺线。很快纠正了这个偏向，使教育训练和生产都取得好的效果。

当时，上下级机关、上下级干部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十分融洽，谈工作、谈思想，都是赤诚相见，没有拘束，不存戒心。上级爱护下级，下级也很尊重上级。一九三九年九月，原驻河北灵寿县陈庄一带的抗大第二分校得知总校将要到来的消息，赶紧做好迎接总校的准备工作，加紧生产，种下四十六亩蔬菜，并派出工作团和一个学员队到敌占区边沿征粮，为总校储备好一千七百余石粮食。总校来到后，他们把种好的蔬菜和养的肥猪都留下给总校，自己轻装移驻新地区，再白手起家，重建家业，表现了高尚的风格。

抗大教职学员之间，亲如兄弟，情同手足，动人的故事，不胜枚举。一九三六年冬的一天，抗大第一期第二科一个学员队队长张进山同志，在一次敌机空袭中，为了不暴露目标，冲出窑洞去端火盆，不幸中弹牺牲。抗大为张进山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并献了花圈，表彰他为保护战友而牺牲的献身精神。还有一些南方青年刚到陕北，寒冬季节脚都长了冻疮。金沙同志怕同学冻坏了，把自己仅有的一床毛毯剪开，给全班每人做了一双毡袜子御寒。这种同志间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的感情，是那么真诚，那么无私！

新老干部之间，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虽然在军政素质、工作作风、生活习惯上不尽相同，有时也会产生一些矛盾，但大家都有搞好团结的愿望，能严格要求自己，互相谅解，互相支持。总校第五期学员队指导员周益宽同志是个知识分子干部，他在工农出身的队长主动帮助下，很快熟悉了基层工作，同时他们在工作中逐步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抗大在“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口号下，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知识分子干部在政治上很快锻炼成熟，工农干部的文化知识水平也很快提高。

抗大同志之间这种深厚的阶级感情，象一条无形的纽带，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紧密团结在一起。九年间，从总校到分校虽然编制、机构、校址经常在变动，干部调动也很频繁，在一个单位里，往往各个地区、各个部队的干部都有，可是大家都不搞宗派，不垒山头，为了革命事业而团结战斗，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整体。

抗大不仅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关系，而且有一个很好的军政、军民关系。总校及各分校主要是为部队培养干部，但根据地方党委的要求和斗争的需要，也经常担负短期培训地方干部的任务；有时还组织工作队

配合地方干部开展工作。一九四〇年秋，总校就曾抽调在职干部组成三个工作队，分赴晋中、豫北、冀西的游击区协助地方进行扩军工作。接着，又派出杨帆、孟进城、黎坚等一批男女干部帮助驻地附近的邢西县政府加强群众工作和锄奸工作，对巩固民主政权，加强根据地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也进一步密切了军政之间的关系。

抗大绝大多数同志都能自觉地遵纪守法，在总校和第一、二分校挺进敌后艰苦的行军途中，在反“扫荡”紧张的战斗环境下，有时吃不上饭，同志们宁肯挨饿，也没有人动地里的一棵庄稼。有一次反“扫荡”，张际春同志带政治部的干部在山沟里转了一天，粒米未进。队伍来到一个村庄，在一户老百姓家发现墙上挂着一串干菜叶，大家把这串菜叶煮一锅汤喝，聊以充饥。临走时，张际春同志叫人拿出二元边币挂在原处，作为赔偿，体现了我军秋毫无犯的群众纪律。

抗大对于个别违法乱纪分子的处理是十分严肃的。一九三七年九月，发生了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恋爱问题枪杀陕公女学员刘茜的严重事件。案发后，罗瑞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毛泽东同志很快作了批示，并于十月十日给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雷经天同志写了一封信，严肃指出

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一日）黄克功被开除出党并依法处决后，不仅在抗大，在延安，而且在西安、太原等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群众异口同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委罪，不枉法，公正无私，纪明法严，真是了不起。当时，胡耀邦同志在抗大校刊《思想战线》第一期上发表了文章，指出：“必须使我们全党知道，执行纪律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有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

黄克功事件之后，毛泽东同志还特地到抗大作了一次“革命与恋爱问题”的讲话，提出了谈恋爱必须遵守的三条原则，即“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和自愿的原则”，教育青年要严肃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培养无产阶级的理想与情操，杜绝类似黄克功事件的发生。

要把学员培养成我军的骨干，模范的军人，必须

从严格军事生活入手。所以，学员自入学的第一天起，就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培养紧张的战斗作风。开始，许多知识青年不习惯，甚至发牢骚、讲怪话。通过教育提高自觉性后，队列训练的热情高了，每周大队会操、节日全校检阅，队列动作都很整齐划一，威武雄壮。以后，全校又开展内务、卫生竞赛，逐项按学校制定的条令办事，一种良好的作风就这样培养起来了。

抗大的生活条件虽很艰苦，但大家都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朝气蓬勃，愉快活泼。当时抗大群众性的歌咏活动是闻名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从晨曦初照到星月当空，操场上、课堂里一休息就有响亮的歌声；特别是集会、上大课的休息时间，各个队之间互相拉歌，歌声此起彼伏，更是热闹。

各学员队的“救亡室”（即俱乐部）是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的组织者。他们负责编写墙报，教唱革命歌曲，组织文艺晚会和开展体育活动，把生活搞得很有生气。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三期第九队成立了“救亡室”。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得悉后，亲笔为他们题词：“九队的同志们：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唯有

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九队的同志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努力办好墙报，组织读书活动，召开演讲会、辩论会，开展生动活泼的课外辅导活动，帮助同学探求抗日救亡的真理，把学习生活搞得十分活跃，成为第三期最好的一个“救亡室”。

记得当时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也常参加文艺晚会，并演出节目。如：李富春和蔡畅同志合唱过法国的《马赛曲》；李先念同志也曾在群众的热烈掌声中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抗大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得很好，每个大队都有业余篮球队。抗大篮球代表队的战斗力很强，与兄弟部队比赛时，经常夺得冠军。朱德、贺龙和罗瑞卿等同志都很喜欢这支球队。除篮球外，排球、乒乓球、棒球和田径等体育活动也很活跃。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抗大在延安组建了“文艺工作团”。这是一支文艺劲旅。他们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紧密配合党的斗争任务，用话剧、京剧、活报剧、曲艺、歌舞等多种文艺形式，创作并演出了大量富有战斗性、艺术性的好节目，足迹遍及陕北和晋察冀豫边区的广大抗日根据地，在军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抗大文工团的战斗作用和艺术成就，为抗大赢得了声誉，增添了光彩。

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 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

“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这是《抗大校歌》中一句很重要的歌词，它表达了抗大同志愿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的献身精神，也充分体现了抗大的教育方针。为了培养这种献身精神，抗大一直把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作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考验每个教职学员和毕业同学的重要标准。

抗大为继承和发扬我军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坚持战斗。一九四四年春，抗大太岳大队被日寇围困在山西介休县的棉山上，处境十分困难。为了能坚持战斗和学习，开始他们组织小分队半夜里去袭击敌人，夺取粮食，后来敌人加强戒备，他们为避免无谓伤亡，保存实力，动员全队同志挖野菜，采树叶、野果，捕捉野猪充饥，个个饿得骨瘦如柴。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动摇逃跑，一直坚持到胜利，经受住一场严峻的考验。

抗大同志具有战胜困难的坚强毅力，更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历次反“扫荡”、反磨擦战斗中，都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

雄事迹。一九四二年五月反“扫荡”时，总校政治部机关指导员杜建龙同志在一次与敌白刃格斗中，曾拔出敌人捅进自己肚子上的刺刀，用尽平生力气猛向敌人的心窝刺去。当场把敌人刺死，但他也因流血过多，仆倒在地，壮烈牺牲。他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吓得周围的敌人魂飞魄散，一步也不敢靠近他的遗体。一九四三年秋，日寇对我晋察冀边区灵寿、阜平地区大“扫荡”，军区主力大部分转移外线作战，抗大第二分校也已返回陕北，仅留下陆军中学六百名师生，带领民兵坚持就地斗争。他们机动灵活地展开麻雀战、地雷战、伏击战，先后派出小分队袭击进占我陈庄、下庄、牛庄之敌，并取得老虎尖伏击战和赤瓦屋奔袭战的重大胜利，歼敌数百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地方机关和群众的安全，两次受到军区的通令嘉奖。可是，有一天陆中转移到栗树槽村时，不料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打了个遭遇战。在敌众我寡和地形不利的形势下，陆中的同志打得十分顽强，有的两腿被打断仍坚持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有的下颚被炸掉还顽强抗敌；有的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当三个敌人包围郑洪年同志时，他英勇地拉响手榴弹扑向敌人，把敌人炸死，自己也负了重伤，后为我打扫战场的同志救回，军区特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这次战斗，陆中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牺牲十四人、

伤十儿人但也歼敌数十人，打乱了敌人的搜山部署，掩护了荫蔽在附近山沟的数千群众和地方干部，表现出抗大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抗大的英勇牺牲精神是表现在各个方面的。当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发生矛盾时，都能自觉地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革命利益。这种崇高的精神也是十分感人的。在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反“扫荡”战斗中，抗大政治部的六位同志隐蔽在一个山洞里，正当敌人搜山靠近山洞的时候，上干科副科长赵玉珍同志的爱人程克同志即将分娩，如果此刻婴儿呱呱坠地，必然会引来敌人。在这战友们生死存亡的关头，处在临产前阵痛之中的程克同志，头脑仍然清醒。她恳切地要求身旁的同志说：“要保证大家安全，不能要这个孩子了。”这时，婴儿刚刚露头，大家只好噙着泪水把他掐死。为了战友，为了革命，程克同志怎能不作这最大的牺牲！

平时，抗大通过革命气节教育，使大家树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情操。一九三九年九月，总校挺进敌后通过同蒲铁路封锁线时，第三梯队遭到日军袭击，少数区队被敌人冲散，有的同志不幸被俘。在这生死考验的关键时刻，同志们表现得无比坚贞：指导员常柏等同志英勇地用砖头砸死敌人哨兵逃离虎口；有的在被敌人押送太原的途中，冒着九死一生跳

离火车脱险；赵德馨等六同志被敌人残酷地用铁丝把双手、耳朵贯穿在一起，押往太原，他们忍受着钻心的疼痛不吭一声，傲视敌人，宁死不屈，最后牺牲在敌人的刑场上。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反“扫荡”时，总校校部一部分同志被围困在老爷台山沟里，断了粮食，潘时伦同志（潘汉年同志的弟弟）自告奋勇下山搞粮食，不幸落入敌人魔爪。敌人从他身上搜出还没编好的稿件，知道他是抗大校刊的编辑，便千方百计利用汉奸、叛徒来收买他，逼迫他带路搜山，都遭到他的严词痛斥。他在引诱面前不动心，在刺刀尖下不低头，慷慨就义。

在抗日战争中，抗大同志英勇牺牲或壮烈就义的烈士数以千计。一九三九年六月二日，张际春同志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题为《抗大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奋斗的三周年》的文章，写道：抗大“它对民族国家尽了应尽的责任，三年来输送了一万多个以上的最忠实于民族国家与人民利益的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分布到各个战线上去与野蛮的日寇作顽强的斗争。他们与全国人民和全线的将士，一道儿为停止敌人的进攻，保卫自己的国土神圣的任务，拚着他们的头颅，流着他们的鲜血。周建屏、谢嵩、陈锦秀、胡发坚、张辛国、张向松、李密林、程源希、任一心……等同学已经先后成为我们民族的先烈了。”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抗大烈士的英名，是抗大之光，民族之光，将永留青史，永垂不朽！

抗大精神永放光辉

抗大，是沐浴着延安精神的春风雨露而成长壮大的。抗大的精神与作风，正是延安革命精神与优良作风的具体体现。随着一批批毕业学员的分配，把这种革命精神与优良作风传播到全国各地，生根开花，结出丰硕之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曾给抗大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赞抗大在校首长领导之下，“由于全体教职员的艰苦工作，由于全国各地来学的青年同学所养成之坚定勇敢活泼积极的校风，使抗大成为举世知名的培养救亡干部的最高学府。抗大培养出来的干部散布在全国许多地方领导抗战，更发扬英勇牺牲的精神，这是抗大校长、教职员与学生共同奋斗的成绩……”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同志看到抗大师生把延安精神与作风带到了太行山区，曾兴奋地说：“抗大越抗越大，雄赳赳、气昂昂，讲讲唱唱，歌声嘹亮，走到哪里，哪里变了样，把一二九师搞活跃了；办夜校、识字班，民兵训练，把地方也搞活跃了；参加政权建设，宣传选举，发动群众，

抗大的影响很好。”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陈云同志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到什么地方学习》的署名社论中，肯定了抗大教育训练的经验，指出：“抗战初期的抗大、陕公的训练方法，学生在学校只学习几个月，之后就去参加工作。他们在学校中不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是培养生气勃勃的革命作风。现在许多抗大、陕公毕业之后参加了工作的学生，已经在经验、能力和政治上都有了进步，这是正确的训练方法所获得的结果。”（《陈云文选》第184页）。

抗大不仅在国内受到普遍的赞扬，在国外也有很好的影响。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米勒、艾黎等到过保安和延安的国际友人，都参观过抗大，有的还在抗大作过报告，盛赞抗大取得的伟大成就。一九三六年七月，还在抗大创建初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了保安，访问过抗日红军大学，并向第一期一、二科的学员作了“英美对华政策”的报告。在他所著的《西行漫记》一书中，以《悬赏二百万元的首级》这样醒目的小标题向国外介绍了“红大”的情况。一九三九年九月间，斯诺又到延安，那时抗大总校已挺进敌后，他参观了抗大第三分校，拍下了抗大的“山边窑洞”、“背着背包的青年人步行投奔赤色分子”（指延安）、“陕北抗日军政大学的女毕业

生”等一批照片，再次向国外介绍延安“窑洞大学”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一九三七年，美国医生马海德从西安到了延安，抗大师生集会欢迎他。他在讲话中表达了对抗大的敬意，并赞扬抗大的革命精神。抗大，通过这些国际友人参观后向国外发出的通讯、报道、照片、书信，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把真实的情况报告给全世界人民和广大的反法西斯战士，让他们知道延安有这样一所“独特无二”的窑洞大学。

一九三八年七月三日，世界学联秘书长柯乐满（法国人，后为世界学联书记）和雅德（女，美国人）、雷克难（加拿大人）、傅路德（英国人）等四位代表远涉重洋，慕名来到延安，在抗大进行参观考察。他们参观了作为学员的宿舍、饭堂、书房的窑洞，组织了座谈、访问，观看了教育训练和文体活动，受到很大启发和鼓舞，诚恳地要求当一名抗大的名誉学员。抗大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会上，以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和校首长的名义，赠予四位代表以“抗大名誉博士”证书，并赠给抗大军服、领章、符号、毕业证章、军政课程讲义（有的还译成英文）和锦旗、草鞋等纪念品。柯乐满兴奋地致答词说：“今天抗大教职学员开这样一个热烈的欢迎会，同志们给我许许多多的礼物，尤其是艰苦奋斗的作风，这种最宝贵的礼物，使得我们感到万分的兴奋！抗大的事业——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的伟大事业，不但是中国青年应担负起的任务，而且也是全世界青年应担负的任务！”雷克难在致词中说：“我们到中国来是带来了全世界人民对于中国的深切同情，我们带回去的是你们英勇斗争的事实……我们对于中国青年的英勇奋斗表示了最大的敬佩。”在欢送大会上，雷克难又致答词说：“抗大赠给我们四个名誉博士的学位，我们已荣幸地做了抗大的学生了，所以我们说：昨天是学联派来的，那末今天是中国派出去的了……我们不但要完全负起应尽的义务，而且出校以后，应要严格遵守我们的伟大光荣的母校的校风校规。”

世界学联代表团回去之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柯乐满从巴黎给冯文彬同志来信说：“在青年大会的代表面前，我们的团员作了一个很详细的关于这次到中国视察和中国青年的斗争的报告。现在我们又组织了一个宣传团体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布鲁塞尔、荷兰的著名大学去，把中国青年的生活与战斗传播出去……”一九三九年六月九日，柯乐满又来电，代表世界学联二百万会员“向抗大三周年纪念致最热烈的贺忱。”

抗大在国内外的良好影响，对抗大的教职学员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抗大的革命精神与传统作风一代一代往下传。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形势、任务的改变，抗大总校挺进东北，组建了东北军政大学和四所分校；一九四九年七月又随军南下，先后改为华中军政大学和中南军政大学，并分设六所分校，共办了四期，培养训练了六万六千七百四十二名干部。与此同时，以抗大各分校为基础，先后组建了华北、华东、西南、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和许多分校。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间，还成立了七所航空学校和一所海军学校，并组建部分医务、通信和装备学校，培养了数十万名干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新的贡献。

建国以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继续狠抓军事院校的建设，把它作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件大事。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以原华北、华东军政大学为基础，在南京组建军事学院（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正式开学）；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以原中南军政大学为基础组建了武汉高级步兵学校，并亲笔写了“努力学习，保卫祖国”的题词。当时，周恩来同志曾明确指示：“军事学院的办校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方针；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贯彻执行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要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学习现代化科学技术。”所以，从一九五一年开始，随着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高级步兵学校等院校的先后创办，标志着我

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五十年代末，全军已经形成了包括军事、政治和专业技术院校在内的比较完整的院校体系。然而，在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全军一百四十七所院校砍掉一百零四所，使我军院校建设遭到了全面的、毁灭性的破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下，我军院校建设又得到恢复和迅速的发展。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同志在军委座谈会上强调“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提出“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要把原有的学校，除个别的外，基本上恢复起来。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并要求院校起到“集体政治部”、“集体干部部”的作用，“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邓小平文选》第58、59页）。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院校建设指明了方向。

* * *

抗大的历史虽然已成为过去，但是抗大与抗日根据地亿万军民用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用革命的、战斗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谱写出的英雄诗篇，将万古长存，并将长期地鼓舞、启发和教育后代永远向前。抗大的教育方针和培养人才的基本经验，对于今天军队院校或地方院校的建设，对于培养教育青年

一代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仍有极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抗大精神永放光辉！

注 释

① 这里指的是毛泽东同志为纪念抗大成立三周年而作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详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六月北京第二版）第84、85页。

② 东北四省指当时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先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占了热河。

③ 大后方：指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前线是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所以人们习惯称未被日寇占领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为“大后方”，以别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④ 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欺骗和控制青年的反动组织。一九三八年成立，一九四七年九月并入国民党。

⑤ 黄肅（黄乃）同志，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

宁都暴动档案资料选载

编者按：这组宁都起义档案材料，是中央档案馆研究室根据档案原件整理、选编的。这组材料共十四件，均未公开发表过，现刊登出来，供研究宁都起义参考。

刘伯坚致季振同、赵博生、
山宇、董振堂信^①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

振同、博生、山宇、振堂诸同志：

我代表红军以十万分热烈诚恳的敬礼，欢迎在中

① 本文标题是编者加的。

国革命中奋斗多年的诸位同志，来同红军共谋劳苦工农的解放；同时把将要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中国夺回来，交给全国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群众手中。这是何等光荣何等伟大的历史际会呵！

同志们，我看了你们给我的满含着血泪和革命热忱的来信，使我回想到我们过去在西北风沙中转战四千余里的三十万国民军，到如今都是百战余生，白白地牺牲了无量的热血，没有得到一点革命的结果！使我回想到诸同志朴质忠勇的风格，冲锋陷阵的无敌的英勇，同样的奋斗到如今，没有结果，反转成了诸同志在革命历史中的缺陷，要你们重新来补写，都只是因为政治上没有得着正确的领导。同志们，我们一别五年了，别后的辛苦不必尽述，我们现在又有机会在一起往前奋斗了。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幸，我应当为全国劳苦工农踴跃欢呼，庆祝中国革命成功的到来。

同志们，你们一字一泪，一句一条血痕的来信中说的万分沉痛的是：“现在我国民族将被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压迫得毫无生路，认清了只有共产革命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弟等同是穷人出身，同在重层压迫之下，……”使我相信诸同志彻底觉悟过去被军阀的愚弄和欺骗，明白了国民党代表封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压迫和剥削全国工农，造成了连年不断地军阀混战，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大水灾，并且断

送了东三省，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共管区域。帝国主义者进一步预备借口共同派兵维持中国秩序，实行瓜分中国。

同志们，国民党的罪恶已是尽人皆知了。全国劳苦工农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潮流，已经汹涌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解放而奋斗了。

我们同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铁蹄下的难民，同在重重叠叠不断地灾祸中挣扎。只有回来高举着苏维埃的红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作一拚命的死战，才能求得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统一。

同志们，我已将你们的革命热忱转告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负责同志，他们都十分热烈的企待着诸位同志前来，共同携手为革命奋斗，并要我代表他们的欢迎的热忱来同诸位同志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接洽一切。

相距不远，快晤在即，一切都俟面谈。这里我先向你们致一个热烈欢迎的革命敬礼！

刘伯坚（签字）

一九三一，十二，七，于瑞金

**刘伯坚致季振同、
董振堂、赵博生信**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①

振同、振堂、博生诸同志：

卢同志^②本晚抵此后，接读来信^③，使我为中国革命庆祝不已！除与卢同志面商一切请其转达外，我代表中革委会分别答复如下：

一、由我转请中革军委会委任季振同同志为工农红军第五集团军总指挥，董振堂同志为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同志为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同志为工农红军十五军军长。

二、季某必须解决其他中级官中的反动分子，由诸同志斟酌解决。但请注意反动分子不在暴动时解决，

① 此信原件是刘伯坚同志的亲笔，无成文时间，判断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二日之间写的。标题是编者所加。

② 即卢寿椿。

③ 此信未查到。

以后便难于解决。同时他们在暴动过程中及暴动以后，都可以发生反革命作用，因此在暴动时必须很坚决的解决他们。胡岭咀东山坝已布置相当的兵力，会同与安福两点更有强固的兵力的配置。

三、暴动时间必须在十叁号拂晓。因为此事的发动，到十叁号已有八天，为时已久恐被泄漏，多延长一分钟即多有一分钟发生危险的可能。同时，来信被田口一带的政府拆阅了，并有人传说你们同红军接头，这里虽下了戒严令，不许人出境，但难免消息终不泄漏。依照我们及革命历史上的许多暴动的经验，必须在抓住可能的条件后很坚决的说干就干，不容有丝毫犹豫，否则时间愈益延长，暴动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难免不起变化，到时顾虑更多，甚至发生危险，千万请采纳我的意见。

四、暴动开始后，每分钟都要有进攻的行动和取得胜利。你们在解决某几部后，拿几句简单的鼓动话（如要回北方只有当红军……）把士兵带出城，到指定的地点驻扎。这不仅是恐怕时间过久敌人的飞机来袭，最主要的是，暴动胜利后把部队留着不动必然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你们对某几部分虽然有把握，可以战胜他们，但你们不用胜利后的威势挟持他们到苏维埃区域，坚决他们的革命行动，难免不在非常情况之下，稍一休息就发生犹豫和动摇，特别是住在环境复

杂不便作战的城市中，更不能有片刻停留。

五、你们应依照群众的心理提出政治口号，特代拟口号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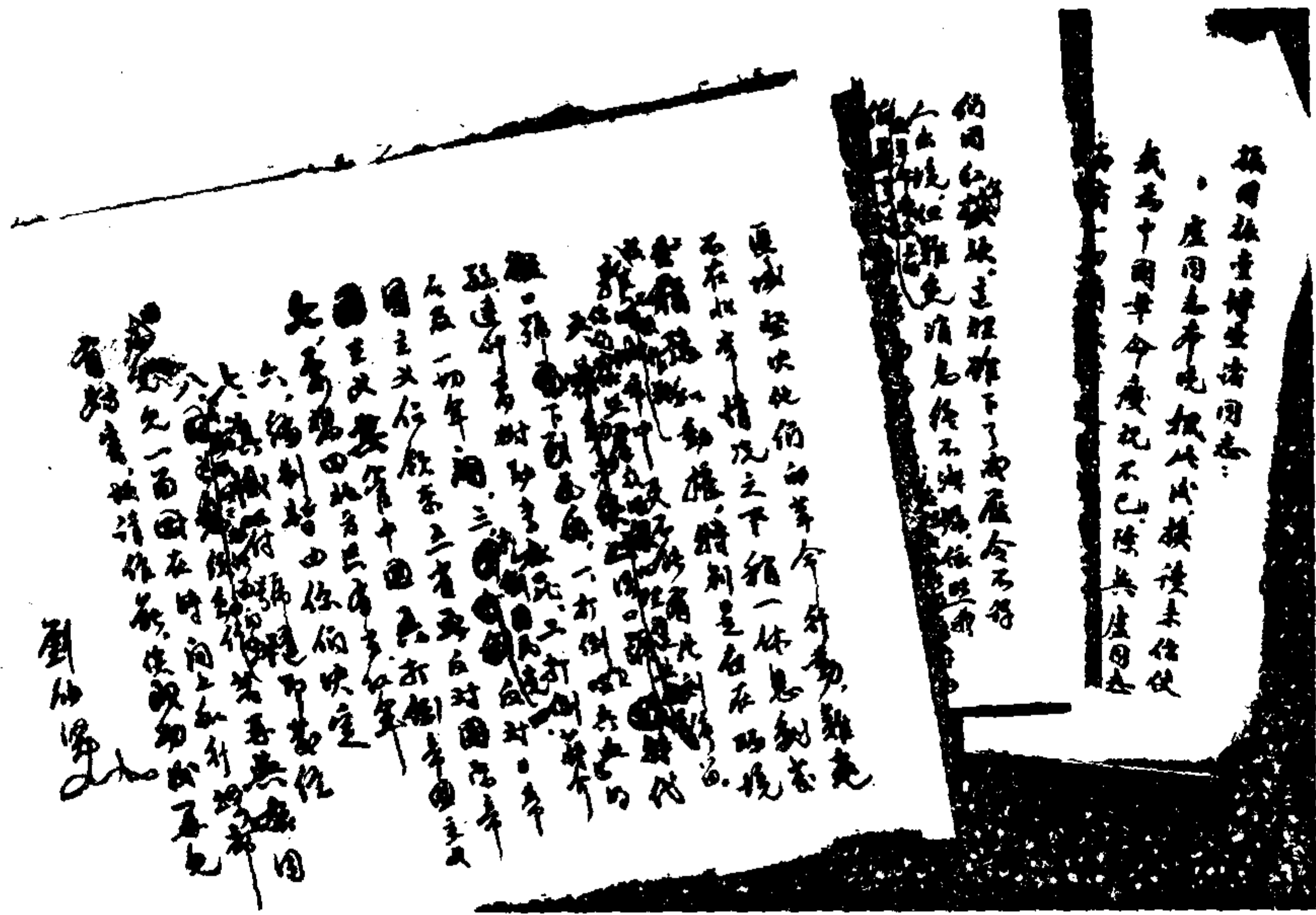
1. 打倒“喝兵血”的孙连仲、高树勋、李松崑！
2. 打倒蒋介石及一切军阀！
3. 打倒国民党！
4.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
5. 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共管中国！
6. 打倒帝国主义！
7. 要想回北方只有当红军！

六、编制暂由你们决定。

七、旗帜符号随即发给。

八、我与振同同志晤面问题。因为急须动作，若再与振同同志先见一面，在时间上和行踪都有妨害，故请作罢，俟成功后再见。

刘伯坚（签字）



红十二师陈光、赐凡的一封信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①

职师全部于本日午前七时向会同攻击，敌系七十三旅之第二营两连兵稍抵抗即退回宁都城去了。俘虏

① 本文原件无收信人，标题和年月是编者所加。

敌兵六名。据说情况与前同，对士兵生活的苦楚说得透彻。我们派去宁都便衣侦探和游击队接近敌人工事，他即向我们射击，并增加部队到工事里来。同时城内城外附近无甚动静，这样看来宁都好象还未发生变化一样，究不知如何情况。

我们在宁都未变化以前即在会同停止对石上、头陂、驿前警戒，并派出便衣侦探游击出去，游击探敌情，对宁都敌人即向他严密防范监视。我们明天拟率一连兵接近宁城附近去侦察情况，同时在宿地附近做工事，并派侦探游击队去头陂、驿前游击侦察，若宁都变化了即看情况去决定我们的行动（遵你所示，各款若不变化即在此地停止，待你的指示），请速来示，并祈将此信转知林军长罗政委^①为盼。

陈光、赐凡

十三日午后五时 于会同

^① 即林彪、罗荣桓。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①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全国的工人们！农人们！白军的士兵们！

我们要用革命的呼声向你们号召和表白：我们原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受国民党蒋介石的压迫，开到江西“剿共”。但是我整个两师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红色的江西彭湃县城（即旧宁都县城）实行革命的暴动，消灭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反革命的军官，扯毁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高举着苏维埃的红旗，加入工农红军，编为中华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了！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统一。

^① 这个宣言是刘伯坚在起义前夕起草的；一九三二年三月十日中央苏区将宣言送到上海党中央；同年三月十七日党中央复抄存档；现按复抄存档件发表，并据刘伯坚的亲笔原稿进行了校正，校正处加[]号，以示区别。

全国的工人们！农人们！白军的士兵们！

我们都是穷苦工人、农人和受压迫的出身，原在北方国民军服务，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加入了国民革命的战线，参加北伐，不久即受国民党军阀的背叛而失败了。我们从此以后，就卷入军阀混战的漩涡中间，血战了四年之久，百战余生的我们，得到了什么？热血洒遍了全中国的数百万白军士兵，又得到了什么？

我们转战南北，奔驰万里，眼见得全国劳苦工农宛转呻吟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重重压迫之下；眼见得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国民党军阀到处血淋〔淋〕的屠杀工农和共产党员，拿血腥来维持他日益崩溃的统治；眼见得重重叠叠不断的灾祸，随着军阀混战和国民党高度的剥削，降临到全国劳苦工农的头上；眼见得军阀克扣军饷“大喝兵血”，去过他们军阀官僚的生活。

我们早就忍无可忍了！但我们同样的受着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得不到意志上和行动上的自由。在今天以前，我们所感受的压迫的深重，与全国的工农是一样的，还蒙了反革命军阀的军队的恶名，为工农群众痛恶。我们现在坚决的暴动了，脱离了国民党军阀的压迫，从今天起，我们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为工农的解放奋斗到底。

全国工人们！农人们！白军的士兵们！

我们从军阀高级的反革命长官同蒋介石勾结一起，逼迫我们到江西“剿共”，逼迫我们进攻我们最亲爱的兄弟——为全国劳苦群众谋解放的工农红军，用各种诬蔑造谣的话来欺骗我们，使我们自相屠杀。可是半年以来，我们在苏区亲眼看见的事实，把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对于共产党和红军的造谣诬蔑或不满宣传，完全看穿了，眼看苏区工农兵确实得到了解放，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劳动法的保护，士兵得到了解放为自己为工农阶级的利益打仗；眼看见共产党和红军确实受着苏维埃区域千百万劳苦工农热烈的拥护，帝国主义嗾使国民党军阀三次进攻苏维埃区域，就在共产党的领导、红军的英勇、群众〔的〕拥护之下，一次一次的遭受着极大的惨败。我们明白的看见，在中国有新旧两个世界：一个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旧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灾祸、死亡、和封建式的压迫剥削；另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红军工农群众新开辟出来的苏维埃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完全消灭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封建地主的统治，实行了土地革命，工农兵掌握着政权，取得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一切的政治自由。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统治下，现在正闹着全国规模的大水灾，有一万

万灾民，死亡无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东三省，法国帝国主义出兵云南广西，英国帝国主义正在向西藏四川进攻，国际帝国主义要实行瓜分中国，并准备向帮助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苏联进攻。最可恨最可耻的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就用“无抵抗主义”的投降政策，对反帝运动就用尽欺骗屠杀的方法来压迫反帝高潮，掩饰他出卖中国民族的行为，让帝国主义一步步瓜分中国。

起来！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就首先要打倒勾结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起来！一切和我们过去一样受痛苦，一样受压迫的白军兄弟们！国民党军阀，一切什么“救党护国”“爱国家爱百姓”的口号，都是欺骗你们为他送死，你们再也不要受他们的欺骗与压迫了。你们的出路只有和我们一样，掉转枪头，杀死压迫你们的反革命的长官，实行扯起红旗来做工农革命，这样才能够消灭军阀混战，消灭军阀压迫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取得全中国的独立与和平统一。起来！不为地主资产阶级打仗，而为解放全中国几万万被压迫的工农兵打仗，不替军阀争地盘作帝国主义的走狗打仗，而为中国真正独立与和平统一打仗。

我们高举着苏维埃的旗帜，高声喊起〔号召〕你们，站在苏维埃的新世界这边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

中央政府已于十一月七号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正式成立，通过了苏维埃的宪法、劳动保护法、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红军问题和红军优待条例等等，保护工农兵利益的决议案，并已在实行了。

看呵！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国民党改组派的广东政府以及一切反动军阀的统治，都迅速的崩溃日趋灭亡，苏维埃政权却日益巩固和扩大。这两个政权的对立与消长，明白的指示出我们全国工农兵的出路，只有在苏维埃红旗下奋斗；明白的指示出苏维埃是解放全国工农兵唯一的政权，也就是工农兵自己的政权。我们高呼：

1. 打倒国民党！
2. 打倒“喝兵血”的孙连仲高树勋！
3. 打倒蒋介石一切军阀！
4. 打倒改组派第三党及一切反革命派！
5.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
6.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7. 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8. 武装拥护苏联！
9. 坚决实行土地革命！
10. 拥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11. 拥护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
12. 拥护共产国际！

13. 工农兵解放万岁!

14.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 季振同

副指挥兼十三军军长 董振堂

十四军军长 赵博生

十五军军长 黄中岳

暨全体指挥员战斗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于江西彭湃县

二十六路军革命士兵委员会

敬告全国士兵兄弟书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全中国的陆军海军空军以及民团警察的士兵兄弟们:

亲爱的兄弟们! 我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全体士兵兄弟二万七千余人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当红军进攻宁都头陂的时候, 全体大会一致议决杀掉反动长官投降〔入〕红军。现在我们已经占领了抚州, 决定立即攻击南昌。今天(十二月二十二日) 我们开大

会的时候，决定将我们的意见报告全国的士兵兄弟们，希望各地的士兵兄弟接到我们的报告后，立即开会庆祝我们二十六路军的兄弟找着了出路，得着了解放。更希望你们高举红旗象我们一样杀掉国民党反动的长官投向红军中来，我们正准备来欢迎你们。

亲爱的兄弟们！我们为什么要反叛国民党投向红军呢？

第一，自从国民党统治了中国之后，“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些口号是专门弄来欺骗群众的東西，事实上是与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一样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看哟！工农兵收回的汉口、九江的租界，国民党交还帝国主义去了；群众血流成河尸集如山的济案、汉案、宁案等，国民党反转向帝国主义赔款道歉，象这样的事情说起来不知道有多少。因为国民党一贯的投降帝国主义，引起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兄弟们！你们听到的最近东三省是整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夺去了，国民党是怎样对付的呢？

“信任国际联盟”，“镇静，不抵抗”，反将天津交国际共管，锦州到山海关划为中立区。此外法兵进攻广西、云南，英兵进攻西藏川边，国民党是假装没有看见。兄弟们！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已经够了，我们的劳苦兄弟是成千上万被屠杀了，我们的土地和城市是被占领了，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你们没有看

见么？许多工人、学生、贫民、兵士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是采取的什么手段呢？屠杀，监禁，拘捕，驱逐。我们已经明白了，国民党平常要我们“为国为民”，才是为的帝国主义的“国”和地主资本家、军阀官僚这些人〔的〕“民”。同时我们在“剿匪”的时候，看见只有苏维埃红军才真正是帝国主义的对头，许多牧师走狗被驱逐了，帝国主义的工厂、银行、矿山、铁路被没收了，在苏维埃区域一切帝国主义的力量被推翻了。兄弟们！中国目前不打倒帝国主义是会亡国灭种，要打倒帝国主义必先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只有苏维埃才是真正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主力。兄弟们！起来！起来同工农联合自动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帮助苏维埃红军，实现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

第二，年来国民党的忠实同志间，因为英、美、日这些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市场，和他们争地盘权位的冲突，说这个反动，说那个是军阀，不知道打了多少仗：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康、蒋阎冯战争，粤桂战争，……兄弟们！我们都是受他们欺骗参加这些战争的。我们回想着这些战争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士兵们的肉身拿去挡大炮、机关枪、毒瓦斯，打死了的尸无人收，打伤了的没有医药，痛死拖死，幸而没有死伤的，是过的地狱一样的生活。打了胜仗是国民

党军阀当大官，发大财，多讨几个姨太太，多修几座洋房子，我们士兵兄弟还是“十块零五”，顶多两块钱的奖赏。打败了呢？国民党军阀下野，有钱出洋住租界，我们士兵兄弟是缴枪，脱军服，搜腰包，遣散，滚蛋。我们还要看到，中国因为国民党军阀连年的混战，几千万里的生产是破坏了，战场的同胞房屋焚毁了，粮食没收了，妇女被奸淫，少壮被俘虏，老弱被践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城市是物价高涨，金融混乱，交通破坏，工商业破产。兄弟们！这些恶魔——国民党军阀为帝国主义争市场，为他们争地盘夺权位，不知断送多少士兵兄弟，害死了多少工农同胞，打来打去。据报载这些魔鬼又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听说通通在南京开什么四中全会。兄弟们！他们权利冲突的时候，互相火并；利益一致的时候又和平共居了，他们的戏法正多呢。兄弟们！要防备着，他们正在准备新的战争，你们不要再作他们的炮灰，再上他们的圈套。只有苏维埃红军的胜利才能消灭军阀战争。因为苏维埃没有帝国主义的势力，没有封建势力，也没有军阀，他们都是为工农利益而斗争，根本说不上个人权利的冲突。来！兄弟们！大家一齐到苏维埃红军旗帜之下来。

第三，今年的水灾真是骇死人，十六省的地方变成“灾区”，四分之一的同胞变成“饿殍”。这样大

的灾荒真的是“天灾”么，不是的，乃是人祸——帝国主义、国民党制造出来的。国民党、帝国主义把同胞们最后一滴血都括〔刮〕削去了，农民那有钱来防止灾荒，国民党又把修水利筑河堤的钱通通装进腰包，湖北建设厅长刘文岛侵吞筑堤经费五百七十万，江苏建设厅长王柏林侵吞治河款子三百五十万，这样的例子各省都是一样，又怎样不发生灾荒？兄弟们！骇人的灾荒发生了，国民党又怎样办呢？（1）借名救灾大向帝国主义卖国借款，来肥家入己和扩充战费；（2）假仁假义募捐赈灾，党国要人发了大财；（3）宣布维持党国秩序，残酷地屠杀、驱逐和鞭打饿死冻死的灾民同胞；（4）千百种苛捐什税压榨在没有饭吃、衣穿、屋住的灾民身上；（5）帝国主义呢乘机借款，趁火打劫，利用灾民要借钱恢复耕种，经过银行钱庄实行高利贷的剥削。兄弟们！我们在国民党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灾荒是必然要产生的，望他们救济吗，回答的是子弹、牢狱、棍棒。兄弟们！几千万的灾民将要饿死冻死，再不能等待了，我们要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阀压迫灾民的命令，我们的枪弹、刺刀要帮助灾民同胞分粮食、抢米的斗争。起来！兄弟们！用他们发给我们的枪弹、刺刀送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吸血的魔鬼到地狱中去，这些禽兽生存一天，我们劳苦兄弟多在地狱一天。大家看呵！苏维埃下面解放的农

民是没有灾荒了。国民党军阀不是要我们作征发队去夺取农民的粮食吗，兄弟们！我们的枪是有眼睛的，这眼睛是时常望着工农兵士的敌人去瞄准，再不要象过去那样傻了，帮豪绅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当走狗，去屠杀自己的兄弟。兄弟们，睁开眼睛做走狗，“不是人”，明知是出路不去奋斗“是奴隶”！

第四，我们是北方的军队，今年春间蒋介石调我们到江西来“剿匪”，那些宣传员时常向我们宣传：这里的红军即是“共匪”，“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起初我们还不相信，而我们那些长官也是这样向我们讲，我们想北方人断不至欺骗北方人，及至与红军作战的时候，我们就很奇怪，红军既然那样的坏，为什么所有的群众却帮助他们呢？又看很多红军贴的“穷人不杀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标语，更加怀疑起来，问我们的长官，就是一阵臭骂，马鞭子。过后几个俘虏兄弟的来信，才把这闷葫芦打破了，红军、苏维埃与他们说的完全相反。红军是工农阶级的武装，在他得到胜利的地方，农民分得了土地，不完粮税，不还账了，工人加了工钱，改善了生活与待遇，再不受东家的压迫了，红军分得了好土地，还有人帮他耕种，红军内的生活，官兵一律平等，没有官长的打骂与压迫，有些红军士兵居然做起苏维埃政府的委员。我们得了这些消息非常高兴，认为只有加入红军才是出路，

但又不相信那有这样的军队和政府。七月间我们派了三个代表开小差去侦探，他们转来的材料更多，尤其当报告他们看见赫赫大名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士兵一样的穿草鞋着布衫，同士兵一般儿吃饭睡觉，我们竟不顾环境欢笑起来！最近听说红军要进抚州，我们一致主张响应他们。十六号早上发动，当天下午与他们会合。说也奇怪，当我们杀掉反动长官打出红旗之后，几十万的群众都来欢迎我们，带了很多的东西来慰劳我们，同我们在白军的时候截然不同。三天之内有三千多兄弟得着五亩好田和耕具到广昌、宁都等处耕田去了，二千多兄弟得着十五块到二十块大洋回家去了，七百多兄弟得着工具作工去了，一百三十七个兄弟选到苏维埃办事去了，这些都是他们自愿。我们仍然参加红军，但也分得三亩好田，二千多伤病疲劳的兄弟被工农兄弟接到他们家里休息去了。兄弟们！我们现在已经找着了出路，得着解放。你们呢？还是同我们十天以前一样，半年没有关饷，吃的是稀饭，还没菜与盐，这样冷还没有棉军服。军棍、马鞭子、娘卖尻，这是长官时常给与我们的恩典。兄弟们！国民党军阀真的没有钱吗？国民党向帝国主义卖国借款和在工农身上每月剥削来的几千万血汗，〔到〕什么地方去了？大部分装入了腰包（日本抄没张学良的金条有八万万，蒋介石存在花旗银行有一万万五千万，其他的那

一个不是发了财) 或用在兵工厂, 买飞机、毒瓦斯准备进攻红军。起来, 兄弟们! 起来打倒这些“吸血鬼”, 拿子弹、刺刀回答他们, 一致向我们的安乐窝——红军苏维埃——中去!

兄弟们! 我们不要再做国民党的“杀人机器”, 我们再也不当豪绅地主、资本家、军阀官僚的走狗和奴隶了, 起来! 赶快起来!

打倒残暴凶横的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

工农兵士自动起来驱逐帝国主义的势力滚出中国!

打倒投降帝国主义压迫反帝群众的国民党!

反对军阀战争, 消灭混战的祸首——国民党各派和帝国主义!

反对国民党压迫灾民, 帮助灾民分粮食抢米的斗争!

打倒制造灾荒和压迫剥削灾民的国民党及帝国主义!

反对进攻红军, 不打红军, 杀掉反动长官, 拖枪到红军中去!

拥护工农兵士自己的苏维埃政权, 推翻国民党政权!

拥护工农兵士的红军, 帮助红军, 消灭国民党的白军!

反对克扣军饷, 威胁长官关饷, 补欠饷, 发棉军服!

不关饷就不下操, 不放哨, 拒绝一切勤务!

打倒剥削士兵，压迫士兵的国民党军阀，拥护官兵生活一样的红军！

拥护土地革命，全中国苏维埃红军胜利万岁！

工农兵士的解放万岁！

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

工农民众与革命兵士兄弟大联合万岁！

中国红军中央军第五军团全体战斗员大会发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点钟 于江西抚州

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为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兵士投入红军

告 全 国 兵 士 书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全国被压迫的兵士兄弟们！

苏维埃的旗帜，红遍了江西，红军的伟大胜利，推醒了全国的兵士，现在宁都两万的兵士们（孙连仲部）又投到红军中去了！他们从此脱离了国民党的地

狱，作了苏维埃革命的红色战士。

被压迫的兵士弟兄们！看一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看一看国民党和我们自己。

苏维埃政府，是帝国主义的死敌，他不让帝国主义杀我们一个兵士，不让帝国主义夺我们一寸土地，他动员全体红军，号召全国工农群众，武装起来，与帝国主义奋斗到底，驱逐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

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儿子，他将东三省送给了日本，将天津、锦州送给了帝国主义管理，屠杀反帝民众，不准兵士抵抗，将我们送给帝国主义打靶子。

弟兄们！你们要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不让它屠杀我们的兄弟，不让奸淫我们的妻女。那么，就快快的开步走，投到红军中去，托起枪来，向帝国主义国民党瞄准射击。

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兵自己的。每个红军都分得了土地，每个红军都是平等的，每个红军都有管理苏维埃政府的权利。苏维埃的红军战士，是为争取自己土地革命的利益，去进攻我们的仇敌——帝国主义国民党。

国民党政府，是地主、军阀、资本家的。当兵的永远是饥寒交迫的奴隶。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兵士，是替国民党军阀争权夺利当炮灰，拚性命，保护他们的金钱、小老婆，强着我们杀我们自己的兄弟。

弟兄们！要得到我们自己的政权，解放我们自己

的痛苦，那么，就快快的开起枪来，枪毙那些压迫我们的“灰孙子”（国民党军阀），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展开斧头镰刀的旗帜，去到红军的队伍中去。

苏维埃政府，动员了苏区的群众来欢迎我们宁都的兵士，数十万红军，将他们作为自己亲爱的兄弟。广大的工农群众，与他们开着联欢会议。两万的弟兄们，打断了国民党的锁链，得到了自己的政权，脱离了饥寒死亡，得到了自己的土地，解放了奴隶生活，作了革命的战士，他在苏维埃领导之下为土地革命坚决奋斗，走上了光明的道路！

全国被压迫的兵士们，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上海的工人已经起来罢工，全国的学生都起来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到处的兵士起来哗变，继续宁都弟兄哗变到红军中去。大家高呼：

哗变到红军中去！打倒国民党！驱逐帝国主义！

哗变到红军中去！拥护苏维埃临时政府！取得我们自己的土地！

哗变到红军中去！与革命的工农群众一起努力！他们等着欢迎你们的！

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红军 总 司 令 朱 德
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央苏区红五军团全体战士
答复反革命军阀孙连仲、高树勋
并告全国工农兵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

我们红军五军团全体战士用革命的言词，揭破反革命军阀孙连仲、高树勋派来飞机散发传单의 欺骗，说我们盲目加入红军；同时号召全国劳动士兵一致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的欺骗和压迫，推翻国民党反革命的统治，并打倒他们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

我们过去久在冯玉祥系军阀孙连仲、高树勋等欺骗压迫之下，来被驱逐到江西“剿赤”。以前转战于直隶、内蒙、甘肃、青海、陕西、河南、山东各地，自南口退却东出潼关、彰德回师回至青海，风尘万里从役五年黄沙白草之间，遍洒着我们三十万士兵的鲜血，得到了什么代价！

冯系军阀欺骗我们说：北伐成功，士兵有地种，有衣穿，有饭吃。及至第二次北伐打到北京，我们肩着一枝枪去，又肩着一枝枪来，还得了什么呢？一直

到现在孙连仲作青海主席，我们士兵每月一元五角伙食费，孙连仲除了他自己规定主席应得费五十余万之外，对青海番地两处回番教主活佛收贿不可数记。他在这时候，纳了满族帝制余孽流落宁夏的大哥〔阿〕哥的孙女做姨太太。奢逾王侯，自比驸马。我们士兵连年在战争中满身的血腥，只换得孙连仲个人的富贵和他姨太太脂粉的香气。

孙连仲驱使我们镇压甘肃回族的革命暴动，屠杀回民三十万，高树勋从血淋淋的刽子手那里，还从中渔利，任意敲榨回民，取得清乡费三十五万元。

前年冯阎倒蒋的军阀混战，单是我们第五^①的士兵伤亡了三千余人。死了的横尸遍野，伤了的没有药治，活着的没有饭吃。在败退新乡的时候，孙、高两军阀又把我们卖给天天呼着要打倒的大军阀蒋介石，私得投降费四十万元，还是万分无耻的欺骗我们说是走曲线革命。

驻军济宁，用高抬市价的伎俩，迟滞南开江西“剿赤”的日期，在开拔前先使郭道培率兵六连半途假变，一般佯装表示对我们士兵不愿南下的同情，另一面孙连仲又得了蒋介石给他个人的开拔费六十万元反江西清乡督办、江西主席、二十六路总指挥的地位，

① 此处疑有漏字。

要驱迫我们与为全国工农谋解放的红军自相残杀。

孙连仲到江西后，向蒋介石要求发给我们三万余士兵的米津，每人每日二元，共数六万余元。他自己每月中饱五万元外，还有每月特别费五万元，一同进了孙、高两军阀的腰包。

二次“围剿”红军，我们在中村失败。孙、高至死难悟这是军阀自取灭亡，反怪士兵作战不勇。红军放回我们，反被孙、高开革监视，进退无路。高树勋掩饰他的失败，假回南京领我们的月饷二十万元，最后把我们改名换姓，重新编入队伍，作了赚钱的资本。

一次驻军宁都，我们士兵患病的有五千余人。孙连仲克扣蒋介石交来的一大笔医药费，购买假的金鸡纳霜，增加我们的病症。每天病死的有二十人之多，宁都、宜黄、抚州、南昌四处先后病死的两千余人。

我们患病的要求送往后方抚州医治，还不引起孙、高的注意，冒暑带病药食俱乏，孙这时候还命李强迫病兵开走塘，一天之内自有十二人。

我们亲眼看见，未死的病兵遭了活埋，还在棺材里说话：两个死人装到一个棺材的或抛尸野外，多报烧埋费。当时在抚州的病兵三千人目睹，心里呼无门，悲愤之极，扶病组织“天理良心委员会”，对外陈诉苦况，曾写信请救。以前十四旅长现在红军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同志主持公道，一字一泪，一句一条血痕

信件，现在还不忍卒读。

孙、高两军阀，今天借口养病，转回京沪取药；明天借口开会，游逛南昌嫖赌。王广建团长同千余官兵的伤亡，值不得高树勋一点悼惜，不得停止他的昼夜浪赌。五千病兵的转运费，还不到〔够〕孙、高姨太太〔去〕杭州、庐山避暑游玩之零用（每月零用一万元）。他们姨太太坐的汽车，都是拍卖我们全体士兵投降蒋介石的所得见面礼。

万恶无耻的反革命军阀孙、高两人，屡次拍卖我们的生命，大喝我们的血，拿我们来发了财升了官，供他们自己的淫乐，不顾我们的疾病，不问我们的死活，我们早就忍无可忍，要起来打倒他们，苦于无人领导。

去年十二月季、赵、董、黄诸同志引导宁都兵暴，把我们从恶梦里惊醒了，把我们从军阀敲压之下解放出来。捉起了反革命的六个团长两个旅长，可惜李松昆逃脱。孙、高两军阀早就到上海享乐，没有活捉他们，出一出数年的冤气。

万想不到孙、高两军阀还有脸散传单说话，要我们回去当他们的士兵，作他们的私人的工具。要〔还〕挑拨离间地说：不说〔怪〕我们，只怪季、董、赵、黄。

我们不是瞎子，不是聋子，更不是呆子。季、董、赵、黄诸同志引导我们来当红军，编为红军第五军团，我〔们〕有眼看见，有耳听见，有脑子可以明白：红

军是工农的武装力量，红军中官兵伙一律平等，与军阀军队专替某一个人打仗，还受着很利〔厉〕害的压迫完全不同。我们到苏维埃区域月余，经过的地方三百余里，我〔们〕看见贫苦工农都真正得到了解放，工人增加了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分了田地，都有衣穿，有饭吃，与充满了饥荒灾祸杀戮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区域完全不同；我〔们〕看见许多共产党员革命的无限忠实，吃苦耐劳和勇敢，与借军阀赚钱做官的国民党员完全不同；我们又看见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各地苏维埃的负责人员都是〔为〕工农办事，都很勤苦努力，真正能代表劳苦群众的利益，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各县政府的主席委员都是军阀官僚政府，只知剥削压迫人民，不替人民做一点好事，完全不同。

所有这些一切不同的情形，使我们感觉得当兵多年，到如今才真正找得出路。我们过去在军阀混战中间，打得头破血流的打了几年，白做了军阀的炮灰。现在为要^①而打仗，过去冯、阎、蒋各派军阀，都假谈革命，欺骗着我们打阎联阎，反蒋投蒋。如今冯玉祥系的军阀又与蒋介石合作了，我们再不上一切军阀一切假革命反革命的当，吃他们的亏。我们永远站在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旗帜之下，为全国工农劳苦

① 此处疑有漏字。

群众争解放，奋斗到底！这就是我们对孙、高两军阀的
回声，也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誓词。

全国的工人们，农人们，白军的士兵们，快快起来
团结与我们在一起实现我们的口号，反对帝国主义
瓜分中国。

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保护苏联，实行土
地革命，扩大铁的红军。

拥护苏维埃中央政府！

拥护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万岁！

工农兵解放万岁！

五军团全体战士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

中 革 军 委 关 于 调送一批本地战士给五军团的命令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于军委）

现在第五军团（第十三、四、五军）新成立，里

面的同志都是北方人，才到江西，言语不通，不特不能做群众工作，连采买也感觉到困难。为此，决定由各军及各独立师每个伙食单位内，调出一个战斗员，到五军团去帮助他们工作，并要在里面起革命作用。着各部于接到此令后，即刻由各伙食单位内选出一个战斗员，要共产党员或团员，身体壮大，言语普通，能做群众工作，能采买，并有宣传鼓动能力的，随带全副武装，到各该军部集中后，即由各该军（或军团）指定一人带领前来杨溪本会，以便转送第五军团工作为要。

此 令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王稼蔷(祥)

彭德怀

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一、三、五军团 分编问题给各级政治委员的指示信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

一、三、五军团各级政治委员、各级政治部：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把五军团分编。五军团

三个军分开，以十四军编入三军团，十五军与四军编一军团，十三军与三军编五军团。这个决定是有伟大的意义，各级政治委员与各级政治部必须照下面的文件在一、三、五军士兵群众作广大宣传与解说工作，尤其是要使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能够起领导作用，向士兵做更大〔多〕的解说，使士兵彻底明了这种分编的意义。解说方法除开会和集合讲话外，还须开共产党的干部会议等。

一、三、五军团分编的意义（宣传要点）：

1. 去年宁都的土〔兵〕暴产生了红军第五军团，增加红军的一支主力军，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记载了一段光荣的历史。宁都暴动给摇动的国民党统治一个大威胁，影响了军阀军队的广大士兵，促进白军兵变潮流。

2. 在五军团成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革命士兵的拥护之下，洗刷了大批的反动官长，实行了本军团的混编，成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发展了共产党的组织，士兵的阶级觉悟与革命认识大大增加，军阀制度大大破坏，第五军团已经成为工农红军了。

3. 但是红军第五军团的历史不久，红军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在红军中作战的经验还没有，行军宿营也感受一些困难，所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混编是有伟大意义的。

4. 一、三、五军团分编对于五军团有莫大的帮助:

(1)帮助五军团建立红军制度。红军一、三军团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军，他有长久的艰苦的斗争历史。五军团各军分〔到〕一、三军团，分编更能帮助五军团肃清军阀制度的残余，提高士兵对革命的认识，建立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建立整个红军制度。

(2)帮助五军团学习群众工作。一、三军团具有长久的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可以使五军团同志学习怎样发动群众工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与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一、三军团能帮助五军团学习做筹款工作，此外一、三军团帮助五军团做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原有的五军团很快的得到补充与扩大。

(3)帮助五军团解决行军、宿营、作战中的困难，五军团的指挥员、战斗员都是北方同志，与江西群众言语不合，对行军宿营自有一些困难，一、三军团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再五军团的游击战争的经验没有，一、三军团可以帮助他们〔打〕游击战争。

5. 一、三、五军团分编对一、三军团也有很大帮助，一、三军团是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游击主义与农民散漫性还很浓厚的存在着，五军团有长久军队的历史，阵地战经验很多，一、三、五军团分编可以帮助一、三军团肃清游击主义和农民散漫性，帮助学习阵地战、白刃战、攻城战和一切军事知识。

总之，一、三、五军团分编能够彼此帮助，使一、三、五军团能够更快的锻炼成工农红军铁军！

一、三、五军团分编后，更使士兵有阶级的团结；阶级的亲爱，彼此帮助，彼此学习，决不应存任何地方观念、小团体观念，并且要同这些不正确观念斗争，只有这样才可以使一、三、五军团分编得着伟大的胜利！

当着目前极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政治形势之下，五军团实行分编，使一、三军团能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大主力军，这样去积极的向外发展，去夺取中心城市，去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蔷(祥)

中 革 军 委 关 于 重编一、三、五军团问题的训令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

发于中革军委)

现为指挥作战便利起见，特将各军从新编成一、

三、五军团。以四军、十五军编为一军团，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王良为第四军军长，罗荣桓为政治委员；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左权为政治委员。以五军、七军、十四军编为三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陈宗实为总经理处长。邓萍为第五军军长，耿万敌为参谋长，刘益云为经理处长；龚楚为第七军军长，赵博生为第十四军军长，黄火青为政治委员。以三军、十三军编为五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肖劲光为政治委员，周子昆为参谋长。徐彦刚为第三军军长，葛耀山为政治委员；董振堂兼第十三军军长，何长工为政治委员。除分别委令外，特此令。着各军团、各军务于三月二十号以前编制完毕，具报本会存查为要。

此 令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王稼蔷(祥)

彭德怀

中央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蔷(祥)

宁 暴 经 过

董 振 堂

(一九三二年六月三十日) ①

自一九二五年中国大革命暴发，西北军部分的〔官兵〕受了革命的影响，部分地认识了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也就是宁都兵暴的二十六路军在大革命时期已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自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后，更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欺骗、压迫、剥削。国民党常说：“要使人人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有用的。”实际呢，国民党把工农劳苦群众闹的〔得〕没吃的，没穿的，没住、没用的。国民党〔还〕说：“耕者有其田”，实际只有豪绅地主有田；国民党又说：“士兵解甲归田者给以田地。”国民党编遣军队把老弱残废的遣散回家，只给三元、五元钱，强迫回家。国民党强迫群众当兵，拉伕拉牲口，强索苛捐杂税。因此部分的〔官兵〕更认清楚了惟有共产党才能为工

① 本报告原件是董振堂同志的亲笔，其中有个别事件、时间可能不够准确。年代是编者判定的。

农劳苦群众解放到底。至一九二九年蒋介石调二十六路〔军〕开江西，我同博生同志在山东济宁东北郊外开了个会，决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俟开到江西来加入红军，并以李青云同志到中央去，这一去空去了未找到。回来队伍已到江西了（一九三〇年一月底^①）。这时候我们更找到刘振亚同志，同青云同志到河南，到南京才找到了向导，青云才同中央接上头。中央对我们说：你们由实际工作中表现。中央并派人来领导和训练。当时党决定在二十六路〔军〕的工作大纲和宣传大纲，并拟定了暴动的两个办法：一是急干的，如红军与二十六路〔军〕作战时或组织破坏时；一个是缓干的，以七十三旅学兵连作基干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其教育和训练，然后将这批党员分发七十三旅各连，在各连建立党的组织，以作暴动的主力军。对其他各部亦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到九、十月，党有迅速的发展，建立了两个支部。十月底王某^②回中央报告走到南昌被捕，供出同志五、六名。蒋电孙查拿，蒋并将王某供辞和一切文件由飞机送交孙连仲。恰好此时孙到南京开会，电报文件全落在赵博生同志手中。当时党即开了个紧急会，决定：一、与中央苏区取连

① 此处时间应为一九三一年一月。

② 即指王超。

络；二、积极准备暴动；三、积极扩大暴动。当时派袁汉澄同志到中央苏区取联络。对七十三旅的学兵连李青云、特务连姚鸿春，二十七师八十旅董俊彦连、卢子美连，加紧这四个连的训练和武装的准备，党员同志们也准备了个人武装。当时二十六路〔军〕一般士兵病的很多、死得〔也〕多。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党就拿这两点在群众中宣传：二十六路〔军〕在宁都终久得全病死完，我们在这里病死完，不如到东三省同日本拚拚。群众说：我们十一月联名（除孙连仲、李松昆外）打通电去打日本，谁不让我们去谁就是卖国。电报打了，蒋介石大骂孙连仲。孙连仲就来电说：你们太猛浪，又说了许多不是。这个电报领头的就是有季振同，碰了钉子后，季心里就产生不安。我们说：孙连仲回来，我们不得了，我们要结团体一齐同他干才行。就想了个组织的名字“同志会”，并说我们要公开的征求人入会，并指派人起草会章。次日晚上又开会说：公开的不好，要秘密的，要另起草。我同博生同志与季说：我们北去，蒋介石的军队挡着，过不去长江。我们与红军连合连合怎么样呢？季说可以。我们就给伯坚同志写了一封信^①，派郭如岳同志送的。回信^②来说：一、你们要共推革命领袖；二、派

① ② 此信未查到。

代表来商。接到这封信后，十二月十二日午前十时，我们三人到宁都城南山上开了一个会。一、共推革命领袖。我说：季。博生同志说：季。季说：博生。就共推季为革命领袖。二、派代表二人。我的代表是袁汉澄，季的代表是卢寿椿。回来后当甚满意，中革军委说愈快愈好。十二月十二日晚八时党内开会，博生、振堂、青云、血卒到会，根据中革委会代表的指示决定，我们就决定了十二月十四日午后七时，宁都兵暴就爆发了。



我把我想得出来的和笔写得出来的，我简单写了一下，请你看看。 此致
伯坚同志

董振堂
六月三十日

二十六路军举行暴动的计划^①

一、城内警戒，由党内组织巡查队，担任断绝交通和监视反动者的行动。

二、城四周警戒，城东南两面由七十三旅担任，城西北两面由七十四旅担任。

三、二十五师师部和其特务连，由七十四旅派兵一营由卢寿椿带领解决之；因总指挥部先发现枪声引起李松昆的注意，闭门困守相持六点钟缴械；二十七

① 本计划原件是董振堂同志的亲笔。标题是编者加的。无成文时间，可能是一九三二年六月三十日董振堂同志写的《宁暴经过》一文的附件。

师师部和其特务一连由七十三旅的学兵连和特务连的一部，由李青云同志率领解决之；结果因王鸿章同情于我们，王去一说即服。

四、总指挥部和二十七师无线电台由七十三旅派人监视，收缴枪枝二十余枝，无反抗。总指挥部无线电另一架和二十五师无线电台由七十四旅派人监视，收缴其长短枪数十枝，无反抗。

五、暴动开始党内指定人割断各处电话线。

六、派卢子美同志的一连占领翠微峰，因忙未做到。

七、赵博生同志担任请靖卫团总严惟慎和县长谈话，捉之。

八、暴动方法。由赵博生同志以参谋长名义，招集二十六路〔军〕全体团以上的军官会议，并请吃饭，借此时将团以上的反动官长全体捆起。各部队就失了指挥。

九、暴动时刻决定十二月十四日午后六时（利用薄暮后，人容易起恐怖心，反动的就不敢动了）。

十、暴动后，关于〔对〕反动部队办法。七十五旅由边章五同志负责收拾；二十七师的七十九旅的贾团归我负责收拾；二十七师其余部队由王鸿章同志负责收拾；如不听收拾者派队解决之。

李青云给刘伯坚的信和 宁暴经过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月十二日) ①

刘主任：

《宁暴经过》本来早应写好送上，因为时间和不常写东西的关系，以致迟延到现在。虽然写了一些，但接到你的信②又感觉到太不充实，好多事实及日期都忘掉了。暂时把这一些送去。我再过细想一想，再随后送去好了。

我的病在来到牛田来以前就好了，你的摆子虽然好了，但还要继续吃药，使他根本肃清，不然稍有寒热、疲劳又要〔犯〕，那就万分讨厌了。

此间还有残余土豪打，但弄不到什么东西，如有

① 本信和报告原件是李青云的亲笔，无成文年月；李青云在一九三三年二、三月第四次反“围剿”之前病逝，故此信和报告是一九三二年写的。标题和年代为编者所加。

② 此信未查到。

了鸡子腊肉，一定要送你吃，请你希望着吧！

致

布 礼

青云（签字）

十二日二十二时 于牛田圩

二十六路军是冯玉祥的第五路嫡系军队，由孙连仲率领。一九三〇年蒋冯军阀混战，冯玉祥失败后，孙连仲投降蒋介石。除其所部十二、十三师以外，又将冯之手枪旅编为十四师，在济宁改编为二十五师、二十七师、骑兵师，合编为二十六路军。士兵大部分为陕甘籍，其余为直、鲁、豫人。大部分是派门头兵派来的，一部分是连年旱灾没有饭吃而来的。二十六路〔军〕士兵在河南苦战数月死伤大半，不但没有饷发，就是吃的东西亦是从群众家中征发来的。归蒋介石后，在名义上虽然是说发饷，但七折八扣再加上各层官长的剥削，士兵还是得不到任何利益。

孙连仲投蒋后，暗中仍与冯玉祥勾结，经常派代表来往。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六路〔军〕住山东济宁

时，蒋介石即不放心：孙连仲如久住北方，又有仍归冯玉祥之危险；又因一次战争失败^①，乃用以毒攻毒的办法调孙连仲部到江西“剿赤”。在未下命令以前，蒋介石召集了二十六路军团长以上的训话，并按级给以贿金，以使其好听话南调，孙连仲在此次就得到十万元。

南调的命令下来以后，孙连仲就召集旅长以上的秘密会议，决定是否听命。这一会议结果，决定了决心不到江西，其原因：（1）因为红军的胜利到江西来怕交枪给红军；（2）怕被蒋介石交枪；（3）与冯封建关系还未割断（这只是吊膀子，不是主要原因）。所以耍了一套，一旅人假哗变，即电蒋介石：士兵不愿到南方无法开动。后经蒋介石派了刘郁芬、贺耀祖等小走狗携大批贿金，经过各种花样的游说收买（这次孙连仲又得了几十万），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才从济宁陆续开动。当时一般士兵未开差以前听官长说不到江西去了，他们以为真不去打红军了，大家还很高兴的。以后讲要开去，士兵都不愿意，所以在出发时候，就开一大批小差。

二十六路〔军〕到江西正当二次战争^②开始。这次

① 指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② 指一九三一年三月至五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战争蒋介石惨败，该路〔军〕亦交了一旅^①人的枪给红军。自这次战役后，士兵受了革命很大的影响，知道唯有苏维埃才能解除劳苦群众的痛苦，唯有红军才是革命的武装。以前官长们的欺骗都全不相信了，所以从二次战争到三次战争前后，整班及零星开小差当红军的陆续不断。

三次战役^②蒋介石惨败。看孙连仲不断与冯玉祥勾结，就用离间的办法来分化他的内部，委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为十七军军长，辖二十五、二十七师；二十五师师长本为孙连仲兼职，如高树勋当军长时，一定要开师长缺。孙连仲接到命令后对高树勋非常愤恨，不但不成立十七军军部，并将全路〔军〕组织成两个纵队，由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五旅旅长李松昆指挥。将高树勋之一旅拨归两个纵队（另一旅已交了枪），委高树勋为光杆前敌总指挥。高树勋看事不好，便称病到南昌去了。

三次战役蒋介石又惨败了。二十六路〔军〕溃退到距广昌五十里之胡岭咀，又被蒋介石强迫折回宁都。

① 指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我中央红军在中村歼灭敌二十六路军二十七师的一个旅。

② 指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九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

此时二十六路〔军〕全路麇集宁都城。周围尽是赤色区域，米菜都买不到。每天由兵站发一点糟坏米，又没有菜吃，大部分以盐水下饭。更加上官长无限度的剥削，医药费完全不发，以致士兵有病无药吃，每天死数十人，甚至死了的士兵的棺木费亦被官长吃了。士兵病了不但不想法医治，甚至有强迫有病士兵放哨出差，少有点不愿意，就用棍子打，甚至打死。所以在宁都三个月士兵自杀的就十几个。所以此时士兵生活上、精神上痛苦到了极点。大家一致的呼声，就是要回北方，甚至无论如何亦不愿再在宁都。所以当时士兵就编了一个歌：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快交枪，快交枪，打毬〔屙〕押毬，打毬〔屙〕押毬（陕西人土话）。

上海共产党中央一九三一年六月派王超、袁血卒、李肃来建立二十六路〔军〕的党。此时正当三次战役开始，二十六路〔军〕正是由宜黄开往东陂的时候。在宜黄介绍李青云、赵博生二同志入党。因队伍行动亦未成立支部，当时即派李青云同志到上海报告二十六路〔军〕情形。八月李青云同志回来宁都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指示，成立了干部支部、士兵支部及特别支部。此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党抓着这一事实，宣传蒋介石为了转移国人的视线，巩固自己的地位，才把帝国主义勾来，使一般士兵由反对帝国主义连〔联〕

系到反对蒋介石。党抓住士兵非人的生活与痛苦病死，深入宣传这些痛苦都是由于蒋介石用以毒攻毒办法，由于孙连仲得到大花边几十万，将我们卖到此地等死，他们到南昌享福及官长士兵生活的悬殊等，使士兵更加深对蒋介石、孙连仲及官长的仇恨。抓紧士兵想回北方的心理，宣传如不回北方，在宁都各个都要死完。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又在广昌架着机关枪，不准我们走回北方，又回不成。所以我们想不死，只有想别的办法——当红军，使士兵倾向于革命，并将红军生活，共产党主张相机输送到士兵中。并抓紧二十六路〔军〕各派的冲突，实行挑拨离间。高树勋因军长未当成，就坐到南昌骂孙连仲贪得无厌，早该回家去咧。孙连仲就骂他没有良心。季振同骄傲成性，向来就看不起孙连仲，自河南归孙连仲后常说：我是总司令的手枪旅，那能听你孙肉头的指挥？孙连仲亦感觉无法指挥他。李松昆虽对孙忠实，但为季振同等所忌恨鄙视，犹以李当二十五师师长后为更。甚至季振同公开骂孙连仲自私，李松昆请他们吃饭都不去（季振同以后能与我们暂时取一致行动，此为主要原因之一）。利用这些矛盾，用全体士兵的名义，与孙连仲去了一封促其觉悟的信，孙连仲经过战争的失败，对进攻革命的胜利心早就没有了，又加上自己内部不一致，已感觉无办法，接到此信后更加动摇，更加对高、季等

之不满，更加无法指挥。在宁都久住终非好结果，所以就请假到上海去了。

当李青云同志从上海回来时，党中央即调王超到住江西各师去巡视工作，到南昌被捕叛变。当王超被捕消息传到宁都时，党即召集一次支委会，即认为党的组织有破坏的可能，即准备暴动。以后蒋介石的飞机又送来一个密令：“据捕获共犯王超等二名供称，系在二十六路〔军〕，除将该犯所供共犯分别查拿外，仰即该路〔军〕严密防范为要，此令。”孙连仲赴上海时指定李松昆代理总指挥，但事实上仍由赵博生同志代拆代行，所以这一训令为赵同志所得。赵同志看此训令后，即秘密装在袋内，召集李青云及董振堂同志开一紧急秘密会议，讨论应急办法。即决定一方面派同志与苏区中央接洽，一方面利用季振同之不满，煽动其与我们取一致行动全体暴动，他如果不同意，七十三旅亦要在一、二日内暴动。当晚即取到季振同之同意，即决定季、董各派代表一人，党秘密派一人。季振同即派卢寿椿，董即派郭如岳，党即派袁汉澄（即血卒），到中央苏区接头。以后即接到中央回信，即将二十六路〔军〕编为五军团，请董、赵、季互推首领，尽可能于十二月十三日暴动。当时即推季振同为总指挥，因十三日一切还没有准备好，且去南昌运棉衣的亦于十三号才能到，故延至十四日才动

作。

在十三〔日〕夜拟定暴动计划如左〔下〕：

(1)由赵博生同志准备酒席两桌，以总参谋长名义邀请全路〔军〕团长以上军官吃饭，时间为十四时〔日〕十七时。并特别给跟班的传令兵预备好菜好酒，派人好好招呼，使他们都喝醉了为最好。

(2)由七十四旅派手枪队一连包围总指挥部（天主堂），并捆反动军官。同时派兵一营，包围二十五师师部，解决该反动师长李松昆。均于八点钟动手。

(3)城内外警戒西、南、北门，由七十四旅各派兵一连断绝交通，东门由七十三旅派一营人断绝交通，向河边警戒，东大街小东门由七十三旅学兵连负责，一到八点钟即马上断绝交通、改换口号——“解放”，口令不同者，一律不准通过。

(4)总部无线电队由七十三旅学兵连派一排人监视，二十七分队（即二十七师无线电）由七十四旅派队监视，二十五分队亦由七十四旅负责派人监视，一开始马上禁止发报。

(5)以袁血卒、王振铎、杨履元三同志组织一个特务队，动作开始后即破坏各处电话，并应付不意事变。时已薄暮，暗淡的宁暴城内群众都把大门关起，街上一个人亦没有，只见要求解放的士兵们一个个都

含〔怀〕着一种英勇的气象〔希望〕，眉笑颜开，一队一队的拥到总指挥部二十五师师部去了。

宁都的天主堂是个洋式的楼房。当日请酒的布置，官长在楼上，传令兵在楼下。六点钟人就到齐了，门外的警戒亦布置好了，刚八点钟的时候楼上楼下都喝起酒来了。赵博生同志起立发表意见略谓：现在士兵痛苦到万分，为士兵计，我们应取革命行动，大家去当红军。团长以上的反动官长大家都不同意（事前已有规定，听桌子一响，外面同志即进来下手），桌子一响，外面的同志就拿着绳索手枪进来。反动官长看事不对，就想逃跑，被守门的孙步霞、孙芳贵、张博泉等同志迎头几枪，将二十五师的王参谋长一枪打倒。怕死的反动官长们就躲到墙角、门后、桌子底下战作一团，一个一个都被捉起。去包围二十五师师部的一营人，因为距离稍远，总部响枪时尚未赶到，致被〔使〕李松昆跑掉，真是可惜。二十七分队无线电本来归七十四旅监视，但该旅之一排人，达到〔完成〕任务后又将门关起，致使特务队以为该队当无人监视，当即带七十三旅特务连前往，以致双方起了误会，伤亡排长士兵各一名。

十五日五时二十六路〔军〕全部两万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撕碎了国民党晴〔青〕天白日旗，打着鲜亮的红旗，欢呼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拥护共产党、

工农兵解放万岁等……口号，出宁都东门全部开到赤区来了。

宁都暴动在共产党坚决领导和有利条件之下完全得到了胜利。但还有以下的缺点：

- (1) 未将反动的团旅长杀死反将他们放走；
- (2) 未能有计划的袭取赤面寨消灭宁都的地主武装。



中 革 军 委 关 于 嘉 奖 宁 都 暴 动 干 部 战 士 的 通 令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四日) ①

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它表示了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广大士兵群众的走向革命；表示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在目前革命日益发展情势下的更加崩溃与瓦解。同时，增加了一批强大的武装力量到革命方面来，成为红五军团，这是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一页。因此，中央政府决定并通令各地在广暴〔纪〕念中同时举行纪念宁暴，并给予领导宁暴的董振堂、赵博生两同志以全苏大会所制定的最荣誉的红旗章，给领导宁暴的各干部以革命书籍多种，给参加宁暴的五军团全体战士以其他的慰勉与奖励。

红军各部队应遵照中央政府决定，在广暴纪念中同时举行宁暴纪念，依照总政治部规定的具体办法执行，并将宁暴的伟大革命意义联系到目前政治形势与

① 标题和成文年代是编者加的。

我们的任务，作广大鼓动宣传，与奋起我全体红色战士为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战斗，为消灭白军与瓦解白军士兵而战斗的勇气，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王稼蔷（祥）
彭德怀

内蒙古蒙旗独立旅的创建前后

乌 嫩 齐

在抗日烽火漫卷全国的年代，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蒙旗独立旅（后改为新编第三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这支武装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坚守、战斗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多次阻击了黄河沿岸日寇和伪军的进犯，保卫了伊克昭盟，保障了陕甘宁边区北部的安宁，在抗日战争的史册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一九三一年夏，正值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指挥下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消息传到塞外，苦难深重的各族人民有了新的希望的时候，中共中央派王若飞同志到内蒙古地区，开辟陕甘宁绥一带的武装斗争。在包头，王若飞同志以商人身分作掩护，与乌兰夫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时就已相识，这次久别重逢，高兴异常）。乌兰夫向他汇报了这个地区的党组织和工作开展的情况。王若飞传达了党对内蒙地区工作的指示和要求，并着重提出了要注意抓武装斗争。当时乌兰夫在内蒙古蒙族地方部队老一团^①作党的工作。从那时起，乌兰夫除从事党的民族工作、群众运动外，以主要精力注重抓了武装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野心驱使下，对内蒙古地区采取了公开的军事占领与隐蔽的政治阴谋同时并进的政策。在占领了东三盟的同时，诱惑察、绥和蒙古各盟蒙族发动所谓高度自治运动，利用某些上层王公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的不满，实现其进一步的侵略计划，以达到“以蒙治蒙”长久统治的目的。这时，一部分先进的蒙古族各阶层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全国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中，对于抗战已有了认识和希望，并团结在内蒙古党组织的周围开始了抗日运动。乌兰夫为了组织和加强抗日武装部队，培养党的骨干力量，开展并坚持斗争，经张家口同盟军第四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罗念冰（中共党员）介绍，到四十一军驻包头的部队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在工作有了一定基础后，党派刘仁接替了他的工作。乌兰夫就去做百灵庙^②蒙政会^③

保安队的工作。蒙政会保安队，实为一个大队、四个中队、一个特务队，约一千人左右。官兵多为土默特旗和东四旗的蒙古人。当初，绝大多数是出于对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的不满，并受了德王“蒙古自治”的欺骗宣传，为了求生存、寻出路而来的。其中有青年学生，也有贫苦的农牧民。早在一九三四年，乌兰夫利用社会关系和派进去的党员，教育和团结了保安队的一批爱国官兵。他曾在这支部队中多次宣传蒙古民族只有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闹革命，才能获得真正解放。在蒙政会，乌兰夫约见了一次德王，问德王：内蒙的出路何在？德王答：一个是投靠日本，一个是依附国民党。乌兰夫讲，日本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它是利用国民党政府大汉族主义压迫所造成的蒙汉成见，实行“抑汉扬蒙”政策，组织傀儡政府，以军事威胁与政治上的羁縻骗取内蒙古人民的信任，达到其“以蒙治蒙”长久统治的目的。而国民党政府则是继承清朝政府与北洋军阀对蒙的政策，继续推行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妄图把蒙族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并进而消灭蒙古民族。乌兰夫在陈述了这两条路都难以行通以后，暗示德王只有走革命的道路才有前途。这次相见，只是各抒己见，谈而未成。后来，乌兰夫因身份暴露，迅即离开了百灵庙，返回归绥（今呼和浩特）。这以后，他就通过地下党

员赵诚、交通员李森掌握这支部队的情况，继续进行反投降、反背叛的宣传组织工作，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阴谋和德王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行径。唤起了部队官兵的民族热情和爱国主义觉悟，教育和团结了一批基本力量。

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内蒙古地区的抗日救亡斗争有了新的发展。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提出：“把蒙回两族（首先是蒙古）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二十七日，毛泽东指出：“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科学论断，为内蒙古各族人民（特别是蒙古族）的抗日斗争指明了方向。党在蒙政会保安队所进行的工作，使多数青年官兵逐步觉悟，认识到了德王投靠日寇的反动本质和企图。随着德王投靠日寇步伐的加快，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下，一些有见识的军官云继先^④、朱实夫^⑤、云蔚等率领一千多名蒙古族官兵，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毅然举行了武装暴动，宣布脱离德王，实行抗日。这一正义行动，反对了外来侵略，打击了亲日派，维护了民族尊严，打乱了日寇西进的战

略部署，响应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号召。

暴动部队离开百灵庙后向南行，当时正遇连降大雪，白茫茫的达尔罕草原，积雪没膝，步履艰难。在日落西山的时候，遭到德王派来的乌滂守备队乘汽车的步兵和保商团的骑兵的追袭。经过激烈战斗，暴动部队打退了追击的敌人。当部队来到二分子休整的时候，傅作义派三十五军四二一团秘密包围，并派两个武装加强营以“慰问”暴动官兵、减轻部队负担为名，用汽车拉枪，解除了起义部队的武装。部队行进到台阁牧进行了整编。傅作义将起义部队编为一个总队，两个大队，六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每班由十二人缩编为九人。并派员到部队进行煽动、挑拨，制造内部纠纷。在部队举行暴动的第二天，乌兰夫即派李森前往接应，当李森到达武川后，获悉傅作义已派兵缴械。乌兰夫就发动归绥的社会力量声援接济暴动官兵。当暴动部队到达台阁牧后，乌兰夫等共产党员即到暴动部队中去，领导继续开展斗争。这时乌兰夫的公开身份是政训处三科科长。与此同时，傅作义也不断派员妄图控制、瓦解这支部队，策动了一场“内讧”。德王的亲信章文锦煽动部分不满分子杀死了总队长云继先，带一部分哗变的士兵向百灵庙进发，途中，被傅作义的装甲部队打死多人。

(二)

一九三七年春，乌兰夫利用白海峰^⑥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的关系，由白出面向国民党要了一个蒙旗保安总队的番号。联合内蒙古西部地区爱国的进步人士，以百灵庙暴动部队中的进步青年为骨干，重新组成了蒙旗保安总队，下设两个大队。总队长白海峰，参谋长常永生，政治部主任纪贞甫，代主任乌兰夫（是这支部队党的领导人）；一大队长纪松林^⑦，二大队长朱实夫，直属总队的有一个特务队，一个卫士班。这个部队的成员绝大多数是蒙古族。部队的主要骨干，多数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也派来了一个参谋长和一个搞军训的军官，但他们在部队没有基础。连队设政治指导员（都是共产党员），每星期上一次政治课，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这时党的政治宣传工作很活跃。部队为我们党所掌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部队组成后，转战于百灵庙、大庙、固阳等地。这年秋天，部队驻固阳县新城时，德王不甘心失败，派了杀害云继先的章文锦带着一个人，化装潜入固阳，妄图策反。云蔚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当机立断，缴械扣捕，并报告了白海峰、乌兰夫。他们研究后决定，为巩固全体官兵的抗日决

心，就地予以处决。这件事的果断处理，深得广大爱国官兵的拥护。

一九三七年夏，马占山在包头召开了军事会议，在会上宣布把蒙旗保安总队，改编为蒙旗独立旅，下辖两个团。旅长白海峰，政治部代理主任乌兰夫（地下党委书记）；一团团长纪松林，政治指导员克力更，二团团团长朱实夫，政治指导员王允文。部队驻防包头。十月，日本侵略军及各路伪军，加速了侵占察绥的步伐。阎锡山为保住其山西老巢，从绥远调傅作义部三十五军驻守雁门关。留守绥远的只有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门炳岳的骑七师及一部分国民兵。这批驻军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相互倾轧，混乱不堪。十月十二日，当日伪军进犯归绥^⑧时，他们纷纷弃城溃逃。在归绥形势紧迫时，乌兰夫当即提出，为了表明我们是一支抗日武装，不辜负乡亲们的期望，虽然兵力有限，装备差缺，也要前往阻击，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他的倡导，博得了广大官兵的赞同，部队从包头乘火车开到了归绥。

十二日午夜，日军黑石旅团，三个伪蒙古军师从凉城方向，还有一部分日伪军从大青山方向，总共约九个师夹击归绥，对归绥形成了包围圈。蒙旗独立旅将部队部署在黑河沿岸、桃花板村、南茶坊一带。全体官兵同仇敌忾，决心以实际行动，保卫家乡，保卫

国土。装备虽然简陋，但战斗打响后，个个奋勇向前，顽强战斗。起初，日军也摸不清底细。他们原侦察傅作义部队已撤出，满以为不会受到任何阻挡即可长驱直入，没想到会遇到阻击；又因为是夜间，日伪军未敢前进。直到十三日，蒙旗独立旅终因寡不敌众，才边抵抗边后撤，撤到了城郊南茶坊。城镇居民尤其是青年，冒着枪林弹雨及生命危险，带着大批慰问品到部队热情慰问。是日午后，日伪军兵临城下，形势异常严重，党为了保存这支蒙古族抗日武装，便由白海峰、乌兰夫率部撤出归绥，乘火车向包头转移。

十月十四日，日本侵略军矶谷师团和岩山、小岛两个机械化联队在蒙奸德王和李守信的伪军配合下，从归绥向包头扩展。在这种情况下，蒙旗独立旅向何处去？一时成为广大官兵共同关心的迫切问题。旅长白海峰极力主张西行，要跟随马占山部队开往河套，而乌兰夫则坚决主张南下，渡过黄河向伊克昭盟进发，尔后靠向陕甘宁边区。当时，日本飞机已在包头上空盘旋侦察，偶而还听到炮弹的轰炸声，但仍争执不下，情况十分紧急。最后由于部队的主要骨干多数是共产党员，赞同南下的占优势，部队终于按乌兰夫同志的主张，当晚渡过黄河，踏上鄂尔多斯高原，向陕甘宁边区进发。途经达拉特旗展旦召时，遭到了旗保安队的袭击。当时部队在展旦召宿营，达拉特旗王爷森盖

(已投靠日寇)带着五百多骑兵偷偷包围了蒙旗独立旅，企图吃掉这支部队，捞一批武器装备。他们凭借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乘蒙旗独立旅的官兵正在休息之机冲过来，疯狂地射击，打死打伤多人。部队官兵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地卧倒，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白海峰、乌兰夫进入展旦召的独贡（喇嘛念经的地方）指挥战斗，组织反击。由特务队长白富全和炮兵连长刘德带领几百名士兵，集中火力向外射击，很快就打退了敌人的包围，乘机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集中所有机枪和小炮一齐射击，迫使敌人缴械投降。敌派了一个穿白衬衣的人，自称是喇嘛，打着白旗，请求谈判。当时，有的士兵非常气愤，要杀掉他。乌兰夫当即予以制止，并给大家解释：这是个政策问题，对喇嘛我们不能随便杀害。双方经过谈判，停止了战斗。部队清理了战场，稍事修整，又继续向陕甘宁边区前进了。

(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部队经长途跋涉来到了解放区陕北府谷县的哈拉寨。寒冬已到，部队官兵仍穿着夏季服装，每个班平均只有两件皮袄。吃粮也很紧张，经常断炊，有一个时期连火柴都短缺，每个班每天只

发三根。官兵连饷也没有。但整个部队没有开小差的。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共同信念：只要不当亡国奴，不受大汉族主义的欺压，跟着共产党抗日再艰苦也能挺得住，也能坚持下去。这时，各部队都已有了党员，建立了支部。在党组织的周围有了一批党外的活动积极分子。从而使这支部队，能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巩固和壮大起来。

到陕北后，白海峰去南京找国民党要给养，乌兰夫到保德县八路军一二〇师办事处联系党的关系。乌兰夫在岢岚见到了一二〇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向他汇报了蒙旗独立旅的情况，并请他转报中共中央。甘泗淇听了情况后，非常赞赏，并说：“你们这支部队所以能够这样好，关键是党的领导，是执行古田会议的精神，支部建在连上的成果。谈后乌兰夫即住下等待中央的回电。没过两天中共中央发来回电，电文大意是：了解到这支部队的情况很高兴。中央正打算开展伊克昭盟的工作，有这样一批蒙古族干部和部队很可贵。要继续扩大这支部队，把它作为培养抗日民族干部的学校。乌兰夫接到了中央的电示，与党取得了联系后，即离开一二〇师返回部队。临走时一二〇师送给蒙旗独立旅一千套军装、一千双布鞋、一千元菜金等装备和给养。从此，蒙旗独立旅就直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转战在陕北和伊克昭盟地区。

一九三八年春，蒙旗独立旅驻神木时，中央通过神府边区发电报给乌兰夫，让他去延安汇报工作。四月，乌兰夫到达延安，高岗让他等白海峰到后一同去汇报。白到后，高岗带他们去见毛主席。白海峰报告了向国民党政府要武器、装备的情况，并讲了部队在一九三八年初改称新编第三师的情况。乌兰夫汇报了部队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非常高兴，指示：要利用国民党给的番号，争取国民党的供给，设法把部队扩大；部队不要驻神木，要移驻伊克昭盟，开展群众工作，组织武工队，做好争取和团结蒙古王公的工作，要培养干部，把部队作为培养干部、特别是培养蒙古族干部的学校，要注意保护和保存这一批革命力量。

是年“五一”后，乌兰夫、白海峰回到部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率部移驻伊克昭盟。这时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根据绥远省敌我形势的发展，决定将蒙古工委改为绥蒙工作委员会，并从靖边县的张家畔迁到伊盟内地的桃力民。绥蒙工委的组成人员是：白如冰任工委书记，李衡、赵通儒、于占彪、白成铭、云泽（即乌兰夫）任委员。之后，中央决定又成立了伊盟工委，赵通儒任书记，乌兰夫是委员。赵通儒同志曾多次到新编第三师传达中央和工委的指示。

(四)

新编第三师驻守伊克昭盟后，执行了党的安定伊克昭盟，保卫陕甘宁边区，团结友军，争取伪军，打击日寇的方针，深得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广大蒙、回、汉族青年踊跃参军，使部队迅速扩大，到一九三九年，由原一千五百多人扩大到两千多人。部队成员蒙古族占百分之七十多，大部分是土默特旗和东四旗人，也有伊盟人，师团营连干部绝大多数是蒙族。扎莎克旗的一个活佛，在我党的抗日宣传和部队的影响下，也弃佛从戎，参加部队，拿起了枪杆子抗日。这时，师辖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师长白海峰，参谋长包清华，政治部主任纪贞甫，代主任乌兰夫；七团团团长纪松林，政治处主任克力更，八团团团长朱实夫，政治处主任王允文，骑兵九团团团长云蔚，政治处主任寒峰。师、团、营、连的主要领导骨干多数是共产党员，士兵中也有党员。到一九四〇年全师已发展到一百多名党员，师有党委，连有支部。党委成员是乌兰夫、孟纯、奇稀古、云飞扬、克力更、王允文；乌兰夫任党委书记。师有政治部，团有政治处，连有指导员。在部队中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一宣言》、《告全国同胞

书》等重要文献，组织红军长征报告会，进行光荣传统教育等。同时按照八路军的建军宗旨，严格部队的组织纪律，切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开展群众工作，在有条件的地方，及时把农（牧）民、青年、妇女等分别组织起来，成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女会等群众抗日组织。在这些群众团体的影响带动下，形成了群众性的抗日潮流。组织民兵，建立了武工队。建立学校，对青少年进行革命教育。还开展了对王公贵族、地主绅士的争取和团结工作，使一些上层人物拥护抗日，支持抗日。对国民党马占山、傅作义部队搞磨擦，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二十二军八十六师妄图吃掉这支民族抗日武装，切断榆陕公路的阴谋。

一九四〇年，日寇侵略军在中国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后，调拨主要兵力，加紧进攻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侵占绥远的日寇多次进行“大扫荡”，妄图跨过黄河，侵占伊克昭盟，进而向陕甘宁边区钳入。新编第三师根据敌人的动向，于是年夏季，派步兵七团、八团和骑兵九团坚守在达拉特旗的黄河沿岸，前哨设在谢家圪坦、二里丰一带，指挥部设在张明高圪坦。多次击退了日寇和伪军的进犯，保护了当地群众的秋收，防止了日伪军的抢劫，保卫了伊克昭盟七旗一县，保障了陕甘宁边区北部的安全。

(五)

几年来，新编第三师在蒙汉人民的支持下，坚决打击日伪军的进犯，英勇地保卫了伊盟和陕甘宁边区北部的安宁。鄂尔多斯高原呈现了一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生动景象。但是国民党顽固派总是企图把这支蒙古族抗日武装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害怕伊克昭盟“赤化”。因此，正当伊盟抗日斗争高涨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掀起的反共高潮中，三次下令调新编第三师到甘肃靖远整训。并于一九四一年春，调集其驻守在河套、榆林、宁夏等地的部分部队向伊盟逼进，口号是肃清伊盟的共产党。头两次调新编第三师到靖远，乌兰夫在向中央报告请示的同时，以日本侵略军企图越过黄河，侵占伊盟，部队不能离开为理由，未予执行。一九四〇年还请示中央，拟将新编第三师拉到延安边区去。一九四一年春，刘瑞森从边区来传达高岗谈中央的指示：新三师现在不能宣布起义，不要来延安，以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并指示要巩固统一战线，要警惕和防备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捣乱。一九四一年，胡宗南亲自给白海峰打电报催部队立即行动，并密电让他把乌兰夫就地处决。这时白海峰动摇了。在这形势极为严重的

关头，乌兰夫召开了紧急党委会。会上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形势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一致意见是坚持不动，不予理采，如白海峰坚持要走，就采取山西新旧军分家的措施。当时考虑到如果分家，白海峰也只能带走一个特务连，其他三个团的团长都是共产党员，一个炮兵营指导员也是共产党员，连排长中共产党员很多，部队是不会跟白海峰走的。会后，又报告请示了中共中央。当时中央的答复是：要求新编第三师的党组织要服从国民党的调动，保证把部队西调，不能分家，否则会影响国共两党的合作。并指出，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身分已经暴露的，影响比较大的迅速离开部队回延安，其余同志继续留下坚持斗争。乌兰夫把中央的指示传达下去后，许多干部战士都难以理解，痛惜地哭了。因为有中央的指示，部队只好向甘肃靖远方面行动。乌兰夫、克力更、寒峰先后于一九四一年春、夏回到了延安。

部队开到靖远后，国民党将许多共产党员干部调到新疆等地，分散控制在其他部队中。许多老战士也被调到各地，从甘肃补充了许多新兵。这样，部队以蒙古族为主要成分的情况改变了，党领导的这支蒙古族抗日武装被国民党瓦解了。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风时，乌兰夫问高岗为什么当时中央不同意新编第三师党委提出坚持不走或者分家的请示报告，高岗讲，这是在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

统一战线”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作出的决定。

(六)

一九四一年夏，新编第三师的爱国官兵，告别了伊克昭盟各族群众和曾经共同战斗过的地方，越过沙漠，途经宁夏，于一九四二年初来到甘肃靖远县。国民党将它们改编为新骑七师，把原有的两个步兵团改成了骑兵团。师长仍是白海峰，副师长朱实夫。这时，跟随部队西行的共产党员，按照撤离时乌兰夫传达中央关于“保存实力，长期埋伏，视机行动”的指示，在条件极端复杂和艰难的情况下，继续秘密地从事着党的工作。党的骨干分子孟纯、王允文、云飞扬、赵俊诚、云蔚、云德全等，采取各种方式教育党员和广大爱国官兵，要保持民族气节，将抗日旗帜举到底，绝不向敌人屈服投降。在他们的带动下，多数党员一直坚持到斗争胜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响应朱总司令发布的命令，倡导和带领部队向东开拔，回师绥远。由于国民党妄想独吞胜利果实，害怕这支部队进入绥远，当部队行进到宁夏石咀山地区时，就被傅作义的部队“挡驾”了。后拟在宁夏暂时停留，马鸿逵又下令不予“接待”。无

奈，部队被迫返回靖远。国民党又将这支部队改编为骑兵第二旅，由原来的三个团缩编为两个团，旅长白海峰（一九四八年陇东战役后，白海峰离开部队，吕骥华接替旅长职务）。国民党利用改编之机，把他们认为行迹可疑的分子清洗了出去，使许多党员骨干和爱国官兵离开部队，流往他乡。与此同时，国民党又从其嫡系部队和军事学校派进大批特务和反动分子，妄图控制这支部队。但是，我们党在这个期间，利用其扩兵的机会，也派进了不少地下党员。这批骨干力量在国民党一片白色恐怖、控制严密、反动气焰嚣张的环境中，继续机警地开展着党的活动，积蓄力量，伺机行动。

解放战争期间，这支部队虽几经周折，但由于党的工作的长期影响，部队内部共产党员的艰苦奋斗和机智勇敢，一九四八年八月，副团长、共产党员云德权在陕西秦陵率领该团毅然起义，并指挥部队包围了旅部，强令他们签署了向毛主席发出的起义通电。拉过来十个骑兵连，一个旅部、团部和通信排，共计二千多人（马）；缴获迫击炮十二门，重机枪十四挺，六〇炮二门及各种轻武器。我西南野战军接到通电后，派十八兵团的姚念恒、杜兴源二同志接收了部队，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骑兵团。后来，根据贺龙司令员的指示，将骑兵团编成两个团，一个骑

兵团按六个连的编制，从其他部队抽了两个连，分别编到六十军和六十二军。云德权继续担任六十二军骑兵团副团长，该军归川西军区（李井泉和周士第负责）领导，军长刘钟，骑兵团长胡心泉。并随野战部队进军西康，为解放祖国大西南作出了新的贡献。

注 释

① 老一团，建于一九二一年，是一支蒙古族地方武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这支部队中的不少官兵接受党的主张，倾向革命，给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展工作以极大的方便和支持。许多官兵陆续参加了革命队伍。该团于一九三六年被傅作义强制解散。

② 百灵庙是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新兴的草原城镇。从德王投靠日寇之后，百灵庙即成为日寇侵华犯绥的策源地。

③ 蒙政会，是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简称，设在百灵庙。该会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成立，以年高德劭的云端旺楚克（云王）为委员长，实际上则由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以秘书长身份独揽大权。

④ 云继先，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村人，一九二五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北伐战争中任国民军十五团警卫连连长。后回内蒙，在百灵庙蒙政会任科长。一九三六年率领蒙政会保安队举行武装暴动后被害。

⑤ 朱实夫，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莎拉齐人，曾留学苏联，早年参加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甘肃靖源县被害。

⑥ 白海峰，热河建平县人，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北伐战争任连长、指导员等职，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作为代表出席过党的“六大”，后脱党。一九四九年参加了德王的“蒙古自治”运动，担任过“陕甘宁边区骑兵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蒙古自治政府”实业署署长，保安委员会副委员长。德王出走后，把“蒙古自治政府”改为“西蒙自治政府”。一九四九年十月，白海峰、何兆林、达理扎雅、巴文俊签署发出“西蒙自治政府”的起义通电，表示拥护共产党、毛主席，欢迎解放。

⑦ 纪松林，蒙古族，乌兰察布盟黄旗人（今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境内），大革命时期曾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军骑兵第一营营长。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三三年回国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第三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时，他宣布退出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初被傅作义的部队杀害。

⑧ 归绥，今呼和浩特市。

国民革命军陆军

新编第四军沿革概况

袁 伟

陆军新编第四军（以下简称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华中地区抗战的主力部队。它由湖南、福建、江西、广东、浙江、湖北、河南、安徽等八省边界的红军游击队组建和发展而成。现将它的沿革概况介绍如下。

一、为开辟华中敌后战场

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军国主义者继侵占北平、天津、华北之后，又集中二十余万兵力向上海大举进攻。国民党军爱国官兵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在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丧师失地，连连溃败。

中共中央为箝制日军的战略进攻，开辟华中敌后

战场，配合华北前线八路军主力打击侵略军，经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协议，于十月二日正式宣布，将湘、闽、粤、赣、浙、鄂、豫、皖八省十三个地区（湘南、湘鄂赣、湘赣、闽赣、闽南、闽西、闽东、闽北、浙南、赣东北、粤赣、鄂豫皖和豫南桐柏山）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新四军。并根据我党的提名，公布了新四军领导人员的命令：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为加强党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

经中共中央和东南分局派人至各红军游击区传达党的指示，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较顺利地实现了各地游击队的集中和统一整编。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成立。全军共一万零三百余人，编为四个支队及一个特务营。

第一支队，由原湘鄂赣边、湘赣边、粤赣边和赣东北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编成，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胡发坚任参谋长，刘炎任政治部主任。全支队共两千三百余人。

第二支队，由原闽西、闽赣边、闽南和浙南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

员，罗忠毅任参谋长，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全支队共一千八百余人。

第三支队，由原闽北和闽东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张云逸兼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赵凌波任参谋长，胡荣任政治部主任。全支队共两千一百余人。

第四支队，由原鄂豫皖边和豫南桐柏山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编成，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全支队共三千一百余人。

军部直属特务营，由原湘南和闽中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共八百余人。

新四军各支队统一改编后，即向华中敌后挺进。一九三八年二月至四月，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先后到达皖南岩寺地区集中；在江北的第四支队进至皖中舒城地区集中；军部及直属特务营，也由南昌移至岩寺。四月下旬，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各抽一部组成新四军先遣支队，由粟裕率领向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为执行毛泽东关于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陈毅率领第一支队随先遣支队之后向苏南挺进。六月十七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之卫岗（今韦岗）首战告捷，大振军威。接着，张鼎丞率领第二支队，谭震林率领第三支队，分别进入苏南和皖南沿江地区；高敬亭率领第四支队东进皖东敌后；叶挺、项英等率领军部及直属特务营也由岩寺进至泾县云岭。

九月，河南省委根据周恩来、叶剑英指示，派彭雪枫率领抗日游击大队挺进豫东。十月，与豫东抗日第三支队在确山竹沟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任副司令员。随后，游击支队挺进豫皖苏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十一月，张云逸率领红四军特务营抵达江北无为地区，遂将庐江和无为地区我党领导的抗日人民自卫军与抗日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队，孙仲德任司令员，黄岩任政治委员。

新四军各支队进入上述地区后，即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苏南、皖中、豫皖苏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取得了大小战斗二百余次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气焰。

二、为统一作战指挥 成立华中总指挥部

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于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到达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与新四军领导人研究，确定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据此，新四军第一支队首先以第二团主力和丹阳游击队向扬中及长江北岸发展。继以第六团（时归该支队指挥）东进无锡、江阴、苏州、太仓地区，与当地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合编为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并取得了黄土塘、浒墅关和袭击上海虹桥机场等战斗的胜利，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

同年五月，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新四军军长叶挺到达江北第四支队驻地安徽庐江东汤池，组建了红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接着，整编了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支队司令员；扩建了第五支队，由罗炳辉兼支队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第四、第五支队整编后，即挺进津浦路东和津浦路西地区。经艰苦转战，开辟了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和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

与此同时，活动在豫东和鄂中地区的抗日武装，根据党的指示，统一编为新四军鄂豫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政治委员）。后改为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朱理治，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十一月，新四军军部决定第一、第二支队在溧阳县水西村合编，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员，粟裕

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第二、第四团，新编第三、第六团，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丹阳游击纵队和地方武装，开展长江南北两岸的游击战争。指挥部成立后，为贯彻向北发展的方针，即以江抗与丹阳游击纵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谭希林任司令员，孙仲德任政治委员。另以第四团主力为基础组成苏皖支队，渡江北上，向仪征、天长、六合发展，并打通了与第五支队的联系。从而，为开辟苏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为继续发展华中，加强华中党的领导，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奉命于十一月底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这时，新四军在华中初步完成战略部署，先后创建了苏南、皖中、豫鄂边等抗日根据地。在对敌斗争中，新四军部队由编成时的四个支队一万余人，发展到六个支队、一个纵队共五万余人。

正当新四军部队全面展开华中敌后抗日局面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之下，于一九三九年冬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在悍然下令向我八路军和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发动进攻的同时，阴谋策划华中国民党军队向我新四军开始大规模进攻。此时，日本侵略军也加紧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为支援新四军反顽、反“扫荡”斗争，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和新编第二旅主力，于一九四〇年五月下旬分两个梯队南下豫

皖苏地区。六月二十日，第一梯队抵达安徽涡阳新集，与新四军第六支队胜利会合。不久，统一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张震一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四旅（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康志强）、第五旅（旅长滕海清，政治委员孔石泉）、第六旅（旅长饶子健，政治委员赖毅）。全纵队一万七千余人。

与此同时，谭震林在无锡、江阴公路以东地区，成立新四军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共两千余人。七月，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渡江北上，与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合。旋即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刘炎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刘培善）、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刘先胜）。八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二旅及第六八七团与新四军苏鲁豫支队、陇海路南进支队、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韩振纪任参谋长，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邓逸凡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一支队（司令员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第二支队（司令员田守尧，政治委员吴信泉）、第三支队（司令员张爱萍，政治委员韦国清）。全纵队约两万人。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新四军与八路军一部已经会师的情况，为反顽斗争需要和统一作战指挥，于本月中旬在苏北盐城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叶挺为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尚未到达江北时，由陈毅代理总指挥），赖传珠为参谋长，统一指挥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和八路军。至年底，新四军部队发展到八万七千余人。

三、为对抗蒋介石反动命令 重建新四军军部

在日、德、意三国结成军事同盟，日本开始实行入侵东南亚的南进政策时，蒋介石认为日美矛盾加重，美必积极援华，苏联亦会借重蒋介石牵制日本，而日本又不会大力进攻他，形势对他有利。遂于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发出“皓电”，限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在一个半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顾祝同调集十万军队向华中进攻，阴谋首先将皖南新四军部队“一网打尽”，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揭露蒋介石罪恶阴谋的同时，为顾全大局，决定将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和部队九千余人奉

命北移。六日即遭顽军拦击，八日在茂林地区陷入顽军第五十二、第一〇八、第四十、第六十三、第一四四、第七十九师和新编第七师共七个师八万余人的重围。军长叶挺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电令，率部与反共顽军浴血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两千余人突围外，六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叶挺与顽军谈判被扣。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遇害。十七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制造了亲者痛、仇者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为对抗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革命命令，独立自主地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于一月二十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叶挺仍为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一月二十八日，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军领导人发表了就职宣言。并立即根据党中央指示整编部队。新的军部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

第一师，由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原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依次改为第一、第二、第三旅。第一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叶飞；第二旅旅长王必成，政

治委员刘培善；第三旅旅长陶勇，政治委员刘先胜。此外，地方十一个独立团和一个抗日联队，也归该师指挥。

第二师，由原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副军长张云逸兼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罗炳辉任副师长，周骏鸣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张劲夫任政治部副主任。原第四、第五支队，改为第四、第五旅；原江北纵队与淮南一部地方武装，合编为第六旅。第四旅旅长梁从学，政治委员王集成；第五旅旅长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第六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谭希林。另外，独立旅兼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旅长兼司令杨梅生，政治委员刘顺元）和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员郑抱真，政治委员谭光廷），也归该师指挥。

第三师，由原八路军第五纵队编成，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雄任参谋长，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原第一、第二、第三支队依次改为第七、第八、第九旅。第七旅旅长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第八旅旅长田守尧，政治委员吴信泉；第九旅旅长张爱萍，政治委员韦国清。此外，淮海军区（司令员覃健，政治委员金明）及皖东北保安司令部，也属该师建制。

第四师，由原八路军第四纵队编成，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原第四、第五、第六旅依次改为第十、第十一、第十

二旅。第十旅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康志强；第十一旅旅长滕海清，政治委员孔石泉；第十二旅旅长饶子健（代），政治委员赖毅。此外，肖县独立旅（旅长钟汉民，政治委员李中权）也归该师指挥。

第五师，由原豫鄂挺进纵队编成，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决定郑位三为第五师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原所属部队分别编为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旅及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第十三旅旅长周志坚，政治委员方正平；第十四旅旅长罗厚福，政治委员张体学；第十五旅旅长王海山，政治委员周志刚。第一纵队司令员杨经曲，政治委员张执一；第二纵队司令员黄林，政治委员刘子厚；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耀榜。此外，鄂豫边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郑绍文，政治委员夏忠武），也属该师指挥。

第六师，由原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和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成，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罗忠毅任参谋长。下辖第十六旅（旅长罗忠毅兼，政治委员廖海涛）、第十八旅（旅长江渭清，政治委员温玉成）和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吴仲起）、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员韦永义）。

第七师，由原无为地区游击队和第三支队挺进团及皖南突围出来的部队合编而成，张鼎丞任师长，曾

希圣任政治委员，李志高任参谋长，何伟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九旅（旅长孙德仲，政治委员曾希圣兼）及挺进团。

军部直属独立旅，由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编成，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罗华生。另直辖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校长陈毅兼，副校长韩振纪，教育长谢祥军）及特务团。统一整编后部队共九万余人，标志着新四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四、为举行战略反攻 组建和扩编部队

新军部重建后，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率领全军部队进行了艰苦卓绝地反顽、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不仅挫败了国民党顽军的东进、北上计划，而且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同时，新四军部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为适应发展形势的需要，积蓄和扩大力量举行战略反攻，先后成立了新四军苏中、苏北、淮北、淮南、皖江、鄂豫皖、苏浙等军区及所属军分区，奠定了夺取抗战胜利的坚实基础。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日，苏中军区成立（第一师师部兼军区领导机关），师长兼政治委员粟裕兼军区

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副师长叶飞兼军区副司令员，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兼军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军分区（第十八旅兼），旅长刘先胜兼军分区司令员，旅政治委员韦一平兼军分区政治委员；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陈时夫；第三军分区（第一旅兼），叶飞兼旅长、旅政治委员和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不久由陈玉生任军分区司令员）；第四军分区（第三旅兼），旅长陶勇兼军分区司令员，旅政治委员姬鹏飞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不久由季方任司令员）。

随后，苏北军区成立（第三师师部兼军区领导机关），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副师长张爱萍兼军区副司令员，师参谋长彭雄兼军区参谋长，师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兼军区政治部主任。下辖盐阜军分区（第八旅兼），张爱萍兼旅长和军分区司令员，旅政治委员李雪山兼军分区政治委员；淮南军分区（第十旅兼），旅长刘震兼军分区司令员，旅政治委员金明兼军分区政治委员；独立旅，覃健任旅长。

同年十一月七日，淮北军区成立（第四师师部兼军区领导机关），师长彭雪枫兼军区司令员，师政治委员邓子恢兼军区政治委员，师参谋长张震兼军区参谋长，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兼军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军分区（第九旅兼），旅长韦国清兼军分区司令

员，旅政治委员康志强兼军分区政治委员；第二军分区（第十一旅兼），旅长滕海清兼军分区司令员，旅政治委员赖毅兼军分区政治委员；第三军分区，赵汇川任司令员；第四军分区，张太生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骑兵团。

一九四二年二月，淮南军区成立（第二师师部兼军区领导机关），师长罗炳辉兼军区司令员，师政治委员谭震林兼军区政治委员，师参谋长韩振纪兼军区参谋长，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兼军区政治部主任，师副参谋长詹化雨兼军区副参谋长，师政治部副主任余立金兼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津浦路东军分区（罗占云任司令员，李世农任政治委员）；津浦路西军分区（第六旅兼），旅长陈庆先兼军分区司令员，旅政治委员黄岩兼军分区政治委员；特务团。

同年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离开华中赴延安，由饶漱石代理新四军政治委员。

翌年三月，皖江军区成立（第七师师部兼军区领导机关），师长谭希林兼军区司令员，师政治委员曾希圣兼军区政治委员，师参谋长孙仲德兼军区参谋长，师政治部主任王集成兼军区政治部主任，师副参谋长林维先兼军区副参谋长。下辖含和支队兼含和军分区（孙仲德兼支队长和军分区司令员）；皖南支队兼皖南军分区（梁金华任支队长兼军分区司令员，黄耀南

任支队政治委员兼军分区政治委员)；沿江独立团及无为、湖东两个总队。

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活动于浙东敌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队，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刘亨云任参谋长，张文碧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支队及两个总队（即金肖、沪松总队）。

为执行控制中原的战略任务，是年八月，彭雪枫奉命率领新四军第四师主力西进。九月十一日，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牺牲。中央军委随即任命张爱萍为第四师师长，韦国清为副师长。

年底，粟裕率第一师主力三个团渡江南下发展苏浙，旋即与苏浙地区第十六旅会合。翌年一月十三日，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叶飞任副司令员，刘先胜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第二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谭启龙，副司令员张翼翔）、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阮英平）、第四纵队（司令员廖政国，政治委员韦一平）及第一军分区（司令员钟国楚，政治委员陈光）、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陈立平）。苏浙军区成立后，经连续作战，初步完成了南进浙江、发展东南的任务，扩大了举行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

在苏浙军区成立不久，新四军军部即对苏中军区领导干部和组织机构作了如下调整：管文蔚任军区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张藩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姬鹏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下辖教导旅（旅长刘飞）、第一军分区（司令员黄逸峰，政治委员陈时夫）、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陈玉生，政治委员李干辉）、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卢胜，政治委员姬鹏飞兼）、第五军分区（司令员韦永义，政治委员金柯）、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包厚昌，政治委员钱敏）及特务团等。

一九四五年五月，鄂豫皖湘赣军区成立（第五师师部兼军区领导机关），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任质斌兼军区副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师参谋长文建武兼军区参谋长。下辖第十三旅（旅长周志坚，政治委员周志刚）、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吴诚忠，政治委员周季芳）、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王海山，政治委员文敏生）、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韩东山，政治委员夏忠武）、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吴世安，政治委员郑绍文）、第六军分区（司令员陈刚，政治委员方正平）、豫中军分区（司令员陈先瑞，政治委员栗在山）、鄂皖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世德）及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在发展和巩固根据

地的同时，积极配合八路军部队，开辟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湘鄂赣抗日根据地，部队在斗争中迅猛发展、壮大。

新四军各部队在向日伪军举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歼灭和瓦解了大量敌人，收复了许多失地，扩大了部队。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反攻前夕，全军部队发展到二十一万余人。在部队内部，先后开展了精兵简政、整风学习、大练兵和生产运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等运动，进一步增强了军政军民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水平。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入侵华中的日军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策划下，拒绝向新四军缴械。对此，新四军遵照党中央提出的“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总任务，在华中人民的配合下，对日军展开了猛烈的战略大反攻，迅速肃清了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地区内的日军，使华中和山东两大战略区连接起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五、为适应国内战争需要 调整和改编部队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蒋介石妄图依靠美帝国主

义的援助，发动内战，消灭抗战有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篡夺胜利果实，重建奴役中国人民的独裁统治。中共中央鉴于形势的发展，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发出指示，规定了我军“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发展东北，巩固华北，坚持华中”的战略方针。为造成迎击国民党军大规模进攻的有利态势，适应国内战争的需要，新四军在调整战略部署的同时，先后对部队进行了调整和改编。九月下旬，黄克诚率领第三师主力三万七千余人开赴东北，后归东北野战军建制。十月，李先念率领第五师与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三五九旅主力）和河南军区部队，在桐柏山会合，组成中原军区，直属中央军委指挥。十二月三日，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合并，编成野战军，形成“拳头”，以便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正式命令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六月，中央军委任命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黎玉任新四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陈士渠任新四军参谋长兼山东军区参谋长，舒同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袁仲贤、唐亮分别任新四军副参谋长、政治

部副主任兼山东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

新四军军部并率领主力一部北上山东后，为便于作战指挥，以在苏皖边区的部队组成属新四军建制的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共十五万三千余人。

华中军区，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先胜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张元寿任副参谋长。

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刘先胜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及特务团。

第六纵队，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治委员，段焕竞任副司令员，陈铁君任参谋长，刘文学任政治部主任，罗维道任政治部副主任。

第七纵队，姬鹏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藩任副司令员，杜屏任参谋长，卢胜任政治部主任。

第八纵队，陶勇任司令员，彭德清任副司令员，韩念龙任政治部主任，谢云晖任政治部副主任。

第九纵队，张震任司令员，饶子健任副司令员，姚运良任参谋长，王学武任政治部主任。

此外，将原苏中、淮南、苏北、淮北等军区所属部队，统一改编为一个独立旅和八个军分区，直属华中军区指挥。其领导人是：独立旅旅长陈玉先，政治

委员李干辉兼；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张震东兼，政治委员钟民；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钟国楚兼；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周骏鸣，政治委员肖望东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陈庆先，政治委员黄岩；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谢军祥兼，政治委员曹荻秋；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覃健，政治委员万众一；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张震球，政治委员赖毅；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张太生，政治委员吴芝圃。

新四军第二、第四师主力和苏浙军区部队一部调往山东后，与山东军区一部分主力合编成山东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一月，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取消新四军番号。新四军部队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新四军部队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对日伪军作战一万九千三百余次，毙伤敌伪三十一万七千余人；对顽军自卫反击战三千二百余次，毙伤顽军十四万三千余人。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五省的华中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部队由统一改编时一万零三百余人发展到三十一万余人，民兵、自卫武装发展到九十六万余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一辑

作者 =

页数 = 3 4 6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